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俞劍鴻 博士

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  
從辯證法的角度研究

研究生：李權鎬 撰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

#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 A Dialectical Analysis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analyze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t the micro- and macro- levels.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found that, for the Marxist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ir worldview, epistemology as well as way of thinking. Meanwhile, Beijing claims that its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re based on dialectics. However,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not merely a socialist country; it is also a country with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Hence, we speculate that Mainland China, a country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carry a specific way of perceiving reality and thinking. Thus, it is natural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y of thinking differs from not only that of non-Communist countries but also that of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what is written above,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sumptions as preconditions to understand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in general as well as its foreign polic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particular.

First, we assume that Mainland China's way of perceiving reality and thinking is dialectically formed in terms of Marxism,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core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Second, we assume that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relying on dialectics, form their worldview of understanding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and their methodology of reacting to i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such a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become Beijing's theoretical as well as behavioral patterns.

Third, we assume that such theoretical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are directly reflected on Communist China's diplomatic lines and principles,

and are practically reflected in its foreign affairs policy, strategy, and tactics.

Such assumptions require an in depth exam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amining the assumption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inductive method, because induction helps to prove an assumption true or false by way of observing facts. The practical method of examining the facts begins with examining both the important pap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speeches made by of leaders at the central level. From such papers and speeches, this research is to (1) see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mmunist dialectics and the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thought and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Communists when dialectics are being applied; (2) study the methods by which Chinese Communist decision-makers perceiv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jectiv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at roles they are going to play and decide what diplomatic objectives and strategy to take; and (3) analyze the structural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appearing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that is, to analyze the jobs and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es joining the institution of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its practic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s. Finally,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licy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the PRC's foreign policy.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from inductively examining such assumptions could be taken as form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ts function is to provide an intellectual framework to primarily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Therefore, by deducing suc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e will explain the issues, including various clashes and conflicts, which have appeared during the time when Mainland China was having its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with both Koreas as well as try to understand how Mainland China resolved such clashes and conflicts and reached agreements with the two Koreas. After that, we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evaluate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o have a better feel about the prospect of their future relations.

# 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

## 從辯證法的角度研究

### 摘 要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共對韓半島外交政策中存在的內在類型或規律。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在思考的過程中，作者發現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唯物辯證法是他們的世界觀，又是認識論，更是思維方法，而中共亦自稱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乃是基於辯證法。但是，我們知道中共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因此，吾人推測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共，應具有其獨特的認識和思維方式；因而，其思維方式與自由主義國家有所差異，並且亦有別於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乃是自然之理。

根據以上的認識，本研究用以下之三個假設為前提，探討中共的對外政策以及對韓半島之外交政策。

首先，中共的「認識論和思維方法」之假設為馬列主義、中國傳統思想、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中的核心所共同融合而組成的辯證法。

其次，中共領導者基於辯證法，形成其對客觀環境認識的世界觀，以及對客觀環境因應的方法論，而該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具體運用和體現，乃成為中共的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

最後，這些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直接反映在中共的外交路線和方針上，其具體的表現為外交政策、策略及行動。

這些假設乃是需要驗證的，本研究在驗證假設的過程中運用歸納法的途徑。因為歸納推理是通過觀察事實以證明假設的真偽。就驗證的具體方法而言，從中共黨與政府的重要文件及高層領導人的重要講話著手：第一，尋找中共辯證法內涵與其思維和行為中實際運作的特徵；第二，探討中共決策者認知國內外的客觀環境，以確定其所要扮演的角色及決定外交目標和具體的策略；第三，分析政策決定過程中的結構和動態側面，亦即參與外交政策制定的機構的職能和實際運作側面的分析；最後，從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中，論證其外交政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及找尋其中的可能差異。

這些假設經過歸納的驗證之後的結論，可說是一種分析架構，其功用於提出一種知性框架以初步引導研究方向之用。因此，吾人透過這樣知性框架來說明中共在發展與南、北韓三方關係的過程中，曾出現的問題，包括各種衝突和矛盾；並瞭解中共是如何解決並達成協議。據此，吾人可評估現階段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問題並展望其未來趨向。

# 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

## 從辯證法的角度研究

###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範圍-----	6
一、研究方法-----	6
二、研究範圍-----	11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釐清-----	12
第二章 辯證法與中共的運用-----	14
第一節 辯證法之意義和西方的發展-----	16
第二節 中國傳統的辯證思維-----	18
第三節 中共的辯證法與其運用-----	21
一、毛澤東的辯證思維與運用-----	23
二、鄧小平的辯證思維與運用-----	29
三、江澤民的辯證思維與運用-----	33
第四節 小結 -----	39
第三章 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與實際-----	42
第一節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辯證法-----	42
第二節 政策制定結構的辯證關係-----	52
一、中共政治體制 黨、政、軍的辯證關係-----	52
二、外交政策制定結構-----	61
第三節 小結-----	79
第四章 辯證世界觀與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演變-----	81
第一節 中共外交演變的分期問題與對韓半島政策-----	81
第二節 兩大陣營論與援北抗南政策-----	83
一、兩大陣營論與一邊倒政策-----	83

二、韓戰與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形成-----	85
第三節 中間地帶論與親北排南政策-----	91
一、中間地帶論與兩條線政策-----	91
二、中蘇關係的惡化與拉攏北韓-----	94
三、造反外交與中北關係的疏遠-----	97
第四節 三個世界論與近北遠南政策-----	100
一、三個世界論與一條線政策-----	100
二、一個朝鮮政策與北韓的自主外交-----	101
第五節 東西南北論與持北進南政策-----	105
一、東西南北論與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105
二、對北韓有原則的支持-----	110
三、由「關門不上鎖」轉為「開門引進」南韓-----	114
第六節 小結-----	118
第五章 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現況與展望-----	121
第一節 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基調-----	121
一、中共的多極化世界論與大國外交-----	121
二、韓半島的地緣特徵與在中共安全中的意義-----	127
三、中韓建交後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取向-----	129
第二節 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現況-----	134
一、中共與南韓的建交及雙方關係的發展-----	134
二、中共與北韓關係的演變-----	139
第三節 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展望-----	142
第六章 結論-----	145
參考文獻-----	149

# 圖 目 錄

圖 2-1: 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對「辯證與政策」的應用架構-----	40
圖 3-1: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	46
圖 3-2: 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辯證過程-----	51
圖 3-3: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結構-----	63

## 表 目 錄

表 3-1: 中國政權結構-----	54
表 3-2 : 解放軍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員中所佔的比例 ( 1956-1997 ) -----	60
表 3-3: 外交事務各階段負責的黨政機構-----	64
表 3-4: 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副主席黨內職務關係表-----	77
表 5-1: 中 韓 , 中 朝 領 導 人 重 要 會 同 一 覽 表 ( 1989 ~ 2000 )-----	140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與「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

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共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北韓）建交以來<sup>1</sup>，中共對韓半島<sup>2</sup>的政策，只承認北韓為韓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與它結為戰略夥伴；至於南韓則視其為朋友的敵人及敵人的朋友。如今若要探討中共對韓半島上雙重承認兩個國家的因素，除了要回顧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演變之外，並且要解析中共對韓半島外交政策改變的原因，以及有必要探索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現況和未來的可能發展趨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兩個不同的意識型態支配全球格局的影響下，致使中國和韓半島分別處於分治和分裂的狀態。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屬於自由陣營的中華民國（以下簡稱台灣）與南韓互相承認而建交，隨後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共與北韓也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由此形成了台灣與南韓對中共與北韓的「二對二」的對立關係；並且經過韓戰之後，促使中共與北韓更成為所謂「唇齒之邦」、「血盟之邦」的關係，影響所及，南韓與台灣也更進一步加緊其友好程度。因此，中共與南韓、台灣與北韓之間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

---

<sup>1</sup>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共與北韓建交，北韓成為與中共最早建交國家之一。

<sup>2</sup> 本論文中指稱的「韓半島」，就是中國人所謂的「朝鮮半島」。中國人把「韓半島」習慣稱為「朝鮮半島」，又把「韓民族」稱為「朝鮮民族」。究其由來，應該是這個半島曾經建立以「朝鮮」為國名的王朝之故，並且該朝鮮王朝一直與中原的王朝維持從屬的朝貢關係。所以，就中國人而言，這個名稱可能含有相當豐富的歷史情結。北韓自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把「韓半島」稱為「朝鮮半島」，又將「韓民族」稱為「朝鮮民族」；其目的，在於與南韓正名之爭中宣揚鮮明旗幟，凸顯其為繼承歷史正統性的合法政府。南韓慣稱「大韓民國」、「韓民族」、「韓半島」也有歷史的緣故；古代在半島上又曾經存在以「韓」為名的國家形態，而且在二十世紀初朝鮮王朝末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前，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因此，南韓也可算擁有繼承正統的歷史根據。英文翻譯「韓民族」為「Korean」，「韓半島」為「Korean Peninsula」。

期，幾乎沒有任何來往，卻維持了相互敵對的關係。但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中共和美、日關係改善，以及自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共和南韓的關係開始有了一些變化，特別是經貿、體育和文化交流方面更是有所突破。到了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與南韓達成建交，中共承認在韓半島上有兩個國家，於是形成了「一中二韓」的新外交架構。

就中國大陸和韓半島的關係而言，不僅地緣政治的關係密切，而且在歷史、文化上的關係也已有二千年以上悠久的淵源。中國大陸與韓半島的關係，從明朝迄今的歷史來看，中國大陸中原政權曾有三次派兵援助當時的韓半島政權，並與外國軍隊打仗：第一次是在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亂」<sup>3</sup>，當時的「日本」以攻打中國大陸（明朝）的名義要求「朝鮮」讓路，開啟侵略朝鮮之戰。朝鮮於是向明朝請求援兵，「抗日援朝」的「明軍」在韓半島併同朝鮮軍民攻打日本侵略軍；第二次是在一八九四年，清朝與日本的「甲午戰爭」，為了要維持對韓半島原有利權的清朝與要擴張在韓半島勢力的日本作戰；第三次是在一九五〇年韓戰期間，中共以「抗美援朝」的名義參加韓戰<sup>4</sup>。

為了他國出兵的事例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之舉，中國大陸為韓半島出兵所代表的內涵是什麼？第一，「明」、「清」兩朝與朝鮮之間本來有著朝貢或宗藩的關係，而中共與北韓因有相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且是一江之隔的鄰國，所以中國大陸政權援助韓半島的理由也許是由於文化的情結或者有道德和友誼上的責任感。第二，在地緣政治上，韓半島扮演海洋勢力和大陸勢力出入的橋樑及跳板的角色。對中國而

---

<sup>3</sup> 中國大陸學者葛振家認為：「壬辰戰禍是十六世紀東方大事件。明朝竭盡國力出兵援朝的戰略決策，可以說，是中國人朝鮮觀戰略思考最經典的事例。」參閱葛振家，論明代中國人的朝鮮觀，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頁221。

<sup>4</sup> 關於中共參加韓戰，現已真相大白，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毛澤東不僅事先知悉，且與史達林協商，為金日成出謀策劃，積極鼓勵金日成挑起戰爭，並向金日成保證，只要美軍參戰，中共就出兵援助。參閱馬仲可編，《解密了的舊蘇聯文獻檔案解說》（漢城：自由總聯盟出版社，1994）。

言，韓半島是外國勢力侵略中國的重要跳板<sup>5</sup>。因此，就中國的戰略意義而言，需要一個「緩衝地帶」，所以非將韓半島納入中國影響範圍之內不可，此為「以夷制夷」政策，中共的抗美援朝也不外於此。

歷史絕不會重演同一齣戲，但也有上演類似戲碼的情形。如今，中共與南韓建交並且與北韓維持既存關係。將中國與韓半島關係的舊劇本拿出來比較後便可知，由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的失敗，清朝在韓半島政治舞台上失去主導的地位。但是，經過一個世紀後，東山再起，中國大陸的中原政權重新恢復對整個韓半島政治上的傳統影響地位。觀看現今的中共與韓半島的外交政治舞台，中共使用「兩手」抓緊南北韓，利用南北韓之間的矛盾，同時發揮對於南北韓的影響力，正在上演的是與過去不同卻又類似的戲碼。因此，中共往後在與南北韓之間的發展上將扮演怎樣的角色，以及與韓半島關係的發展趨向，乃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韓半島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其陸域西方與中國、北方和俄羅斯為鄰，隔海南臨日本，東對美國，就地理位置而言，可說是被這些強權國家所包圍。因此，從十九世紀以來，韓半島乃成為以上強權角逐的戰略要域。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美蘇在雅爾達秘密簽訂協定，劃分戰後歐亞兩洲的軍事分界線，因而形成以冷戰為屬性的雅爾達體系，協議在韓半島上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美蘇分別出兵各占領南北，種下了今日韓半島分裂的禍根。韓戰結束後，在冷戰之下兩大陣營圍繞韓半島，形成南韓、美國、日本的南方三角關係與北韓、蘇聯、中共的北方三角關係的對立格局，雖然其間相互關係仍然不斷變化和重新整合，但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葉仍然是維持了基本的格局。至今，雖然由於東歐社會主義的崩潰與蘇聯的解體，致使雅爾達體系已不復存在，但由於韓半島蒙受其陰影實在太深，因此分裂的悲劇至今仍未結束，而且這四強對韓半島的利害關係和影響力仍然存在。

---

<sup>5</sup>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朝鮮半島是我國的緊密鄰邦，戰略上唇齒相依，互為依托，半島局勢穩定與否將對我國的安全與穩定產生極為突出的影響。歷史上，它是外部勢力入侵中國的通道和威脅中國的場所，對我國安全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或震撼。」，陸俊元，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特徵，《外國問題研究》第8號（長春，1996.2），頁9。

中共與韓半島關係，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可視為雙邊關係，不過因為仍然存在韓半島南北韓對峙的局面，所以實質上應該是「三角」關係的性質。不僅如此，由於韓半島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周圍的美日俄三強各自在韓半島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利害關係和策略，因此，中共對韓半島的一舉一動勢將影響她們的利益和戰略佈局。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變化有可能造成中共與其他三強之間關係的變化；同理，中共與該三強的關係變化也容易影響到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變化。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可說是中共對東北亞政策的出發點，又是中共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因此，想要研究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非先了解中共的外交政策不可。

許多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非辯證專家與學者們認為，中共的外交政策在堅持原則與實際行動之間常常出現矛盾：他們認為中共雖然強調從意識型態衍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在實際行為上卻鮮明地顯現從中華民族主義衍生出來的愛國主義；中共不斷地發表革命宣言，且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共外交政策的言論經常強調社會主義、反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反殖民主義，但又期望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sup>6</sup>；而且外交政策取向的變更、以及「昨日的敵人」與「今日的朋友」的替換更是頻繁<sup>7</sup>。因而這些專家與學者們認為中共是毫無原則且不能信任的。儘管如此，中共本身卻堅決否認這點，認為正確認識和掌握時代的性質而改變外交政策是絕對必要且正確作法<sup>8</sup>。所以，中共到底是策略的靈活還是機會主義就比較難分別了。換句話說，在外部觀察家的眼中，中共的行為是非常矛盾的，但中共自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非常合乎邏輯的。這種認知上的差異該如何解

---

<sup>6</sup>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中說：「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頁343。

<sup>7</sup> Steven I.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6.

<sup>8</sup> 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1~16。

釋？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至今(即從毛澤東的革命鬥爭時期、經過鄧小平的建設社會主義、及目前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時期)，我們回顧其對外關係，外交政策的制定，乃至於重大政策的轉變，大都導因於中共對國際主要矛盾的認識和其解決方法上的差異。這一矛盾世界觀在中共制定其外交政策時，一直成為最基本的思維方法<sup>9</sup>。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舉行的鄧小平外交思想研討會上，時任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的講話中，可以窺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思維背景。錢其琛指出：「鄧小平同志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運用辯證思維方法綜觀國際風雲變幻，洞察內外形勢發展，把握當今時代特徵，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交思想<sup>10</sup>。」王覺源認為：「共產黨常說：『每一個共產黨員，要用馬列主義的思想，武裝起來！』並不是說，共產黨員只熟習一些馬列主義的教條、經典，就算是思想武裝了。最重要的是，能機動運用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辯證法，才是思想的武裝。所以他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固要懂得馬列主義的理論，更要知道並運用辯證法的法則<sup>11</sup>」。就中共而言，不但其理論、戰略和戰術是根據辯證法所產生的，而且其中的運用也是如此。因此，由辯證法觀點所產生和運用的中共的理論和戰略，也只有先用辯證法才能更加了解它<sup>12</sup>。由此觀之，

---

<sup>9</sup> 參閱：張登及，毛澤東涉外「言論」與中共「外交」，《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9期（民87年9月），41~48；趙春山，從中共的「矛盾論」看：華府與北京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理論與政策》第十二卷第一期，頁2~6；許志嘉，從「矛盾」世界觀論中共的對美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6期（台北：政治大學：1996.6），頁50~63；金永文，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政策與實事求是的角色，《中蘇研究》58號（漢城：漢陽大學，1993，夏季），頁15~36；《中國外交論》（漢城：大旺社，1993）。

<sup>10</sup> 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頁4。

<sup>11</sup> 王覺源，《辯證法及其應用》（台北：帕米爾書店，民1973年），頁38。

<sup>12</sup> 參閱，Peter Kien-hong Yu（俞劍鴻），*Bicoastal China: A Dialectical, Paradigmatic Analysi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9)；中共黨軍之辯證模型，《中共研究》，第三十卷第七期（1996.7），頁72-81；中共中央繼承問題的辯證性初探：自一九六九起，《中共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七期（1997.7），頁46-57；秦孝儀主編，《蔣總統集》第二冊（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民63年，第二版），頁1918；錢剛鐸，《中共外交政策與策略》（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72年）；王覺源，《辯證法及其應用》（台北：帕米爾書店，民62年），頁37-38；陽作

中共外交政策也不例外，也是根據辯證法所產生和運用的，因而只有用辯證觀點去分析才能夠說明中共外交政策所內涵的規則，同理，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的研究也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足夠地了解、說明和評估中共對韓半島外交政策的形態和內蘊的規則。因此，本論文將透過對中共的辯證法的探討以達成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所要達成的目的為：第一，運用中共的辯證法來說明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相關外事機構的實際運作的面貌；第二、從中共五十年外交的實踐中抽繹出中共外交行為的內在類型或規律；第三、基於前兩者的認識，以了解中共對韓半島外交政策的基調；第四、說明中共與南北韓關係演變的各項因素；第五、在發展三方關係的過程中，對於曾出現的問題，包括各種衝突和矛盾，說明中共是如何解決並達成協議；第六、評估現階段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問題並展望其未來趨向。

##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範圍

### 一、 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外交政策研究的意義，在於分析一國的外交政策的背景條件和動機，說明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評估其結果，並且預測和處理以後可能的情況<sup>13</sup>。不過，社會科學基本上就存在著不同的典範<sup>14</sup>，不同的典範之間，不但最基本的觀點、假設及方法論互不相同，就連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大不相同。因為研究者在分析眼前的問題時，從自己成長環境、文化脈絡、以及意識型態中得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分析研究對象，亦即研究者把自己當成主體而研究對象當成客體看待，主體和客體之間不同認知所造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將

---

華、張峰編，《辯證法史論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

<sup>13</sup> 全雄，《外交政策論》（漢城：法文社，1987），頁 31~32。

<sup>14</sup> 所謂典範，依照 Thomas S. Kuhn 的說法，包含特定的假設、概念、理論、分析方法、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適用於特定的科學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參閱，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sup>nd</sup>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有所差異<sup>15</sup>。所以，在一個典範中處理某些問題所獲得的重要成果，從另一典範看來，未必有多大價值，而且由於身處不同文化、歷史、制度和意識形態等背景因素影響之下，針對同一現象的分析，出現不同的解釋、評估和處方。因此，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時，研究者應重視不同典範之間的差異，必須先脫離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要更深入了解中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就中國大陸背景而言，社會科學「理論」受領導者的期望，一定要貢獻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sup>16</sup>於是，理論與「實踐」(practice)間的關係是比其與「實際」(reality)間較有更密切的關連。如果理論與政策之制定或執行之間，沒有直接的關聯，都會被認為是空洞或無用的，亦即理論對於政策必須能夠立即地制定或加以推動，該理論才是有用的。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意義也不例外。對中共而言，國際關係理論不僅是一項描述、解釋和預測的工具，或者透過國際事務所觀察到的所謂「光譜」(spectrum)，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成為國際行動與外交政策的指標。<sup>17</sup>因此，如果研究者用西方的理論或理論架構來分析中共外交政策，必須考慮中共對理論所下定義的意義和作用，要不然容易導致與事實不盡符合的解釋和預測。

為了符合這種要求，本論文將以下三個認知做為分析的前提：

第一，中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具有中國文化的國家，因此中共具有其獨特的認識和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與自由主義國家有其不同之處，而且與其它社會主義國

---

<sup>15</sup>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民84)，頁5~6。

<sup>16</sup> 毛澤東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重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開不實行，那麼，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68~269。

<sup>17</sup>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4), pp., 482~483.

家亦有所差異。中共的這些「認識和思維方式」乃是馬列主義、中國傳統思想、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中的核心所共同融合而組成的辯證法。

第二，中共領導者基於辯證法，形成其對客觀環境認識的世界觀，以及對客觀環境因應的方法論，而該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具體運用和體現，乃成為中共的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

第三、這些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直接反映中共的外交路線和方針，其具體的表現為外交政策、策略及行動。中共領導者始終如一強調，唯物辯證法是他們的世界觀，又是認識論，更是思維方法。

有關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中、韓、英文的主要著作中，中共外交的主要研究，基本上可分類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各種途徑：

第一、從分析層次上的分類為個人、國家、國際體系等三種層次：個人層次的研究認為中共外交政策最終是受到決策者的個人風格、意識形態、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響而制定的。乃是在進行外交政策分析時，把領袖之個人主張和偏好當作外交政策關鍵因素的典型實例。這一研究途徑強調了領袖在中共外交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和決定性作用<sup>18</sup>；國家層次的研究側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國內決定因素。這層次的研究者通常重視中共決策層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方面<sup>19</sup>；國際體系層次的研究認為國際環境才是決定中共外交政策的最主要根源。此研究將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對外行為視為對國際體系和環境的變化之反應<sup>20</sup>。

---

<sup>18</sup> Lucian W. Pye, "Mao Tse-tung's Leadership Sty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 2 (Summer 1976), pp. 219~235;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94.

<sup>19</sup> 周尊南，我國對外政策調整的理論基礎——學習鄧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外交學院學報》，1988年第一期，頁50~58；馮志，四十年來中共外交的演變與發展，《中共研究》，第23卷第12期（1989年12月），頁31~43；第24卷第1期（1990年1月），頁83~95；第24卷第2期（1990年2月），頁107~117；Michael B. Yahud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40: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November 1989), pp. 519~539.

<sup>20</sup> 趙春山，後冷戰時期的中共對外政策，《理論與政策》，第6卷第4期（1992年7月），頁2~25；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1999年

第二、將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源分類為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動機等三種。歷史文化研究途徑認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才是中共外交政策根源。此途徑的研究者，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和世界觀視為中共制定外交政策及其對外行為的基本因素，而採用文化心理學或地緣政治學來進行研究<sup>21</sup>；意識形態研究途徑是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中共的意識形態脈絡中，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行為的根源<sup>22</sup>；國家利益研究途徑認為中共也是如同其他國家一般，在符合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及國際威望等因素的評估之下，制定其外交政策<sup>23</sup>。

第三、政策決定過程的研究：決策機構、派系政治、決策認知研究。決策機構研究途徑是透過參與外事活動的各種機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sup>24</sup>；派系政治研究途徑主張中共外交政策是中共內部高層派

---

夏季)，頁 23~38；安秉俊，《中共政治外交論》（漢城：博英社，1986）；William T. Tow,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5~157.

<sup>21</sup>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鄭千九，《中國人的世界觀與對外政策》（漢城：新永出版社，1996）；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ian, 1990)；William C. Kirby, “Traditions of Centrality, Authority,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29.

<sup>22</sup>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84）；金永文，《中國外交論》（漢城：大旺社，1993）；J. D. A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sup>23</sup> 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雖然有些中國大陸學者包括謝益顯都強調，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應考量「國家利益」為最優先，不過他們也是如同西方國際政治研究者一樣，對於國家利益的概念還沒達成共識，眾說紛紛。參閱，Yong Deng,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4 (June 1998)；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柯雄、賈宗誼、張勝平譯，《長城與空城計》（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Gerald Segal, “Foreign Policy,”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 *China in the Nineties: Crisis Management and Beyo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60~16；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37~52.

<sup>24</sup> 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1998 年 5 月），頁 21~47；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決策模式，《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8 期（1998 年 8 月），頁 49~72；A. Dor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George Yang, “Mechanism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5), pp. 91~100.

系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因此此途徑認為中共內部派系的政治互動才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sup>25</sup>；決策認知研究途徑是從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理念著手探索中共對外的認知，並且透過中共外交決策結構的實際運作，以分析中共外交政策<sup>26</sup>。

雖然此三方面研究的各種途徑說明對於中共外交行為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足夠的解釋力，但它們都難免有其缺陷。因為，一國的外交政策行為，不僅是考量一、兩個因素就能有所決定，而是必須衡量各種複雜因素之間相互的影響，經過決策機構或決策者之間的互相交叉討論協調，達成一種滿意的共識後才能產生的。例如，一國的外交政策不但受到國際環境的制約而調整，並且國內環境、需求及最高決策者的偏好也是國家調整其對外政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一國制定某種外交政策的動機可能是以考量國家利益為優先，不過國家利益的根源，卻與其意識形態和歷史文化不可分割；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參與外交活動的各級機構的職能，可能對於解剖黑箱運作有所幫助，但是，仍然具備動態的實際運作面向依然是不易解析，因而需要加以考量結構運作的背景動機，才能夠較接近於全貌的理解。因此，各種研究途徑所考量的種種因素並非是彼此取而代之，卻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問題是，如何融化各種研究途徑的優點，亦即從錯綜複雜的因素中找尋最主要的根源，將其化約，而能夠全貌地、系統地說明中共外交政策，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本論文以研究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為主題，因而把握中共外交行為的規律，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在此，本論文試圖從以下各方面來探討中共外交政策的面向：首先，將國際、國內和個人的三個層次納入於中共的認識論中。中共自稱其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是辯證法。因此，從

---

<sup>25</sup> Peter Van Ness, "Three Line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1950~1983: The Development Imperative," in Dorothy Solinger,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p. 113~142;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e 1995), pp. 289~316.

<sup>26</sup>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 Bin Yu,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4), pp. 244-251.

中共黨與政府的重要文件及高層領導人的重要講話著手，尋找中共辯證法內涵與中共運用的特徵；然後，探討中共決策者對內外環境之認知，亦即以中共的語言講，把握當前世界格局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而確定其所要扮演的角色及決定外交目標和具體的策略；其次，將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及國家利益等因素納入中共決策者自我決定其國家角色的過程中以分析其外交政策之制定；再者，分析政策決定過程中的結構和動態側面，亦即參與外交政策制定的機構的職能和實際運作側面的分析；最後，從中共與南北韓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層面互動的關係中，論證其外交政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

## 二、 研究範圍

時間範圍：自一九四九年台海兩岸中國的政權與韓半島上的不同政權互相建交後，至中共雙重承認南北韓的近半個世紀間，其關係的演變過程，以及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現況為主要研究的時間範圍。中國大陸與韓半島之間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文化關係，如果不知其間的來龍去脈，對於兩者關係之研究或許不夠周密，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並非歷史的探討，因此其歷史關係僅於導論中簡單介紹。此外，為了瞭解中共的辯證思維，與其相關的古今辯證思想必須加以探究，因而對於思想方面的介紹則不限制其時間範圍。

空間範圍：本文主要探討中共與韓半島的關係。但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至少與其東北亞政策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因而將中共、台灣、韓半島（南北韓）、美國、俄羅斯（包括前蘇聯）及日本等國當做研究的空間範圍。

內容範圍：本研究在此並不討論辯證法是否為一正確的認識論、方法論或世界觀；對於中國傳統思想中是否存在辯證思維，則不加以討論，因為勢必引起爭議，亦非本研究之主題，因此一併略過。本研究內容是以探討中共的決策者如何定義和運用辯證法著手，以分析其外交行為的辯證性。為

瞭解中共辯證思維架構，因此，作者就本身認定的中國傳統思想中存在的各種辯證思維與西方之辯證思維加以綜合，以探討中共辯證法的構成部分，並以此為探討中共外交政策之肇端。

###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釐清

在當代的自然科學領域中，辯證法的應用是受到質疑的，至少有幾個問題將無法滿足自然科學的標準，例如在本體上，物質如何由非然轉變成應然；轉變關鍵的量化問題如何進行評定？以及辯證中的概念或定義如何釐清或定位？這些問題都是崇信自然科學方法者，所據以排斥辯證法應用的主要因素。

辯證法並不是萬能的，因為並不是所有物質的存在方式，都將依賴辯證法的形式而確立；而且辯證法也不是毫無限制，諸如辯證法運作時，就必須在邏輯上取得結構的合理化。

但是究其本源，工業革命後，馬克思將辯證法結合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雖然扭曲了辯證法的本質，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且其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僅為邏輯學、認識論，還是客觀實在發展的規律。<sup>27</sup>」馬克思對辯證法的擴張性解釋與應用，使得依其意識型態而建立的共產政權，造成目前的共產世界。這是從辯證的角度來研究中共組織結構的因素之一。

中共自承是搞辯證起家的，而且中共體制運作動力是一種成員自身安全與共黨組織目標之間的辯證關係；用於政治、軍事者為權力的獲取，在經濟、社會層面則為利益的滿足；但由於成員間具有共同的意識型態之典範，因而有路線與政策之爭，究其本質終為權力，由此決定經濟計畫與社會發展方向；軍事權力是中共政權建立與鞏固的基礎，然就中共黨軍關係的長期發展可知，中共應是主張黨指揮槍的，因

---

<sup>27</sup> 姜新立，《馬克斯主義哲學的貧困》(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 64~65。

此，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則是中共軍事與政治的本源，辯證法更是共產主義認識論、歷史論與邏輯方法論的核心，無論就理論與實際而言，從辯證法研究中共體制結構，將可釐清中共的發展軌跡。

事實上應用辯證法研究中韓關係亦有其優點，由於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為主體的科學，運用辯證的研究方式，無論就人類之本質或辯證法的運用而言，則造成不可能有純然而絕對的兩極，這也相對造成了中共政策制定上，具有內在矛盾之主因，而此成為中共體制本質上的鬥爭原由，此一認知將有利於建立未來對中共互動的優勢。

## 第二章 辯證法與中共的運用

中共外交學院的教科書《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的著者謝益顯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談到：「新中國外交幾十年的實踐，有其特色，充滿智慧和謀略，頗有成績。智慧的源泉在於對有關問題的思考和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這些思考和認識可以提到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的高度來加以研究。它們反映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世界政治、國際關係和外交的理論觀點的指導，中國領導人在有關政策制訂中的正確創造，以及中華民族文化背景中某些光輝哲學思想的運用。<sup>1</sup>」「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映出來的，同時又是「中國哲學思想」運用的產物，上述之思考和認識是何意義呢？

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觀察國際問題的指導思想。<sup>2</sup>」而「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把辯證唯物論運用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而建立的<sup>3</sup>，因而唯物辯證法可說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最根本的部分。所謂唯物辯證法，乃是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發展的，其變化發展的基本動力為內在矛盾，所以把一切事物看成是矛盾的統一體，都有正反兩面，更從對立矛盾中去認識和處理問題。

中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具有中國文化的國家，因此中共具有其獨特的認識和思維方式。這些思考方式與自由主義國家有其不同之處，而且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亦有所差異。一般而言，不同的世界觀形成不同的方法論，而這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具體運用和體現，將會形成各自

---

1 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前言，頁1。

2 張廣信主編，《毛澤東思想體系概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252。

3 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195。

不同的理論體系和行為體系。<sup>4</sup>因此，要解析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和實踐時，雖然不能否定西方外交政策理論的成果，但首先需要以中共之思維方法著手，亦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共同成分——辯證法。

綜觀中共建國五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中共外交政策，就是依據辯證法來認識客觀環境而建立的。換句話說，中共外交理論，是根據唯物辯證法以認識世界局勢的變化，建立在「矛盾與對立」的關係上；並且其實踐也是以「矛盾」的觀點，分析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所在，然後對主要矛盾採用鬥爭方式予以消滅解決，對次要矛盾則採用聯合中立的方式加以拉攏和利用<sup>5</sup>。所以要分析現代中共的外交，由「辯證法」的分析架構，不僅具有相當良好的說服力，而且也能廣泛地應用。因此，我們要正確了解中共外交政策，應該先從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根據，即辯證法著手分析。

不過，關於辯證法的定義，眾說紛紜，要訂出一個眾所接受的定義，乃是相當困難之事。辯證法的內涵有所差異，不僅因為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不一致，而且還牽涉到像以下有些複雜的問題<sup>6</sup>：一、由於辯證法本身涵意的變化非常大，因而其內容之解釋並無一定之準則；二、由於形態差別，因此出現了對立的世界觀，而世界觀的對立又顯出辯證法的對立。例如，不僅希臘的辯證法與黑格爾以後近代辯證法之間有顯著的差異，即使在近代，由於唯心論和唯物史觀的不同形態，因此導致其世界觀的對立，又造成辯證法有所謂「唯心辯證法」和「唯物辯證法」的對立。三、對於辯證法是一種思考方法或是世界觀的爭論，有其基本上的對立和不同的看法；四、隨著其內涵的變化，歷史上出現了不同的辯證形態<sup>7</sup>，而且這些各式各樣的形態，與思想的權威性結合在一起。

---

<sup>4</sup> 陽作華、張峰編著，《辯證法史論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頁 422。

<sup>5</sup> 錢剛鐸，《中共外交政策與策略》（台北：黎明，1983），頁 17。

<sup>6</sup> Georum編輯部譯，中堃筆，《辯證法發達史》（漢城：Georum，1983），頁 19。

<sup>7</sup> 關於辯證法類型的區分，請參閱唐君毅，〈辯證法的類型〉，《唐君毅全集》（台北：學生書局，1990），頁 414-437，其內容將辯證法區分為九種；此外，另有俞劍鴻教授所創之辯證法，不

本章嘗試論述各種不同涵義和不同形態所定義的辯證法，企圖釐清中共所運用的辯證法，進一步歸納建立適於應用分析中共外交決策過程及對韓半島外交策略之架構。

## 第一節 辯證法之意義和西方的發展

在西方，原先辯證法（dialectics）這個字，乃是由談話（dialogue）這個字借用過來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其談話或辯論，必先有統一的討論主題，而對於這個主題又必有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見，然後方有互談的必要，其互談之目的，原來是在獲得共同的結論<sup>8</sup>。所以單就辯證法這一字的意義上講，原是為了尋求理論或意見上的真理而運用的一種辯論技術，或者是一種問答的方法，而且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問答法。其目的在於發現對方的矛盾，其計劃則在於利用巧妙的問題，一步一步地詢問對方，使得對方的回答，不知不覺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sup>9</sup>。辯證法的原始意義雖然以問答辯論為主，但是辯論與談話的過程也就是思維邏輯的過程，將此辯論的法則明列出來，它就成了思維的方法或推理的方法，希臘哲學家稱它為辯證法或邏輯。<sup>10</sup>

因此，辯證法的發展從希臘芝諾（Zeno）的辯論法（同一性邏輯與不變的世界觀）起，經過蘇格拉底（Socrates）的問答法，柏拉圖（Plato）的辯證法（問答、思考法、觀念論），至德國近代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辯證法及辯證的推理為止，辯證法的基本形式是「正」、「反」矛盾對立的二支形式。這種矛盾對立的二支形式，到了黑格爾（G.F.W.Hegel）歸納為「正」、「反」、「合」矛盾對立統一三支形式，以統一解釋宇宙實體及思想方法的發展，乃集觀念辯證法之大成。黑格爾在《邏輯學》中強調，宇宙的大邏輯，就是辯證法，從人的思維，社會的變化及自然界的變化，

---

同於前述類型（請參閱第一章註 12 Yu），故綜合而言，辯證法的類型至少有十種以上。

<sup>8</sup> 唐勃，論辯證法，《共黨問題研究》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3 月），頁 16。

<sup>9</sup> 徐瑜，黑格爾辯證法研究，《政治評論》第 24 卷第 1 期（台北：1970 年 3 月），頁 27。

<sup>10</sup> 姜新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台北：黎明，1990），頁 188。

都遵循這個大邏輯前進。這個大邏輯是「絕對」出發，以理性的方式進行，外化成為「實體」，「實體」就是一切「存在」，在它裡面是不斷的矛盾、變化，而又統一的反覆中，一直引導它走向「絕對觀念」裡去。因此，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內涵：「精神與自然的互相轉化，在形式上是質、量的變化，在步驟上是正、反的變化，在本質上是矛盾的變化。」<sup>11</sup>至於唯物辯證法為馬克思採取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以解釋宇宙及思想的本體，又採取黑格爾的辯證法去解釋宇宙及思想和發展規律<sup>12</sup>，綜合而成其所謂唯物辯證法。恩格斯研究辯證法歸結為三規律：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從以上辯證法的發展過程看，有一點似乎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辯證法與「正、反」或「矛盾」<sup>13</sup>有關，越到後來就越多論究對立、統一與轉化<sup>14</sup>。

辯證法到了「正」、「反」、「合」三支形式，無論是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或馬克思主論的唯物辯證法，對於一切事物與現象的解釋和應用，概括起來，約有下列之共同點<sup>15</sup>：

一、辯證法認為宇宙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不斷發生與不斷解決的過程中發展。一切事物在形成之初，即含有與其相反的矛盾。這矛盾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原事物即發生對立鬥爭，後者否定前者，發生新的體系或現象。

---

<sup>11</sup> 姜新立，《分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理論典範的反思》（台北：五南圖書，1997），頁44~45。

<sup>12</sup>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說：「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絕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sup>13</sup> 辯證法所講的「矛盾」與傳統形式邏輯的「矛盾」概念不同：傳統形式邏輯的說法，矛盾一概念的意義是建築在「兩個相反的性質不能同時存在於一項」的一個基本觀念上；但在唯物辯證法中，矛盾即對立統一。指事物內部的對立面的諸因素之間的互相聯繫、互相排斥的關係。參閱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5月），頁8。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矛盾」時，就批評：「杜林認為『在事物中沒有任何矛盾，真實地產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頂點。』將他的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命題——矛盾=背理」。他指出：「如果我們對事物做靜止、孤立的考察，確實碰不到任何實際事物存在著矛盾，但是一當我們從事物的運動、變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裡我們立刻陷入了矛盾。」於此，恩格斯提出「運動就是矛盾」的命題。轉引自：陽作華、張峰編著，同前引書，頁266。

<sup>14</sup> 尹慶耀，《辯證法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0），頁4-8。

<sup>15</sup> 王覺源，《辯證法及其應用》（台北：帕米爾書店，1973），頁34-35。

二、否定的形式確立之後，否定的自身又將展開矛盾，再被否定，達到更高一級的綜合，是為否定之否定。但這種形式，不是循環或還原，它的內容，要比原事物更豐富更高級。

三、一切事物，是不斷變化運動的。靜止，只是變化運動的一個特殊形態。這變化運動的自身，就是矛盾不斷發生與解決的結果。

四、事物之量的變化，達到一定限度，即可引起質的變化；反之，質的變化，亦可引起量的變化。

五、事物運動的基礎，在於其本身一切聯繫中所包含的諸對立之相互轉變。即在一定條件之下，對立物可以互相轉化，達到統一，就是「對立的統一」。

從上述可知，西方辯證法在於強調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處於矛盾面動態之過程中，因而產生對立、鬥爭、轉化、統一的不斷擴充為新體系或新現象，並由此導致質與量的變化。

## 第二節 中國傳統的辯證思維

從中國的經史資料中，可以發現具有相當多的辯證法思想。尤其是中國的群經之首《易經》指出「一陰一陽之謂道<sup>16</sup>」，把「陰」和「陽」相互對待與作用就叫做「道」，認為是萬事萬物的兩種屬性和作用，這兩個概念概括自然界和社會萬事萬物對立的兩面，整個世界是若干不同層次的屬性對立的事物所構成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sup>17</sup>」，就是「一分為二」的思維方法出發，用八卦形式推測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發展規律。<sup>18</sup>

---

<sup>16</sup> 《易經》繫辭上傳、第五章

<sup>17</sup> 《易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

<sup>18</sup> 這種「一分為二」的思維方法對中共的思維和行為的形成有非常深厚的影響。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頁320。

道家思想的經典《老子》第一章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sup>19</sup>」，就用「一分為二」的思維模式展開宇宙的本體、萬物生成的本源、宇宙萬物運行的法則。《老子》中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sup>20</sup>」這就說明矛盾的雙方都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以對立的另一方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老子》又強調，矛盾雙方的轉化。這種現象，不僅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著，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sup>21</sup>而且在社會生活中也普遍存在著，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下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sup>22</sup>」《老子》從這些現象中概括出一個普遍命題：「反者道之動」，強調事物向相反方面的轉化是合規律的運動<sup>23</sup>。

中國人談到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提出「天人合一」的觀念。「天人合一」觀念主要是強調人不過是天（自然）的一部分，「天之道」和「人之道」是統一的，人應與自然和諧相處，不應把它們對立起來。對「天人」關係，孔子既主張傳統的天命論，又著重考察了人道，提出了仁智統一的新學說。他不反對天道，不否認鬼神的存在，但又看重人道，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來解決「天人」之間的矛盾。很顯然，這種態度是與孔子哲學中的中庸思想相貫通的，「順天命、盡人事」，這即是孔子哲學思想的特色。<sup>24</sup>儒家的「中庸觀」可視為一種辯證法而重新思考。「中庸之道」所說的「中庸」，就是要以「中」為用，以「中」為常，賦予「中」以普遍的意義，「中」就是不偏不倚，無

---

<sup>19</sup> 《老子》第一章

<sup>20</sup> 《老子》第一章

<sup>21</sup> 《老子》第二十三章

<sup>22</sup> 《老子》第五十八章

<sup>23</sup> 何萍、李維武，《中國傳統科學方法論的嬗變》（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頁 241。

<sup>24</sup> 陽作華、張峰編著，《辯證法史論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頁 346~349。

過無不及。孔子主要把中庸範疇運用於三個方面上<sup>25</sup>：首先、在「常變」問題上，表現為一方面承認變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常制變，既反對頑固不變化，又不主張根本變革；其次、處理「和同」問題，則是在總體上調和對立的諸方面，力圖把對立面的平衡絕對化；再者、在「一兩」問題上，則主張折中調和、不偏不倚的中行觀。很明顯，其觀念核心就是對立和諧論以及平衡論，即力圖求和諧於對立，既承認矛盾，又使之定位和諧化。「『中庸之道』具有雙重的意義：從辯證法的意義上說，孔子並不否認世界上存在著陰陽、剛柔、貧富、貴賤、尊卑、智愚、長幼、男女等矛盾的『兩端』；但另一方面，又力圖使矛盾的兩端調和起來，求和諧於對立之中。儒家中庸範疇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平衡取得協調、追求和諧。在差異中求平衡，在對立中求和諧，或者說，研究對立是怎樣同一的，便成為儒家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sup>26</sup>」

如此看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具有很豐富的辯證性。尤其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最有影響和張力的思維模式，自古代到近代，一直都是圍繞著一些基本概念與觀念展開的「兩端論」<sup>27</sup>，例如，「天與人」、「陰與陽」、「有與無」、「心與物」、「理與氣」、「知與行」等等，這種思維模式引導人們從兩個「端」的聯繫中，認識宇宙的根本規律，把握事物的變化規律，採用恰當的處理方法。因而，王夫之指出，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是「合兩端於一體」<sup>28</sup>。這種兩端論模式是辯證法思想的生動具體的表現，但它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即在承認對立雙方相互矛盾的前提下，著重探索如何使之相輔相成，彼此促進，達到「中和」的境界，而不是對待任何矛盾都只講不可調和的鬥爭。<sup>29</sup>

---

<sup>25</sup> 同上註，頁 349~352。

<sup>26</sup> 同上註。

<sup>27</sup> 金開誠，〈中國人的智慧——談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思維模式〉，武春河主編，《龍吟——中華文化之光》（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8月），頁 62。

<sup>28</sup> 同註 23，頁 241。

<sup>29</sup> 同註 27。

中國傳統辯證思想，雖幾經變形易位，卻仍不論在民間或學術界，猶具有深厚的勢力。它與西方的辯證思想，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差別」、「矛盾」、「對立」、「一和多」、「分和合」的關係以及「變化」等基本概念和範疇，但與西方如黑格爾、馬克思等的「邏輯」辯證法，卻存有差異性。中國辯證思想具有非常濃厚的「現實性」，即在辯證思維中包含著廣泛的社會歷史、政治、軍事和世俗人生經驗等現實內容，如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思想就是這種現實性的反映。這就是東西辯證思想根本不同之處。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這種辯證思想，在中共領袖們的意識和思維形態中留下了非常深厚的烙印。

### 第三節 中共的辯證法與其運用

中共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有過兩次歷史性的飛躍：第一次為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成立，經過延安整風和「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形成「毛澤東思想」；第二次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經過「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創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sup>30</sup>於此，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序言中有明文規定：「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sup>31</sup>」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同列入在憲法上。由此看來，目前指導中共行為的重要根據，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因

---

<sup>30</sup> 參考：江澤民，在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上的講話（1993年11月2日），楊少俊等編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8月），頁2~3。

<sup>31</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張保民編輯，《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文件》（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頁151。

為中共認為他們的「戰略與戰術，都是他們理論的產物，完全是由嚴格的合邏輯的推理而來」，所以在他們所謂革命鬥爭的過程中，事事要講究「以理論指導行動；理論和實際統一<sup>32</sup>」。因之，對其理論和思想更非有靈活深切的瞭解不可。

何謂毛澤東思想，又鄧小平理論何謂也？根據中共的重要文獻：一九四五年六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思想」列在黨章「總綱」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指針。<sup>33</sup>」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時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的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sup>34</sup>」江澤民在「十四大」的報告中，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下之定義為：「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sup>35</sup>」

依中共所下定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而且鄧小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但中共以馬列主義，如何來結合具體的中國實際？尤其客觀環境在不斷變化發展中，以較有固定性的「主義」，如何去結合變動不居的實際，而欲使之恰到好處，不失時宜？這就是說，要「運用『動』的辯證法的觀點，把死的、固定性的主義，賦以極大的機動性<sup>36</sup>」，以中

---

<sup>32</sup> 王覺源，同前引書，頁 37。

<sup>33</sup> 中國共產黨黨章，景杉主編，同前引書，頁 858。

<sup>34</sup>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通過），張保民編輯，同前引書，頁 31。

<sup>35</sup> 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的報告，張保民編輯，同前引書，頁 56。

<sup>36</sup> 同註 32。

共的說法來描述，也就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實事求是」。他們強調鄧小平理論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那麼「繼承」與「發展」所指為何？乃是其共有的中心——辯證法。中共視唯物辯證法，不但是「世界觀」、亦視作「方法論」：世界觀主要是表現為理論形態；方法論則主要表現為實際形態。方法論具有一定的層次性，即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思想方法主要是指人們認識問題、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的一般方法；工作方法主要是指人們改造世界的實踐方法，對領導者來說就是領導方法。<sup>37</sup>因此，鄧小平理論，不但是根據辯證法所產生的，同時也是在不同實際中所產生的辯證法思想。由此，可以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一脈相承。但是，既有發展，則有異同。於此，將更進一步了解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的辯證思維及其運用。

## 一、毛澤東的辯證思維與運用

中共認為「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在中國傳播的產物，又是中國共產革命具體實踐催化的結果。既是毛澤東個人智慧和經驗的產物，又是集體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又使唯物辯證法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即融合中西、貫通古今。它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sup>38</sup>」鄒讜則認為：「馬克思把唯物辯證法思想主要運用於知識上科學上的探索以及學術上的討論，毛則把它帶到革命的領域中去，把它用於研究革命形勢，制定綱領，或者至少用來使政策合理化，同時使他和黨內外敵人的鬥爭合法化。<sup>39</sup>」原則上，毛澤東結合了

---

<sup>37</sup> 陽作華、張峰編著，同前引書，頁 422。

<sup>38</sup> 同上註，頁 392~397。

<sup>39</sup>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4），頁 77。

中國及西方的辯證法，並應用於政策制定及科學理論之層面。

毛澤東的著作中，具有辯證法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代表性文章，包括 實踐論，1937年、 矛盾論，1937年、 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 論十大關係，1956年、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1957年、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1963年、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3~1965年等。但從這些文章中發現，似乎毛澤東把唯物辯證法，一律歸於「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的觀念。大有以矛盾觀念代替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之勢，至少可以說是在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中特別強調對立統一規律的功用，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的核心，其功用可以概括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中之其他規律，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範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繫、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說明。蓋所謂聯繫就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繫，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鬥爭的結果。至於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應與現象本質、形式內容等等，在核心規律的指導下予以說明。<sup>40</sup>」

從 矛盾論 一文的論述可以得知，毛澤東是以「矛盾規律」作為世界觀、認識論以及方法論的基本架構。毛澤東在 矛盾論 中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sup>41</sup>」為何矛盾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毛澤東說：「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sup>42</sup>」這就是毛澤東所講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共性）。何謂「矛盾法則是思維的根本

---

<sup>40</sup>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頁847。

<sup>41</sup>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頁310。

<sup>42</sup> 同上註，頁280。

規律」呢？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從認識的矛盾運動過程的角度來說明：人的認識運動也是充滿著矛盾的運動形式，主觀與客觀的矛盾、認識與實踐的矛盾、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矛盾、真理與謬誤的矛盾等，這些矛盾是人類認識運動所固有的，分析和解決這些矛盾，就必須運用矛盾法則，因此，矛盾法則也是認識的根本方法。同時，毛認為，世界上各種事物之所以有千差萬別，是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因而構成區別於他事物的本質，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個性）。

基於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新概念。毛澤東認為：「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把握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就是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這個主要矛盾方面取得支配地位，而由它主要地規定事物的性質。然而這種情形並非固定，當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時，則事物的性質也隨之產生變化。這個變化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sup>43</sup>」毛澤東認為，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正確地把握，就是決定共產黨在政治、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

接下來毛澤東進一步闡釋對立的統一性和鬥爭性：「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但矛盾著的各方互相與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作為自己存在的條件，所以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繫、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互相轉化，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sup>44</sup>」然而矛盾的

---

<sup>43</sup> 同上註，頁 294~301。

<sup>44</sup> 同上註，頁 301~303。

鬥爭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種性質，叫做鬥爭性。對此，毛澤東引用列寧的話：「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時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sup>45</sup>」如此，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後，毛澤東更進一步指出，矛盾學說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不僅在於告訴人們如何認識矛盾，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矛盾，因為「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sup>46</sup>」。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sup>47</sup>」運用不同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觀點成為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時兩類矛盾的張本，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觀點<sup>48</sup>，前者透過批評和團結的過程為之，後者卻要進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矛盾規律」構成毛澤東辯證法的重要範疇，基本上，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毛並未改變他對矛盾規律的設想。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再次以「對立統一規律」的辯證範疇肯定他早期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

---

<sup>45</sup> 同上註，頁 306。

<sup>46</sup> 同上註，頁 284。

<sup>47</sup> 同上註，頁 286。

<sup>48</sup> James Chieh Hsiung 認為毛澤東的「敵我矛盾」概念可說是導出於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內部的矛盾」或「非敵我矛盾」概念是受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陰陽說」影響的產物。所以如同陰陽矛盾，毛的「非敵我矛盾」不是真正對立的兩極關係，而是在從資本主義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以後也可能繼續存在的矛盾。James Chieh Hsiung,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 103.

的運動和變化。<sup>49</sup>」雖然他當時對矛盾規律展開了系統而周詳的論述，卻對「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律」未暇論及。至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中，卻說辯證法其「基本東西是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對立物的矛盾轉化，沒有什麼否定之否定<sup>50</sup>」，由此取消否定之否定規律。毛澤東在闡述對立統一規律時，經常沿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觀念，特別是「一分為二」命題和「兩點論」。他說：「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sup>51</sup>」「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sup>52</sup>」他用這些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觀念，來較通俗地解釋對立統一規律，使群眾容易接受辯證法，在某種程度上，有積極的意義，如他說的：「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sup>53</sup>」

如此觀之，毛澤東逐漸以「一分為二」的命題取代對立統一規律，脫離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sup>54</sup>更接近於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辯證思維。不過，後來到了一九六四年，對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以「合二而一」的命題闡述對立統一規律的論點，毛澤東展開了一場大「圍剿」式的批判，<sup>55</sup>便形成用「一分為二」來否定「合二為一」，只講對立

---

<sup>49</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72。

<sup>50</sup> 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8月），頁 558。

<sup>51</sup> 黨內團結的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98。

<sup>52</sup>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285。

<sup>53</sup>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98。

<sup>54</sup> 姜新立教授認為，毛澤東的「矛盾論」就是「一分為二的唯物辯證法」，今天中國大陸所學習的唯物辯證法就是這種毛式「一分為二法」，「也大大地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徹底庸俗化的結果。」，參閱，姜新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頁 445~501。

<sup>55</sup>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在其講義中提出「合二而一」論。他認為，任何事物內部兩個矛盾對立面，經過鬥爭之後，新的戰勝舊的，最後取代了舊事物，達到統一。他的學生、高級黨校哲學研究室教員艾恆武和林青山，根據楊獻珍的觀點，寫了「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文章發表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報》上。當時，中蘇正展開激烈論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與《紅旗》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指責蘇共與帝國主義搞「全面合作」、「和平共處」，楊的理論被指為宣揚美帝蘇修的階級調和論。其後，一九六四年八月，第十六期《紅旗》雜誌亦發表文章「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指楊獻珍在國內外階級鬥爭尖銳時，大肆宣揚「合二而一」論，是

不講統一，只講鬥爭不講聯合的高壓氣氛。一九六六年發生「文化大革命」，「一分為二」變成為「鬥爭哲學」的代號和「繼續革命理論」的基石，就違背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妥協、配合、平衡、和諧的原則。

毛澤東曾經說：「列寧主義學說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那些地方發展了呢？第一、在世界觀，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方面發展了它；第二、在革命的理論、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別是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上發展了它。列寧還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這是馬克思主義所沒有的。我們學的就是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sup>56</sup>」何謂基本原則，毛澤東認為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sup>57</sup>但是毛澤東在他晚年越來越脫離實際，而造成了自己違背自己辯證法的錯誤。對此，一九八一年四月，鄧小平同負責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小組提出意見：「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sup>58</sup>」是否因為如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內容記載僅至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而到目前為止仍然未出版第六卷呢？這就是一個大問號。

綜括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從思維形式和語言形式來看，一方面，毛澤東注重結合中國傳統哲學思維的特點來表述辯證法的原理。例如，以「一分為二」和「兩點論」來表述「對立統一規律」，以「相反相成」來說明矛盾的同一性，以「知行具體的歷史統一」來表達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等。另一方面，毛澤東運用通俗的語言來表述辯證法的命題；例如，以「實事求是」來表述辯證法的思想路線，以「看菜吃飯、量體裁衣」來說明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的思想等等。另

---

有意識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論。同時，也是有意識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了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章斷言：哲學戰線上這場誰戰勝誰的新論戰，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參閱，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台北：淑馨出版，1992），頁 250~251。

<sup>56</sup>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22。

<sup>57</sup>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756。

<sup>58</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頁 258~259。

外，從中國傳統哲學範疇的批判繼承方面來看，對《周易》中「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表述的「陰陽」範疇，毛澤東肯定其合理意義，就創新「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將矛盾論成為解決內部矛盾的方法論。

中共的辯證法在理論體系上來源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但是，一種理論的傳播和產生及發展總是要有一種土壤環境的，理論在一個特定條件下的傳播就要求在內容上吸收和融合當地文化遺產的合理內涵，在形式上具有適合特定環境的文化風格。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sup>59</sup>」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毛澤東思想的貢獻是不可忽視，它一方面吸取中國古代辯證法的思維形式和語言形式，另一方面也批判地吸收中國傳統哲學範疇中的辯證法思想。

如此可知，「毛澤東的辯證法」，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在中國大陸共產化過程中，並與中國革命實踐及文化傳統相結合而產生的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其核心內容為「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其基本形式為「一分為二」。其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論，而在於革命鬥爭的方法論。

## 二、 鄧小平的辯證思維與運用

雖然毛澤東曾經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總之，要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sup>60</sup>」不過，由《鄧小平文選》觀之，鄧小平沒有專門論述過辯證法問題的篇章，但其核心思想充滿著辯證思維。鄧小平辯證思維在實際運用上最突出的，就是以「實事求是<sup>61</sup>」的思想

---

<sup>59</sup>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534。

<sup>60</sup>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62。

<sup>61</sup> 「實事求是」本是一個古老的詞語，最早出自東漢班固所著《漢書·河間獻王傳》，書中稱讚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學者顏師古曾把它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也」。意思說，做學問，務必掌握充分的材料，從中求得正確的結論。參閱袁貴仁，《當代中國

來詮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統，鞏固政治權威，建立鄧小平理論。因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浩劫，不僅敗壞了毛晚年所實行的政策的聲譽，而且也敗壞了毛澤東思想的聲譽。人們對毛的政策、毛澤東思想和毛的作用的懷疑導致了另一些問題：例如，馬列主義是否依然有效；社會主義是否果真比資本主義優越；人民共和國是否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台灣）強；「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適；中共應否繼續領導國家。<sup>62</sup>這樣一場深刻的權威危機依靠全盤否定毛和毛澤東思想是不能克服的。如果這樣做，會使中共與自己的過去隔絕，破壞黨的自我特性，動搖黨和國家的根基。因此，鄧小平用毛澤東思想作為重新解釋毛澤東思想的依據。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sup>63</sup>」同時鄧自認為是「實事求是派<sup>64</sup>」，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徒。他進一步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sup>65</sup>」然後鄧小平基於事實求是思想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人，始終堅持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毛澤東同志歷來對自己的評價。<sup>66</sup>」；「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

---

的唯物辯證法 鄧小平著作中的哲學思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頁38。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把這個古老的概念闡述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759。

<sup>62</sup> 鄒讜，同前引書，頁115。

<sup>63</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121。

<sup>64</sup>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曾有外國朋友詢問鄧小平是屬於哪一派時，他坦誠地回答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頁43，轉引自：陽作華、張峰編著，同前引書，頁428。

<sup>65</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242。

<sup>66</sup> 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公報，張保民主編，同前引書，頁9。

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sup>67</sup>」；「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sup>68</sup>」如此一來，鄧小平把毛澤東思想和毛分開來，恢復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本質，進一步把毛澤東思想運用於新的形勢，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69</sup>」。

通過共產革命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共，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特別是在經濟低度發展落後的中國大陸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共的總工程師鄧小平而言，乃是一項念念不忘的歷史課題。鄧小平認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sup>70</sup>」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中共決定黨的工作重點，將文革時期的階級鬥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至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主義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來<sup>71</sup>」；其後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正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由此，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涵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了。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具有非常豐富的辯證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根據毛澤東的矛盾規律看來，就是個性與共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

---

<sup>67</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271。

<sup>68</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116。

<sup>69</sup> 同上註，頁 3。

<sup>70</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182。

<sup>71</sup>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張保民主編，同前引書，頁 38~39。

統一。它的個性是中國特色，它的共性是社會主義<sup>72</sup>。從其內涵中看，重要的辯證思維模式是重點論方法和兩點論方法：所謂「重點論的方法，即抓重點、抓中心的工作方法。重點論既是對立統一規律關於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原理的實際運用，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具體化。毛澤東在談到重點論的方法論意義時曾指出：『有重點才有政策，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sup>73</sup>」在鄧小平理論中，重點論的方法最明顯的，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和「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及在「兩個制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以社會主義為中心的方向等；就兩點論的方法而言，則是指「人們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事物矛盾的方法論。兩點論同兩分法、兩重性、一分為二等等，是本質上一致的概念。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內部都存在著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兩個側面。<sup>74</sup>」兩點論方法，鄧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有非常豐富而生動的表現。例如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強調改革開放；既要抓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建設，也要抓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既發展市場經濟，也重視宏觀調控；既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防止「兩極分化」；既堅持祖國統一，又實行「一國兩制」等等。這一系列的關係，都是相互對立或互相有差異的。

中共是否能夠同時達成這些矛盾著的理想目標？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看來鄧小平的這樣重點論和兩點論模式的辯證思維，其主要企圖在於以因勢利導、適當操作，把對立或差異的雙方完全可以起到相互依存、有機結合、互動互促的作用。因此，與毛澤東的辯證法比較起來這種鄧小平的辯證思維相對地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而且接近於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

鄧小平審視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環境，復由於其歷經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所以在中國改革前進的過程中，提

---

<sup>72</sup> 遲愛萍，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繼承與發展，《龍平平、張寧主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哲學思想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頁154~155。

<sup>73</sup> 陽作華、張峰編著，同前引書，頁424。

<sup>74</sup> 同上註，頁423。

出了「實事求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主張，做為中國改革的論據，這充分顯現其以「實踐」是否為有效性的判準；因此，才能宏觀地融合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衍生出的各項配套措施，企圖宏觀而擇優的將中國文化與當代科學文明相互轉化與調和，使馬列主義中國化，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事求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建設歷程。這種整體而調和、宏觀而擇優、調控而轉化、階段而調適的特質，正是基於歷史文化的宏觀認知，以實踐為判準而應用辯證法的歷程，於是構成了鄧小平辯證思維的特徵。

### 三、 江澤民的辯證思維

江澤民雖然沒有提出明顯的辯證架構，但是從其論述終究可瞭解其仍是主張辯證法的應用，「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任何時候都絲毫不能動搖的。一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如果在思想上動搖了這些根本的東西，也就動搖了共產黨人的根本政治立場，就必然會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sup>75</sup>」這充分顯現江澤民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領導決策之理論依據和規範黨員之工具，統籌意識型態和行為標準。江澤民又說：「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在內部矛盾的不斷運動中向前發展的。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總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逐步深化的。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不斷地認識和改造主觀世界，通過不斷地認識和改造主觀世界又不斷地深化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這是我們推動事業向前發展的規律，也是我們黨的幹部成長進步的規律。<sup>76</sup>」由此可

---

<sup>75</sup> 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第一版。

<sup>76</sup>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9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1998年4月2日），第一版。

知，江澤民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毛澤東的「矛盾論」和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的繼承人。

江澤民是被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所提拔，一進中央政治舞台，就成為領導核心。但江與鄧不同，沒有足夠的威望來建立領導權威，因而影響到政策的順利執行乃勢所難免。鞏固領導權力地位，不僅悠關其個人，且是共產黨統治地位的維持及國家穩定。江澤民領悟到這點，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發表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的講話。江澤民在講話中列舉的「重大關係」包括：第一，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第二，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第三，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第四，第一、二、三產業的關係；第五，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第六，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第七，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份的關係；第八，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第九，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係；第十，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十一，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第十二，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sup>77</sup>

中共理論家劉吉將江澤民提出的「十二大關係」歸納，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改革存在著兩大阻力：一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乃是「人民內部各種利益格局、利益關係的調整和組合而引出的各種不同觀念的碰撞和摩擦。」；另一方面是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搗亂。<sup>78</sup>」對於中共領導者江澤民而言，這些問題不僅是威脅其權力地位鞏固，並且構成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及國家穩定的挑戰。於此，江澤民強調：「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各種關係，特別是若干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係。正確處理這些重大關係要貫徹一個總的思想，就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搞現代化建設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

---

<sup>77</sup> 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人民日報》（1995年10月9日，第一版）。

<sup>78</sup>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64。

和新問題，明確我們應當堅持的原則。目的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把握客觀規律，統一全黨認識，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sup>79</sup>」由此觀之，江澤民以一手抓鄧小平的理論來使其統治行為合理化，又以一手應付各種挑戰，乃是「兩手抓硬」的辯證思維的應用。江澤民進一步強調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是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也是我們認識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鄧小平理論強調，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是彼此聯繫、相互統一、不可分割的。在鄧小平同志著作中，改造主觀世界的內容十分豐富。對於新時期共產黨員必須改造世界觀、增強黨性，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群眾，堅持身體力行共產主義道德、做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模範，堅持遵守黨章、嚴守黨的紀律等方面，鄧小平同志都有大量論述。這對於我們改造主觀世界，牢固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和實踐。<sup>80</sup>」如此，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大旗，並持續推動中共現行的各項政策，讓反對者無言以對，顯然辯證思維的延續與應用，乃是江澤民鞏固權位的護身符。

針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向中國大陸推行「和平演變」之戰略，中共展開了「和平防變」思想工作。一九九六年六月，在《關於講政治》一文中，江澤民強調：「我們講的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民主應該適合自己的國情。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執政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最適合我國國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些人

---

<sup>79</sup> 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人民日報》（1995年10月9日，第一版）。

<sup>80</sup> 江澤民，在學習鄧小平理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98年7月17日），《人民日報》（1998年10月16日），第一版。

總想把他們的議會民主那一套東西推廣到全世界，成為普遍的模式。這是一種空想。西方有什麼上院、下院，我們的最高權力機構就是一個，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sup>81</sup>」然而面對來自內外的挑戰，為了強化思想工作，中共進一步展開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三講」教育。江澤民說三者的關係為緊密相連和相互統一，核心在於「講政治」，所謂「講政治」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要堅定正確的理想和信念；第二、要善于從政治上正確認識和判斷形勢；第三、要在路線方針政策上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第四、要自覺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第五、要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sup>82</sup>中共要幹部「講學習」的主要目的和內容，江澤民指出：「全黨同志要繼續加強學習，提高自己，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當今時代，是要求人們必須終生學習的時代。不實現知識的不斷更新，就必定要落後。我們應該用寬廣的眼光觀察世界和自己的實踐，堅持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學習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奮鬥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學習一切反映當代世界發展的新知識，學習做好工作所必需的一切知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是經濟社會發展之本，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堅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努力把經濟建設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sup>83</sup>」

依江澤民的講話看來，「三講」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強化思想工作，而其主要內容是鄧小平思想。此外，江澤民從馬克思的科學世界觀和鄧小平理論，因應當代科學文明的快速發展，及其學習與知識之背景，衍展出「科教興國戰略」。

---

<sup>81</sup> 江澤民，關於講政治（1996年3月3日），《人民日報》（1996年7月1日），第一版。

<sup>82</sup> 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第一版。

<sup>83</sup>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1998年12月19日），第一版。

江澤民說：「我們不僅要靠科學技術提高物質文明的發現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建立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科學、用科學、愛科學、講科學的社會風氣和民族精神，創造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社會精神風貌。<sup>84</sup>」而且科學技術和國家現代化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特別是像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和人口眾多的民族，如果沒有科學理論的武裝和對各種新知識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騰飛，不可能有現代化的前途。<sup>85</sup>」於此，江澤民強調：「我們應有充分的估計和認識。我們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注意加速科技進步，加強科技創新。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我們要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復雜的國際鬥爭中取得主動，要維護我們的國家主權和安全，必須大力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大力增強我國的科技實力，從而不斷增加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sup>86</sup>」

二 年二月，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初步概念：「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只要我們黨始終成 中 國 先 進 社 會 生 力 的 發 展 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sup>87</sup>」到了五月，江澤民說「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推進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都應貫穿『三個代表』的要求」，「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黨的建設是長期的歷史任務，要貫穿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現代

---

<sup>84</sup> 江澤民 在接見全國科普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96年2月9日），《人民日報》（1996年2月10日），第一版。

<sup>85</sup> 江澤民，學習學習再學習（199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627。

<sup>86</sup> 《人民日報》（1999年8月24日），第一版。

<sup>87</sup> 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強調緊密結合新的歷史力的發展，《人民日報》（2000年2月26日），第一版。

化建設的全過程。<sup>88</sup>」此後，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大力宣傳「三個代表」，這一「重要思想」，故專家認為，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肯定會在二〇〇二年舉行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寫進黨章，如同中共曾在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大上，把鄧小平理論寫進黨章內，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為中共的指導思想<sup>89</sup>。

由此可知，江澤民的「治黨」、「治國」的大戰略，即「科教興國戰略」，乃是以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三講教育」為強化思想工作，以「科學技術」為發展國家現代化的方法，以「三個代表」為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理論。然而在科學發展與現代化的歷程中，如何汰劣存優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依據江澤民的言論，都必須經過科學與實踐的分析與檢驗之後，再以辯證法進行宏觀調控，而成為其可應用之資源。江澤民指出：「為什麼要突出強調改造主觀世界的問題呢？我們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如果頭腦裏沒有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就不可能以正確的立場和科學的態度來認識紛繁複雜的客觀事物，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就不可能正確地理解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避免工作中的偏差；就不可能站在時代的前列，團結和帶領廣大群眾前進。還要看到，我們工作和生活的環境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新事物、新知識、新思想在不斷湧現，各種消極的、腐朽的東西也在隨時影響著人們。只有加強主觀世界的改造，才能辨別良莠，吸收好的東西，抵禦壞的東西。<sup>90</sup>」

江澤民在中共的鬥爭環境中，不但能夠生存且終掌有最高權位，此絕非倖致，而是必須深切的體會瞭解中共組織與社會中的生存法則，而這種組織與社會中的生存法則，如果以辯證法來表達應較為適當。江澤民的辯證思維，除了主張馬克思的世界觀之外，更強調其科學性的價值；除了肯定毛

---

<sup>88</sup> 《人民日報》（2000年5月16日），第一版。

<sup>89</sup> 俞劍鴻，大陸的經濟路線兼論為何北京尚未對台北做出政治上的讓步：一個兩點論的分析。

<sup>90</sup> 《人民日報》（1998年10月16日），第一版。

澤東的革命理論與群眾運動之外，也將教育力量視為其可應用的資源；除了承續鄧小平的「實踐」論與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外，也企圖把建設過程中的脫序思想與力量，重新解釋與建構，運用科學技術與理論，釐清傳統與現代之互動關係或結構，以發揮宏觀調控的實際效果。

#### 第四節 小結

黑格爾應用辯證法而將世界哲學化；馬克斯則以唯物論做為世界結構的基礎，但在方法上仍是沿襲辯證法的途徑；毛澤東特別強調矛盾律的應用，將辯證法移植到革命理論與群眾運動之中；鄧小平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一步運用辯證法將馬列主義中國化，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江澤民提出「科學」作為實踐方法的判準，使科學新知結合辯證的傳統力量，宏觀調控的制訂政策，深入組織結構而控制社會力量之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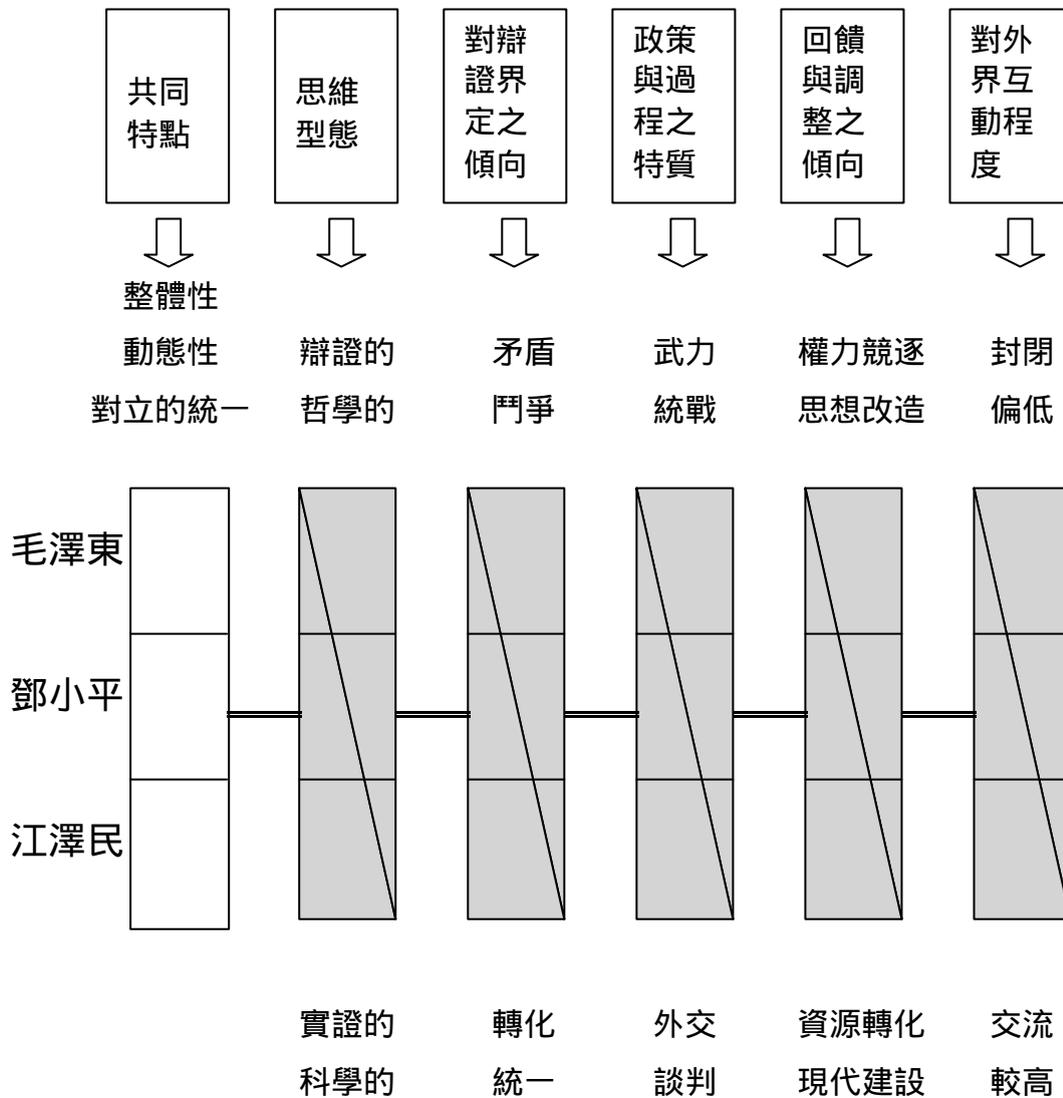
中共從領導中國大陸政權至今，主要經歷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的統治，從辯證思維而言，此三者所強調的重點與方法上仍有差異（見圖 2-1）。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對辯證法的應用到政策層面，各因其認知與時空因素，而具有不同的重點與特質，茲析述如后：

在共同特點方面：三者皆強調整體性與動態性的觀察和整合。在思維型態方面：毛澤東較強調辯證的、哲學式的類比附會之思考方式；鄧小平則在實踐過程中，突顯出演繹的價值；江澤民則在承續了辯證法的傳統力量之餘，更隱含循科學方法為判準的本質與型態。

在辯證的界定方面：毛澤東較強調矛盾與鬥爭的應用；鄧小平則在處於轉化的過程中，突顯出實踐性與綜合性的辯證思維之價值；江澤民在承續了體制轉化階段與擁有主控之權位後，更強烈護衛「整體而統一」的辯證作用與歷史使命，這也是辯證思維的界定與應用。

圖 2-1：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對「辯證與政策」的應用架構



註：

- 一、各區域的大小變化代表其成分傾向之概況。
- 二、—— 雙實線代表各子題項目間互為因果、交互影響之關係。
- 三、本圖係以共同特點、思維型態、對辯證界定之傾向、政策與過程之特質、回饋與調整之傾向以及對外界互動程度等六個層面，分別對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共三位領導者對「辯證與政策」的應用進行分析比較。

在所衍生的政策方面：毛澤東較強調武力與鬥爭的應用；鄧小平則較能透過外交與談判，突顯出辯證的作用；江澤民進而在國際組織的體制互動下，企圖運用辯證法而掌握主控地位。

在回饋與調整方面：毛澤東重視權力競逐以滿足其慾望，因而必須改造人民的意識型態，作為其政權的護衛工具；鄧小平為因應國內外的情勢，必須突破生存困境，妥善處理國內問題及國際關係的衝擊與變遷，而辯證法適足以作為轉化的依據與方法；江澤民則強調各種資源轉化，以作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現代化國家，但對各種社會力量的發展與控制，則以辯證思維作為折衝論衡的基礎。

在對外開放方面：極為明顯的，三者之中以毛澤東時期較為封閉，對外開放極低；鄧小平則較能因應經濟需求，而進行內部政策革新，開放與建設大陸經濟特區，逐漸地實施各項改革工作；江澤民更企圖積極參與區域性的、世界性的或功能性的各種國際組織，以提昇中共的國際地位，滿足大陸經濟發展的主客觀條件，並作為刺激內部轉化的動力。

從上述的說明中，可以瞭解中共經過此三者的領導風格與辯證認知下，均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應和回饋措施，因此，本文將以本架構的運作過程中，試圖說明中共自執政以來，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規律，其內在因由、互動歷程與影響評估，期能從本文策論中，正確地理解中共與韓半島之外交關係，以提升良性互動而能產生規範性之價值。

### 第三章 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與實際

本章將要提出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與實際，從三種層次上探討：第一、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在變化無常的國內外環境中，如何認識外部環境，以及怎麼樣制定其外交政策；第二、在中共政權結構上，參與外交政策制定的是那一些組織，以及這些組織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互動關係的特徵是什麼。第三、從中共五十年的外交實踐中要抽繹出其外交行為的規律。

#### 第一節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辯證法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我國領導人在從事國際活動和領導對外關係實踐時，總是很注意掌握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對於國際形勢的分析是通過認識世界基本格局和戰略格局來達到的。從我們的外交實踐中可以認定，領導人的思想認識確是一種重要因素。<sup>1</sup>」基於他的言論判斷，中共領導人對客觀環境的認識，是了解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關鍵因素。Robert Jervis 也認為，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不是完全依照理性的原則進行，而決策者通常以自己的價值標準、想法與判斷作為考慮的標準。<sup>2</sup>決策者對於客觀環境認識的這些標準，以中共的語詞表達，可稱為世界觀。

毛澤東曾經在 *實踐論* 中提出，人對事物的認識過程，第一階段，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性認識階段，在這階段，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第二階段，是理性認識階段，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

---

<sup>1</sup> 謝益顯，*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88年第2期，頁12~17。

<sup>2</sup> 參閱：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1976), pp. 117~142.

界的發展，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sup>3</sup>。即他們在認識過程的第二階段，基於自己的「世界觀」來規定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其實，人們的行為很大一層意義上是要肯認自己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幾乎決定了人們如何接受訊息、儲存訊息與使用訊息<sup>4</sup>。中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就是把接受的訊息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思維與判斷重新整理而找出內部的規律性來把握客觀世界。所以，中共的世界觀就直接指導其領導人對國際環境的認知。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明白表示，「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sup>5</sup>」對毛澤東而言，「矛盾規律」是其辯證法的核心，所以，至少在毛澤東執政的時候，它就成了中共的世界觀、認識論的基本架構。中共官方認為「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本人和周恩來、鄧小平等，在戰後國際鬥爭極其尖銳複雜的背景，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階級鬥爭的普遍原理指導中國進行外交鬥爭實踐的具體產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從方法論上講，是嚴格建立在對國際社會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而中國不同時期外交鬥爭的戰略目標的選擇就是以對國際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客觀認識為基本依據的。<sup>6</sup>」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中說：「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應加以區別，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志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黑時期和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sup>7</sup>」這些「統

---

<sup>3</sup>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頁259~267。

<sup>4</sup>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17。

<sup>5</sup>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310。

<sup>6</sup> 滕藤，「學習與弘揚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頁20。

<sup>7</sup> 論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722~723。

一戰線」策略，就是從「矛盾論」中衍生出來的，因此，「辯證」世界觀可說是中共認識客觀實際的一個基本的思維方法，又是外交政策執行的實踐方法。

其實，鄧小平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也是一種辯證思維方法的一種，其外交政策也是根據「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論」重新解釋在新格局中主要矛盾的所在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新認識所制定的。一九八五年三月，鄧小平對於世界形勢與時代主題作出估計：「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sup>8</sup>」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當前的國際局勢儘管錯綜複雜，戰爭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不斷增長，經過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爭取實現世界和平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不同超級大國結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既是中國實現振興經濟宏偉目標的需要，也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有力推動，完全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我國在前進道路上遇到什麼問題，也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們都將堅定不移地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長期堅持下去。<sup>9</sup>」

經過「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指出：「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複雜得多，亂得多。怎樣收拾，誰也沒有個好主張。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

---

<sup>8</sup> 鄧小平，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04。

<sup>9</sup> 趙紫陽，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87年4月13日），第1版。

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sup>10</sup>」鄧的言論可以概括：首先，對於國際形勢的分析；其次，定位要扮演的角色；再者，外交原則的提出。

一九九九年六月，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正確分析和認識形勢，認清事物的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才能把握好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同美國等西方國家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關係，努力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更好地維護我國的安全和利益。最近一段時間，中央在處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武裝干涉南聯盟事務、襲擊我駐南使館的問題時，就始終注意從國際國內的大勢來加以審視和考慮，制定和執行了正確的方針與對策。總之，無論看待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都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sup>11</sup>」

從這些中共領導者和相關外交政策決策者發表的談話、文件、著作中，<sup>12</sup>我們可以抽繹出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規律——中共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根源和過程——就是中共根據怎樣的世界觀；如何認識國際環境；中共對自己在國際社會中要扮演角色的確定；其具體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在國家社會中執行其政策。

因此，對於中共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以空間的模型和時間的模型分別進一步探討，中共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由（圖 3-1）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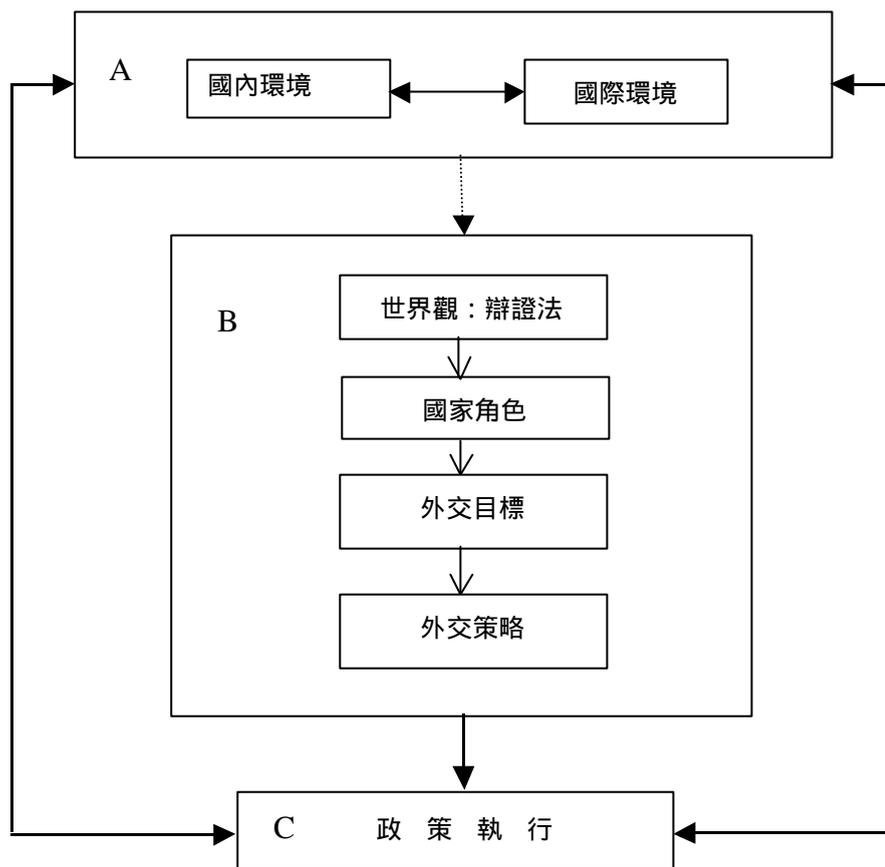
---

<sup>10</sup> 鄧小平，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68。

<sup>11</sup> 《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第1版。

<sup>12</sup> 這些中共領導者發表的言論，只是不同時期不同領導者的代表性發言而已，不過，在其他更多的相關中共外交資料中，我們容易找得到與此雷同的談論。

圖 3-1: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



A：實際層次 B：理論層次 C：實踐層次

↔ 相互關係                      - - - - -> 限制關係  
 → 因果關係                        ———> 目的關係

此圖可說是從空間角度切入分析的模型，由「實際」、「理論」和「實踐」三個層次的因素之互動組成。

「實際層次」而言，是個客觀世界，它就是中共的決策者根據其世界觀認識其身處之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對辯證唯物主義而言，客觀世界是由物質構成，它在普遍聯繫中有規律的運動和發展，其根本原因在於事物自身內部的矛盾性，矛盾是客觀的普遍存在的。毛澤東指出：「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sup>13</sup>」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是個由其內部的矛盾而不斷變化、運動、發展的客觀世界，影響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所以，我們可以將它作為「獨立變數」（或自變項）。

「理論層次」包括「世界觀」、「國家角色」、「外交目標」和「外交策略」的四個部分。所謂「世界觀」指的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對整個世界根本的觀點，它牽涉及高層決策者對於世界基本結構與秩序的看法。<sup>14</sup>就中共而言，無疑為辯證法。通常中共最高決策者根據辯證法，認識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矛盾，以及世界戰略格局和具體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提出一套國際關係理論，例如：「兩大陣營論」、「中間地帶論」、「兩個中間地帶論」、「三個世界論」、「和平與發展」、「多極化」等。國際關係理論就中共的解釋，不僅是一項解釋的工具或者透過國際事務所觀察到的所謂「光譜」，而且更重要的是國際行動與外交政策的指標。<sup>15</sup>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是相對客觀世界，而它們發生變化時通常會對一個國家外交行為的後果帶來衝擊。雖然，客觀因素的變化或許會導致結果有所差異，但是，卻不必然會導致決策者其思維邏輯上的改變；促使決策者修改其行為模式必需待

---

<sup>13</sup> 矛盾論，頁 295。

<sup>14</sup>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頁 1。

<sup>15</sup>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4), pp., 482~483.

其本人在主觀的認識層面發生變化後，才有可能發生。<sup>16</sup>因此，我們可以把辯證法作為中共領導人制定其外交政策的「中介變數」。

就「國家角色」而言，它是由中共決策者認識各時期世界格局、主要矛盾與自我形象結合出來的角色。國家在世界格局中處於不同的地位，每一地位都有一定的行為模式。當一國家按照與自己的地位相對應的行為模式進行活動時，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國家角色概念包括幾個要素：國家在世界與地區上的任務觀念、國家間互動關係之準則、特定的正義秩序觀。<sup>17</sup>在自我確定角色時，主客觀因素乃是角色確定的背景動機。就中國大陸而言，主觀因素可能是意識形態、傳統文化等，客觀因素是其綜合國力的大小。雖然不同國家決策者對世界格局的看法有可能一致，但自我定位的國家角色，也會因其國家性質的不同，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處地位和利害關係的不同而不同。<sup>18</sup>由此可了解中共與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為何各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差別。

在中共外交言詞中常出現的，「堅持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修正主義、霸權主義、強權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民族和民主解放鬥爭；反對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維護世界和平與國家安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等，都表現了中共自我定位的角色觀。

再者，為了扮演或推進自我定位的國家角色，政策決策者就會形成一套「外交目標」。外交目標是國家在觀念上事先所建立的國家角色的未來結果，所以外交目標通常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或者正義觀，卻隱含著現實的國家利益。謝益顯認為：「新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自己對外政策的根本

---

<sup>16</sup> 明居正，〈中國外交史分析架構之再思考〉，《政治科學論叢》（台灣大學政系出版），第六期（1995年5月），頁271。

<sup>17</sup>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頁26。

<sup>18</sup>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88), 110~111.

目標。<sup>19</sup>」在中共十四大工作報告中，江澤民重新提醒中共外交的目標：「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sup>20</sup>」不過外交目標必須通過決策者運用「外交策略」改造國際環境的行動來實現，因此，較具體的「外交策略」遂在外交目標的導引之下被發展出來。因此，外交目標與外交策略，兩者同屬於「依附變數」（或依變項）。

「外交策略」與「外交目標」之關係可區分為策略的和戰略的、部分的和總體的、當前的和長遠的等等，前者強調重視策略的、部分的、當前的目標，後者重視戰略的、總體的、長遠的目標，並把前者為達到後者的橋梁。中共認為「中國外交的一大特色，是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周恩來提出的「求同存異」，乃是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辯證統一。<sup>21</sup>就中共外交策略而言，「堅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極少數主要敵人，並設法戰而勝之。<sup>22</sup>」外交策略不僅反映外交行為的方式和性質，而且包含外交的戰略目標。「從外交的戰略目標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在國際上，調動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必須服從於中國的經濟建設這一個中心和有利於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sup>23</sup>」

「實踐層次」所指的是外交政策的執行，乃是為了實現外交政策，國家在國際社會上所作為的具體的活動。外交策略是引起、指導、控制、調節外交政策執行的最直接的動因。對中共而言，外交政策的執行是以改造世界行動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一致的最一般的活動。但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

---

<sup>19</sup> 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頁 139。

<sup>20</sup> 中共十四大工作報告，共黨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共十四大綜合研究》（台北：法務部調查局，1993年），頁 111。

<sup>21</sup> 黃金祺，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中國外交的一大特色，《外交學院學報》，1986年第 2 期，頁 35~40。

<sup>22</sup> 鄰潤昌，毛澤東外交戰略思想探析，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頁 88。

<sup>23</sup> 滕藤，學習與弘揚毛澤東的外交思想，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頁 24。

的一致，不是簡單的統一，懂得客觀世界並不等於達到主觀世界。因此，中共強調：「我們還應在今後的外交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科學總結，以進一步發展。<sup>24</sup>」中共認為「質量互變規律的基本原理為人們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它要求人們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要重視量的積累，注意日常的細小的變化，不可揠苗助長、不切實際地急於求成；在事物的量變為實現質變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時，人們又要依據事物客觀進程，不失時機地促進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同時，人們對於不希望發生的事，則要防微杜漸，防止這方面的量的增長，避免不利事物的出現。在實踐活動中，按照質量互變規律辦事，是人們防止錯誤、取得成功的保證之一。<sup>25</sup>」

從辯證法角度看客觀世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統一體。這變化運動的自身，就是矛盾不斷發生與解決的結果。一切事物在形成之初，即含有與其相反的矛盾。這矛盾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原事物即發生對立鬥爭，後者否定前者，發生新的體系或現象。所以對外交決策者而言，不斷地分析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掌握主要矛盾，以建立國際關係理論，是不可或缺的任務。但判定國際關係理論之是否正確，乃是依附在國際社會上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這是因為決策者，常常受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著國內外環境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外交活動過程中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會出現理論脫離實際，就無法正確地制定及執行外交政策的階段。因而將部分或全部地改變理論、角色、目標、策略，以使其與國內外環境的規律性相符合，才能夠將主觀的理論變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無論如何，至此，政策決策者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可算是完成了。

中共的外交政策之調整，乃是通過世界觀認識實際（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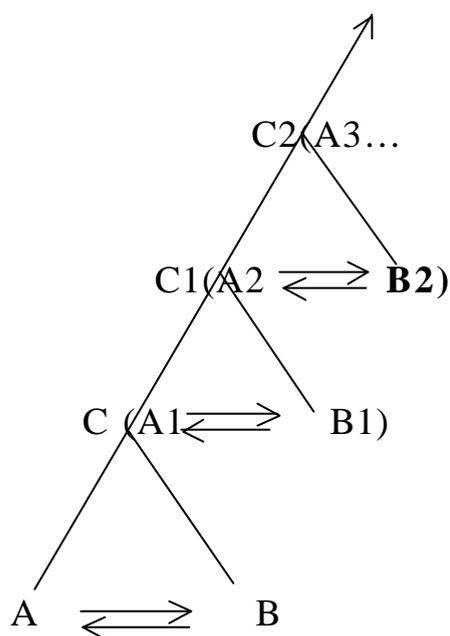
---

<sup>24</sup> 滕藤，同上註，頁 25。

<sup>25</sup>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正體字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版權 台北：錦繡出版社發行，1993 年），頁 1180。

內外環境)而建立理論，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理論與實際。認識實際、建立理論、執行政策(實踐)、再認識、再理論、再實踐，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認識、理論和實踐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從時間角度上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過程，可以(圖3-2)表之如下：

圖3-2：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辯證過程



A：理論，B：實際，C：狀態

以A為理論，是針對實際B出現矛盾而無法解釋B的情況；以B為在時間B中的國內外環境，乃是實際層次；以C為互相矛盾的理論與實際經過認識和實踐所產生的，乃是矛盾對立統一的狀態，即(A B) C。C之中B1即國際環境又出現變化，因此，經過C產生的A1與B1又出現矛盾，又經過再認識和再實踐，並產生新的統一狀態，即(A1 B1)=C1；這種「理論 認識」與「實際 實踐」、「新理論 再認識」與「新實際 再實踐」之矛盾統一的活動，是個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進程，而理論和實際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對此，特別要注意的是，認

識和實踐不是各別孤立的行為，而是互相連繫統一的行為，例如，政策執行和情報蒐集是不同方向之同一行為。

從時間角度回顧中共建國以來的對外關係，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政策的轉變，可能以中共對國際環境的認識和理論的調整與改變國際環境的實踐為說明。換句話說，中共五十年外交政策的演變，大都是主要矛盾和戰略格局的認識而建構的理論和政策有關：例如，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到五十年代末，中共根據「中間地帶論」、「兩大陣營論」，制定「一邊倒」政策；在六十年代根據「兩個中間地帶論」，制定「兩條線」政策；在七十年代根據「三個世界論」，制定「一條線」政策；在八十年代根據「和平與發展論」，制定「獨立自主」；從九十年代中葉以來根據「多極化」，制定「夥伴外交」。

## 第二節 政策制定結構的辯證關係

### 一、中共政治體制 黨、政、軍的辯證關係

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之因素，不僅是國際環境而已，國內環境（如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等）也是重要之因素。各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影響該國外交政策行為的關鍵之一。許多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學者和專家均認為中共政治制度和決策過程，從根本上說，是以權威主義、高度集中、個人化、非制度化為本質。<sup>26</sup>不過，他們認為從鄧小平執政以來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發生了重大變

---

<sup>26</sup> 參閱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 200;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Introduction: Core Issu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cision Process",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 from Insider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5); Quansheng 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9.

化，這些變化最明顯的特徵，乃是包大可（A. Doak Barnett）描述的「從個人決策轉變為集體決策<sup>27</sup>」。

不論各國的政治制度為民主主義、權威主義或極權主義，其重要外交政策的決定，通常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最高領袖的意見。在不同時期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最高決策者，例如，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或周恩來），他們對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程度，如同在前者的研究中所發現，隨時以個人決策變化為集體決策，仍然是以權威主義為特色，這些分析的結果與實際之間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差距。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領導人，他們本來也就是在某種結構中，扮演特定行為者的角色和身份；並且，在變化多端的國際社會裡，他們也都必須仰賴其結構中的一些機構，才能夠觀察和分析各國的情勢以及國家之間關係的特徵，以決定在不同時空中的不同對外政策。因此，若忽視在不同時空中的結構之特色，則對於外交政策為何會出現變化，可能較不易答覆。所以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時，除個人外在結構中的不同機構應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中共政權基本結構由共產黨、政府和軍隊三大系統所組成（見表 3-1）：從縱向來看，中共政權結構，按政府層級自上而下有中央、省、地區（市、州）、縣和鄉的五個層級。每一個層級的各組成員，按照其所處層級，在機構中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一個森嚴等級為特徵的中共政權，原則上，較容易產生兩個現象：首先，每個成員是由上級領導指定其地位，每個組成員只對他的上級負責，而不是對他該服務的對象負責；再者，沒有上級的命令或允許，個人較不會採取主動行為。<sup>28</sup>但在處理問題時，這種結構具有兩大好處：一是在政策的執行時，因俱備由上而下的命令系統，可以維持執行上下一貫的政策；另一是，政策制定時，如果同級機構之間意見或利益矛盾對立，就向上級請求裁決，較容易達成矛盾對立的統一。

---

<sup>27</sup> A. 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5), p. 16.

<sup>28</sup>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1995年），頁 18-19。

表 3 - 1：中國政權結構

三大系統		共產黨系統			政府系統			軍隊系統
七套機構		黨的 委員會	* 顧 問 委員會	紀 檢 委 員 會	人 民 政 府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軍 區
五 個 層 級	中 央	黨中央	中顧委	中紀 委	國務院	全國人 大	全國政 協	中央軍委
	省	省委	省顧委	省紀 委	省政府	省人大	省政協	省軍區
	地(市)	市委	(市顧 委)	市紀 委	市政府	市人大	市政協	軍分區
	縣	縣委		縣紀 委	縣政府	縣人大	縣協	武裝部
	鄉	鄉委		紀 檢 組	鄉政府	鄉人大		武裝部

\*顧問委員會系統於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撤廢。

資料來源：閻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桂冠圖書，1992)，頁 275。

從橫向來看，中共是由共產黨、政府和軍隊三大系統的六個機構來組成。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序言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sup>29</sup>」共產黨所謂領導的對象，包括社會主義事業所有方面。總體說，領導國家政權，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也要領導國家的以軍隊為主體的武裝力量、各種群眾團體、各民主黨派等等。<sup>30</sup>不過，在其憲法本文中，並沒有規定共產黨的地位，且中共黨章又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sup>31</sup>」因而共產黨所謂「黨的絕對領導」的來源，不可能是法律上的合法性，只能是實際政治運作上的特殊關係。因此，將針對這個領導作用如何運作，進一步說明。

### （1）黨、政關係

中共「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sup>32</sup>」根據中共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來源：第一是由黨的性質和國家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第二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sup>33</sup>」因此，如同中共自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陸唯一的、永恆的、法定的執政黨。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的事情要辦好，歸根到底取決於黨的自身建設和黨的領導，黨內

---

<sup>2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人民日報》（1999年3月17日），第1版。

<sup>30</sup>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頁124。

<sup>31</sup> 《中國共產黨章程 總綱》（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1997年9月18日通過），《人民日報》（1997年9月23日），第一版。

<sup>32</sup> 同上註。

<sup>33</sup> 同主30，頁123。

不出大問題，國家不會出大問題，即使出點問題也有力量解決。<sup>34</sup>」可說是代表共產黨在中國政權中絕對地位的標榜。

在實踐上，中共通過若干機制的實際運作，維持其領導地位，其重要的機制如下<sup>35</sup>：

- 一、 黨的領導人與行政領導人合一或滲透。
- 二、 黨在所有領導機關中設立黨組或機關黨委，監督其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幹部的思想狀況。
- 三、 黨內設立與各級政權機關相適應的小組、委員會、部、處等各級組織，以對口管理。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財經小組、外事小組、外宣小組、對台小組以及其他小組，以分別掌握各方面的工作。
- 四、 一切主要的任命、晉升和撤職都是由黨的各種組織所決定。
- 五、 黨向各領導機關派駐紀律檢查組，以黨的紀律約束所有的機關及其負責人。

從黨政關係運作發展的歷史來看<sup>36</sup>：中共是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在「革命戰爭時期」，為了配合革命戰爭條件，需要高度的社會動員能力。因此，共產黨的各組織不得不執行政黨、軍事、立法、司法及政府等各種機構的功能，這樣就自然而然形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格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因襲「革命戰爭時期」政策決定與執行一體的模式，黨不但作成決策，指揮政務推動，本身且經常據以執行，沒有改變「以黨

---

<sup>34</sup> 中共研究編輯，當前中共黨建設面臨的難題，《中共研究》第28卷第7期（1994年7月），頁1。

<sup>35</sup> 參閱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頁24~34；閻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頁280~293；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1995年），頁18~19。

<sup>36</sup> 參閱高家富，《中共政治體制改革之研究——以黨組織權力結構、黨政關係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頁74~76；楊勝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流變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3卷第9期（1997年9月），頁39。

代政」與「黨政不分」的體制。在「文革」期間，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中央文革小組」大肆攬權，指揮號令一切，直接接管許多黨政機關，可說是將「黨政不分」與「以黨代政」的程度發揮到極致；文革結束不久，有鑑於一元化領導衍生出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遂有「黨政分工」的政改理念浮現；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實行「黨政分開」的決策，但由於「分工」的概念模糊，具體制度化的步驟緩慢，致使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克服「黨政不分」與「以黨代政」均無法落實，因之中共內部繼續展開「黨政分開」的理論探討與嘗試。不過，中共十三大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要實行「黨政分開」，其基本架構，是「以黨領政」的體制。但黨對國家政權「絕對掌控」的基本精神、對象、方式、職能，仍然沒有改變。

因此，無論「黨政不分」、「黨政分開」，如果中共還繼續維持「以黨領政」的體制，難免出現對立和衝突、甚至於矛盾的可能性。但從中共的觀點而言，這些「以黨領政」的關係，並不是對抗性的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sup>37</sup>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來說，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sup>38</sup>」，如果黨政之間矛盾存在，主要也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即可妥善加以解決。如同許多大陸學者在探討本身的問題一般認為，基調就是調和，他們總是一手抓一個原則，兩個看似矛盾的原則放在一起，通常分別代表著集體與個體的利益，相互提醒，彼此節制，使得兩者之

---

<sup>37</sup> 浦興祖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20。

<sup>38</sup>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64~365。

間維持均衡的關係<sup>39</sup>。

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以後，「以黨領政」的權力結構，在實際運作中最明顯的特色，就是黨與政府之間有「自然的分工」概念，亦即黨完成政治功能，政府行使管理功能<sup>40</sup>。於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受到「以黨領政」的權力結構的影響之下實際運作。因此，在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時，不但要理解參與外事活動的黨和政府機構，也必須要考慮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才是了解其過程的關鍵之所在。

## （2）黨、軍關係

黨對軍隊的領導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現象，但在建國前，共產黨領導軍隊的是少數中之少數，即使有也只不過是很短的時期，但在當時中國共產黨則已經領導軍隊達廿二年之久<sup>41</sup>。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打著紅旗發動南昌暴動時，中共紅軍就已出現，但其形似流寇，談不上制度<sup>42</sup>。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緊急會議」，毛澤東如此明確地指出，「黨指揮槍」與「槍指揮黨」<sup>43</sup>，於是不久後在井崗山就建立自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軍隊，一九二八年四月以後，與朱德、彭德懷等兵力會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正式的紅軍於焉建立<sup>44</sup>。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sup>45</sup>」。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大六中

---

<sup>39</sup>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1995），頁 63。

<sup>40</sup> 趙建民，《台灣民主化經驗適用於中國大陸之可行性研究——自黨政關係制度化層面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6年），頁 49。

<sup>41</sup> 閻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李少民主編，《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頁 281。

<sup>42</sup> 陳培雄，《中共軍事制度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第 20 卷第 6 期（1994 年 6 月），頁 67。

<sup>43</sup>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頁 81。

<sup>44</sup> 同主 42。

<sup>45</sup> 同主 43，頁 97。

全會上，在題為「戰爭和戰略問題」的講話中，提出：「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sup>46</sup>」毛澤東如此明確地指出「槍桿子裡出政權」和「黨指揮槍」的黨軍之辯證關係<sup>47</sup>，雖然使許多學者對中共黨軍關係一直圍繞著「槍桿子裡出政權」和「黨指揮槍」的看似互相矛盾的問題感到困惑，但他的這句話就顯示了中共政權的性質。

中共黨軍的「黨中有軍，軍中有黨」關係最明顯的表現是共產黨與軍隊兩大系統在組織上的相互交錯<sup>48</sup>（見表 3-2）。在中共中央設立的軍事委員會是中共黨中的最高軍事機構，它的成員基本是由職業軍事指揮員和職業政治委員所組成，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和政治局都有不少的軍人，以及軍人直接擔任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的領導，這些都明確地代表「黨中有軍」；中共黨章第二十三條規定：總政治部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政治工作機關，負責管理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sup>49</sup>。中共在軍內建立的各級黨組織，所設立的各級政治部，地方黨委書記擔任同級軍事單位的第一政委，以及黨的領袖作為軍隊的最高統帥等，則是「軍中有黨」的具體表現。這種「黨中有軍，軍中有黨」的辯證關係事實上消弭了黨與軍隊兩大系統在組織上的對立，它既使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合法化，又使軍人參與黨內事務合法化。由於黨軍之間如此的辯證統一，導致黨軍之間的調和<sup>50</sup>，軍隊的領導幹部可以成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等身份，參與黨的重要政策制定。因此，在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特別是在國家安全相關的政策制定中，解放軍的影響力非同小可。

---

<sup>46</sup>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512。

<sup>47</sup> 參閱俞劍鴻，〈中共黨軍之辯證模型〉，《中共研究》第 30 卷第 7 期（台北，1996 年 7 月），頁 72~81；Peter Kien-hong Yu,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LA," *Defense Analysis* (U.K.), Vol. 16, No. 2 (Summer 2000), pp. 203~218.

<sup>48</sup> 林長盛，〈中共黨軍關係的模式與變遷〉，林長盛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06。

<sup>49</sup> 中國共產黨章程（一九八二年九月），景杉主編，同前引書，頁 884。

<sup>50</sup> 俞劍鴻，同註 47。

表 3-2：解放軍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員中所佔的比例（1956-1997）

區 分	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八大	九 大	十 大	十一 大	十二 大	十三大	十四大	十五 大
年 份	1956	1969	1973	1978	1982	1987	1992	1997
政 治 局 委 員	7 / 17 (41.7 )	12 / 25 (52)	6 / 21 (28.6 )	12 / 23 (52.2)	11 / 28 (39.3)	2 / 17 (11.8)	2 / 20 (10)	2 / 22 (9)
中 央 委 員 會	30 / 97 (31)	85 / 170 (50)	52 / 195 (26.7 )	61 / 201 (30)	50 / 210 (23.8)	23 / 175 (18.3)	44 / 189 (23.2)	41 / 193 (21.2 )
	候 補 會 委 員	55 / 109 (50)	25 / 124 (20.1 )	39 / 132 (29.6)	25 / 138 (18.5)	23 / 110 (20.9)	23 / 130 (17.6)	24 / 151 (15.9 )
	小 計	140 / 279 (50)	77 / 319 (24.1 )	100 / 333 (30)	75 / 348 (21.5)	55 / 285 (19.3)	67 / 319 (21)	65 / 344 (18.9 )

資料來源：1. 沈明室，《改革開放後的解放軍》（台北：慧眾文化出版，1995），頁 58。

2. 中共「十五大」新領導階層基本人資概況，《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九期（1997 年 9 月），頁 117~128。

3. 梅君友，中共「十五大」構建新權力結構，《中共研究》，第 31 卷、第 10 期（1997 年 10 月），頁 27~29。

## 二、 外交政策制定結構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其政治體制如何，最高領導人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所以只能透過某種結構的實際運作來掌控其所要的結果。但在重要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直接通過由上而下的指揮系統進行決策和控制執行也是有的。就此種最高領導人直接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而言，他對於該政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程度的認知來做決定。例如，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時，毛澤東直接掌控決策，周恩來負責指導外交事務，與政治局委員進行磋商，外交部負責執行<sup>51</sup>；在中共與英國就香港問題談判時，鄧小平不僅提出「一國兩制」的原則，而且親自下達指示具體的策略，控制了整個談判過程<sup>52</sup>。

不過，在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雖然最高領導人是最高最後的決策者，但他提出的政策內容是屬於「概念」、「原則」或「基本方針」。而且中共領導人表達其外交政策，大多數在於重要會議中、接待外賓時及與高層領導私下會晤時，通常是以「指示」、「講話」等形式表達出來。<sup>53</sup>從中共領導人的重要文件中發現，他們首先認知當前世界格局的特徵和主要矛盾的所在，然後自我決定在當前格局中要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外交總目標。於此，他們提出或決定的外交政策，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屬於宏觀面的。如此看來，中共最高領導人在外交決策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全盤性的，而是原則性的。

領導人所能扮演的特定行為者的角色、身份，是由他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所造成，亦即被其結構關係所決定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也不是一個原子式的存在，而是受到不同時空的變化中不斷的調整個人和國家的角色，可說是被結構化的存

---

<sup>51</sup> 郝雨凡，《美國對華政策內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頁80~83。

<sup>52</sup>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台北：聯經，1993年），頁87~88。

<sup>53</sup> 許志嘉，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決策模式，《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8期（1998年8月），頁55。

在<sup>54</sup>。因此，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中共領導人的角色和地位也不是僵化固定，而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被動或主動的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環境。影響中共領導人的角色和地位的變化，主要因素包括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濟結構的變化、政治體制改革、第一代革命世代的辭世、高級技術官僚的影響力之提昇、對外開放、外交政策制定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增長。這些客觀實際的改變，促使中共領導人的角色變化，隨著參與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機構和其過程也出現各種變化，其中最突出的現象包括<sup>55</sup>：存在著不止一個最高層權力中心，它們之間存在著爭論；政策議事日程的範圍日益擴大；參與外事活動的機構之數量增長；知識份子和智囊越來越多地進行參與。

如同上述中共黨政軍關係所知，中共實際政治運作，是黨政軍關係所衍生的產物。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時，只單純地考慮領袖個人的角色或政府機關，就很難把握中共外交決策的特徵，必須著手參與外交決策的黨政軍的組織結構和其運作關係之研究，方可窺其全貌（如圖 3-3 所示）。

中共的重大外交政策，不是純粹由政府組織來決定，相反的，黨中央才是決策中心。然而黨中央也需依賴政府組織，涉及外事工作的各種機構的蒐集資訊、分析情勢、建議，以制定其外交政策。因此，涉及中共外交事務的各種黨政軍組織的互動關係<sup>56</sup>，才是真正了解中共外交決策的最重要關鍵之所在。

中國共產黨組織實際運作中，參與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的主要黨機構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決策中心）、中央軍事委員會（諮詢機構）、中央書記處（綜合辦公職能機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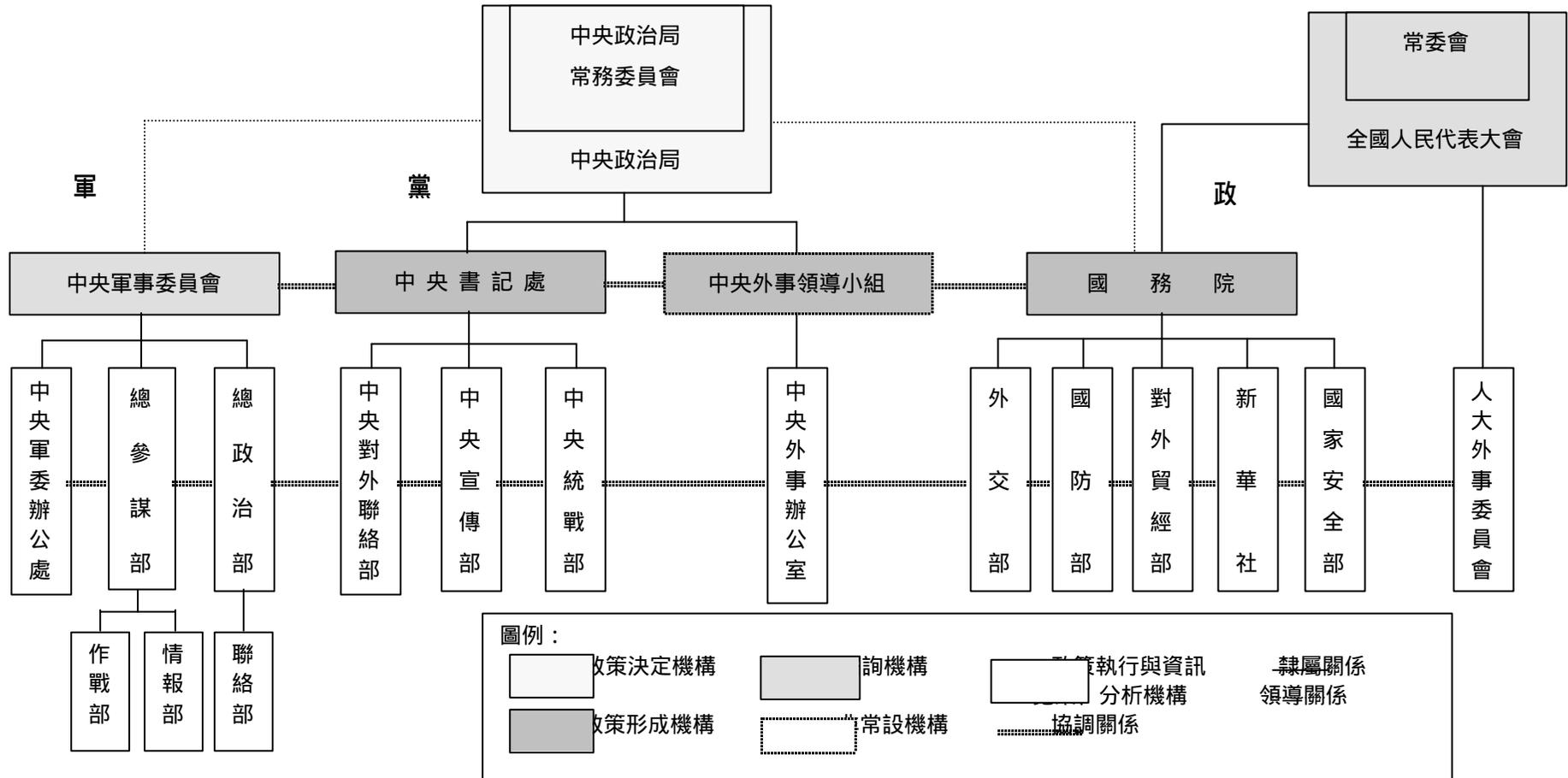
---

<sup>54</sup> 蕭全政，兩種社會科學典範，《政治科學論叢》（台灣大學政治系出版）第五期（1994年4月），頁75。

<sup>55</sup> Quansheng 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2.

<sup>56</sup> 參考蔡瑋，《中共的涉台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台北：風雲論壇，2000年3月），頁67、104~106、113。

圖 3 - 3 :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結構



資料來源：1.蔡瑋著，中共的涉台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0年3月，頁67。  
 2.楊勝春著，中國最高領導班子的左右手—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檔案(1949-1998)，台北：永業出版社，2000年。  
 3.作者根據上述資料整理。

图 3-3

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協調機構）、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部門）、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在中共政府組織架構下，參與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的主要機構包括外交部、國防部、國家安全部、新華社、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人大系統為人大外事委員會等。參與外交事務的這些黨政軍機構，在外交政策決定過程中，由它們所扮演的角色而分類（如表 3-3）包括：政策決定機構、政策諮詢機構、政策形成機構、資訊蒐集與分析機構及政策執行機構等。

表 3-3：外交事務各階段負責的黨政機構

政策階段	資訊蒐集與分析	政策選項形成	政策諮詢	政策制定	政策執行
參與黨政組織	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人民日報社、外交部、國防部、國家安全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新華社、人大外事委員會、政協外事委員會、相關研究機構、中央外事辦公室	中央外事領導小組、中央書記處、國務院	人大常委會、中央軍事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	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人民日報社、外交部、國防部、國家安全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新華社、人大外事委員會、政協外事委員會、中國友協

資料來源：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民 87 年 5 月），頁 46。筆者略作修正。

## (1) 政策決定機構

中央政治局與其常委會，是當前中共制定外交政策名符其實的最高權力機構。從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以來通過的各「黨章」<sup>57</sup>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但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只有舉行一、兩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因此，實際中國共產黨組織體系結構上，中共最高決策中心，所謂的「黨中央」，即為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會。自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黨章規定，「凡屬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都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以來，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會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sup>58</sup>。中共建國已近五十年來，歷屆總理、多數的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都是中常委員。<sup>59</sup>尤其，「十二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都必須是中常委員。如此，由中共歷屆黨章、其組織位階、成員結構來看，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委顯然是中共的最高決策實權機構。

就政治局與其常委會在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其決策權的轉變而言：在五〇年代，中共外交政策基礎於集體領導制定，政治局與其常委會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制定機構。政治局經常定期地召開會議（約每週一次）討論外交事務議題，常委會的例行外交事務會議則較政治局更為頻繁。但從六〇代初期以後，外交政策的權力移至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加上毛澤東傾向加強個人領導，政治局與常委會在外交

---

<sup>57</sup>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通常情況下，每三年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半年召集一次。一九五六年「八大」黨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每年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至少兩次。自「九大」以後黨章都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

<sup>58</sup> 景杉主編，同前引書，頁 213。

<sup>59</sup> 閻維，同前引書，頁 297。

政策的決策權乃開始微弱。<sup>60</sup>及至文革爆發，整個外交事務遭到破壞。許多執掌外交事務的人員遭受整肅，「文革小組」控制了外交決策權。自七〇年代初期開始，政治局與其常委會再度恢復制定外交政策的大權。自中共建國至今，雖然政治局與其常委會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其地位有所起伏，不過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共黨政軍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的決定，一直掌握最高決策權。

## (2) 政策形成機構

中央書記處，依「十三大」黨章的規定而言，是中央政治局和它常委會的辦事機構。中共建國後直到文革前，按照中共的「七大」、「八大」修改的黨章規定，一直由中央書記處處理中央的日常事務。文革開始後，書記處被「文革小組」所取代，且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修改的黨章中被取消，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的設置<sup>61</sup>。包大可認為，一九八〇年代初，對於外交政策決定的有關黨政實際運作而言，「中央政治局」，扮演「批准」而非「決策」的角色，中央書記處則扮演決策角色<sup>62</sup>。中共「十三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是辦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事務性工作的辦事機構。不過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仍然扮演政策形成者的角色<sup>63</sup>，透過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例如，中央統戰部、中央對外聯絡部、人民日報社、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等，其在決策過程中仍然可發揮其政策建言的作用，涉入外交決策過程中。

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中共為了黨的全能角色，專為領導政權機關、執行其工作的許多工作部、委員會及小組一類的常設與非常設機構，這類直屬於中共中央的機構，稱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一九九三年三月 關於黨政機構改

---

<sup>60</sup> A. Doak Barnett, *op. cit.*, p. 8.

<sup>61</sup> 浦興祖等，同前引書，頁 406~407。

<sup>62</sup> A. Doak Barnett, *op. cit.*, pp. 19~20 and 33~34.

<sup>63</sup> 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1998 年 5 月），頁 29。

革的方案，則將事業機構除外的中共中直機構分為工作部門，辦事機構和派出機構三類，而將非常設機構分為議事性的委員會和「領導小組」等二類<sup>64</sup>。

領導小組，在中共黨政關係的實際運作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共設置領導小組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領導小組的運作以統一各分口的領導事權，並發揮最高決策與協調功能<sup>65</sup>。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下則設分口把關國家的主要組織，掌控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並且各小組的組長是在分工的原則下，由政治局常委或黨的元老擔任，因此，其層次可謂非常高。實務上，領導小組在各該管轄部門遇有共同性、重大性問題時，由各該小組組長召集小組有關的部門共同協商，作出處理的基本原則<sup>66</sup>。因此，在黨政組織之間的可能會出現的矛盾，到了領導小組，在協商、調整、討價還價過程中，達到辯證統一。所以，領導小組，可說是代表中共的辯證思想在組織結構中實際運作的最好例證。

「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在「文革」以前為「中央外事小組」，文革期間被「文革小組」取代，從一九八三年七月開始稱為至今的名稱。<sup>67</sup> 外事小組的主要職能是參與外事系統的黨政機構之間針對主要政策的協調、溝通、監督、建議，因此，它成為參與外事系統的黨政機構之間相互溝通的重要管道。小組將政治局常委會已做決定的政策傳達、通知參與外事系統的各機構，並且經由其組長，將主要資訊和觀點傳達與政治局常委會及最高領導者，以影響決策<sup>68</sup>。

外事小組雖然沒有固定的開會議程，但約每週一次開會

---

<sup>64</sup> 中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地方組」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機構改革指導》（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10月），頁51。

<sup>65</sup> 陳德昇，中共對台工作組織與人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5期（1994年5月），頁20。

<sup>66</sup> 沈建中，論中共對台工作組織——以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為個案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1期（1998年1月），頁41。

<sup>67</sup> 楊勝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流變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3卷第9期（1997年9月），頁37。

<sup>68</sup>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and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Leadership, Structures, Process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pp. 371~372.

<sup>69</sup>，討論有關外事議案，參與的正式成員包括國務院總理（政治局常委）、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長、國家安全部長、國防部長、新華社長等<sup>70</sup>，其組長職通常由總書記、國家主席或國務院總理擔任，至於一九九五年，江澤民取代李鵬成為外事小組組長，而李鵬同錢其琛一起，成為副組長<sup>71</sup>；一九九八年又更改其成員，小組組長仍為江澤民，副組長則是朱鎔基與錢其琛，成員有唐家璇、戴秉國、劉華秋、許永耀等，秘書長由劉華秋兼任<sup>72</sup>。

由於外事小組成員事實上已包含中共最高領導層，主管外交事務的黨政領導者，以及對外交政策研究的各種機構的協助，並且經常開會討論具體外交政策，外事小組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和意見，被中央政治局與其常委會採納成為重要政策的可能性非常高。因此，外事小組可稱為相關外事機構的核心中核心。

### (3) 資訊蒐集與分析機構及政策執行機構

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九九八年八月之前，外事小組將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做為其辦公室職能，而且具有提供和協助對外交政策資訊的研判與分析的很多研究機構，例如，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小組、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外事部門、「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外交部下設的「國際問題研究所」等<sup>73</sup>。一九九八年八月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國務院不再設置外事辦公室，其有關職能劃歸外交部，而保留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

---

<sup>69</sup> A. Doak Barnett, *op. cit.*, p. 44.

<sup>70</sup> Michael D. Swaine, *op. cit.*, p. 371.

<sup>71</sup> Willy Wo-Lap Lam, 'Jiang's Power Continues to Gr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March 1995, p. 1.

<sup>72</sup> 楊勝春著，中國最高領導班子的左右手—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檔案(1949-1998)，台北：永業出版社，2000年，頁70~72。

<sup>73</sup> 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2), p. 119.

而其主要職掌為<sup>74</sup>：

- 一、 針對國際形勢和執行外交政策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攸關國家安全的國際問題，進行綜合調查研究，提出看法和建議。
- 二、 承辦「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和辦公會議的會務工作，列管議決事項的辦理。
- 三、 承擔有關外事協調工作。
- 四、 聯繫主要涉外部門召開形勢政策協調會，就重大國際問題及政策進行研究討論，提出看法和對策建議。
- 五、 定期聯繫國際問題諮詢小組成員，研究國際形勢及重大國際問題。
- 六、 加強與國內重要國際研究機構聯繫，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國際形勢研討會。
- 七、 承辦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機關各部門，解放軍各總部，全國總工會、共軍團中央、全國婦聯和其他人民團體，以及省級地方黨委報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審批有關重要外事問題的請示、報告。

「外事辦公室」內設三個職能司，其職掌如次：

「政策研究司」 對國際形勢和執行外交政策的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建議；負責「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全體會議、辦公會議以及專題協調會議的會務工作。

「外事管理司」 負責擬定外事工作的某些全國性法規文件，或提出修訂意見；負責「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國務院對各地區、各部門申請外事審批權的請示起草批文；對外事管理工作進行調查研究和提出改進意見；對在外事工作中違反規章制度和外事紀律的重大事件提出處理意

---

<sup>74</sup> 同註 72。

見。

「秘書司」負責文電管理、日常文書和行政事務，兼管人事工作。

依據其職能和編制所知，外事辦的工作顯然不在執行政策，而是較靜態的政策研議及協調。特別是在中共外交決策中扮演具有黨與政府兼具的角色，外事辦公室的成立事實上便標示著中共黨政機構不分、相互為用的一個明顯例證<sup>75</sup>。

外交部，是國務院下設的集中統一的執行國家對外政策，直接處理日常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其主要職能包括<sup>76</sup>：

- 一、調查研究國際形勢和各國情況，為中共中央制定外交方針、戰略、政策提供情況和建議。
- 二、代表國家和政府辦理外交事務，對外發布國家重大對外政策和決定，公布國家外交文件和聲明。
- 三、負責外交談判，簽訂有關條約、協定外交文件，辦理外交交涉。
- 四、指導和監督駐外使館人員和經濟貿易代表處的工作等活動。
- 五、參加聯合國和政府間的有關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的活動。

外交部下設的各種單位是依照地理與功能的原則組織起來的。<sup>77</sup>其單位包括：亞洲司、西亞北非司、非洲司、東歐中亞司、西歐司、北美大洋洲司、拉丁美洲司、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國際司、軍控司、條約法律司、新聞司、禮賓司、領事司、港澳臺司、外事管理司、幹部司、行政司、財務司、翻譯室、離退休幹部局、國外工作局、監察局。

---

<sup>75</sup> 許志嘉，同註 63，頁 40。

<sup>76</sup> 新華通訊社編輯，《中國政府機構名錄》中央卷（香港：成文圖書公司，1993 年），頁 3。

<sup>77</sup>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台北：五南，1995 年），頁 199。

其中主要幾個單位的職能如下<sup>78</sup>：

「亞洲司」：掌握、研究亞洲地區和國家的情況和形勢；負責與這一地區、國家外交往來及相關涉外事務的具體事宜；協調同這一地區、國家雙邊往來的具體政策；指導我駐本地區使領館的外交業務工作。

「辦公廳」：協助部領導處理日常事務；協調部內業務工作，溝通各方面的情況；綜合辦理文電運轉、信息處理等工作。

「政策研究室」：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和國家對外關係中全局性的問題。負責搜集資料，研究建國以來的外交政策和實踐。

「新聞司」：專門負責發布中共對有關國際形勢的看法；管理外國常駐大陸記者和臨時赴大陸記者事務；負責安排和協調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事宜；協調配合國內新聞單位的有關涉外報導；負責反映國際形勢的新動向和動態調查研究。<sup>79</sup>

「國際司」：調研多邊外交領域的形勢和發展趨勢；負責處理聯合國及其它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有關問題。

「軍控司」：負責軍控、裁軍、核不擴散和出口控制以及全球和地區安全等問題，執行上述領域的方針、政策和處理上述領域的外交事務。

「條約法律司」：研究和處理外交工作中的條約、法律方面的問題；辦理各種涉及條約、法律以及領土、邊界、地圖等涉外案件；負責辦理或參加有關條約、法律的國際會議和雙邊談判；協助有關部門審核國內制定的涉外法規。

「禮賓司」：主管國家對外禮儀事項；負責研究和處理外國駐華外交機構在華的禮遇、外交特權和豁免問題；指導我駐外使領館和地方外辦辦理涉外工作中的禮賓問題。

---

<sup>78</sup> [http://www.fmprc.gov.cn/wjbjs/wjbjs\\_zzjg.htm](http://www.fmprc.gov.cn/wjbjs/wjbjs_zzjg.htm)

<sup>79</sup> 郭瑞華，《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1996年），頁137~138。

「領事司」：主管同外國談判簽訂領事條約、設領協議和其他有關領事方面的協議等；指導地方外辦管理外國在華領館有關事務；指導我駐外領事機構的領事僑務工作；協助有關部門處理重大涉外案件；頒發護照和簽證；辦理公證、認證及通過外交途徑送達法律文書等。

「港澳臺司」：在外交方面貫徹執行中央關於港澳臺問題的方針政策；協調處理有關港澳臺問題的涉外事務。

「中共駐外使領館」依駐在國重要性與雙方關係的不同，有不同的人員配置，除了屬於外交部人員以外，還包括由不同部會派出的人員，以各單位立場從事工作和蒐集情報，這些部門單位包括：國家安全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共中央統戰部、解放軍總政治聯絡部、解放軍總參謀部等單位。<sup>80</sup>

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是中共中央為了黨的對外聯絡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參謀，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設立的工作部門。根據中共的說法，中聯部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按照黨的外事工作方針、為世界和平和發展兩大目標服務，通過同各種政黨關係，團結一切願與中國友好的力量，支持世界人民維護世界和平和爭取社會進步的事業，增強中共、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爭取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同時，探索直接服務於四化建設的工作，通過黨的關係和群眾團體渠道，促進經濟和科技合作。<sup>81</sup>」在如此工作任務的方針下，蒐集和研究不同類型國家的社會基本情況和不同類型政黨的情況，保持與各國共黨聯繫的同時，也開始逐步擴大與世界各國其他政黨和組織之間的聯繫和往來。

中聯部設有按世界不同地區劃分的業務局和圖書資料中心、計算中心等機構<sup>82</sup>，一九八六年，成立了「經濟聯絡辦公室」，九十年代後，又改名為「中國經濟聯絡中心」，下

---

<sup>80</sup> 同上註，頁 138。

<sup>81</sup> 景杉主編，同前引書，頁 216。

<sup>82</sup> 劉國新主編，《中國政治制度辭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0），頁 665。

還設有外貿、內貿權的「中國華聯國際貿易公司」。該中心透過與其他國家政黨的廣泛交往，為大陸各省市與「國」外開展經貿合作、牽線搭橋，迄今先後與六十多個國家五十多個政黨的一百多家公司建立了業務聯繫，並承辦了五百多個合作項目<sup>83</sup>。

在一九九三年三月新任的中聯部部長，李淑錚特別要求所屬今後的工作「一是進一步擴大和加強與周邊國家及亞太地區其他國家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交往。二是在開拓同發展中國家重要政黨的交往與合作同時，逐步拓展與西方發達國家重要政黨的關係。三是加強高層次交往活動。<sup>84</sup>」由此觀之，中聯部是中共的一個以開展政黨外交為中心的工作部門。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中聯部以黨中央的政策執行、資料蒐集和各國社會和政黨的情況研判為其工作重點。中聯部部長是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的成員，將其部門的研判和意見經過外事小組會議的協調，能夠反映與黨最高決策層的決策，因此可言，中聯部在外事工作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國家安全部，是國務院下設的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政府職能部門。根據一九八三年第六屆全國人大決定而設立。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負責原由公安機關主管的間諜、特務案件的偵查工作，及海內外情報的搜集，其性質兼有情報機關和公安機關的特性<sup>85</sup>。目前國家安全部下轄十七個工作局，以及辦公廳、政治部、組織宣傳部、教育培訓部、人事局、老幹部局、監察審計局、綜合計畫局、行政管理局等單位，另有四個相關研究機構包括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蘇州江南社會學院、浙江第二人民武裝警察學校<sup>86</sup>。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是國務院的組成部門，主管全國對外貿易工作的專門機構。前身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

---

<sup>83</sup> 李義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李淑錚，《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11期（1996年11月），頁74。

<sup>84</sup> 同上註，頁75。

<sup>85</sup> 「明報」中國問題研究組，《中國權力機構與領導人》（香港：明報出版社，1993年），頁155。

<sup>86</sup> 郭瑞華，同前引書，頁125~126。

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決定設立的對外貿易部。一九八二年二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定將原國家投資管理委員會、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進出口商品檢驗局合併，建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

主要任務：研究對外經貿發展戰略，編報規劃，制訂政策、法規，實施對外經貿工作的宏觀調控、行業管理、協調服務和監督檢查。

其主要職能<sup>87</sup>：

一、制訂全國性對外經貿方針政策和法規、規章，發布對外經貿法規、規章；負責對外經貿法規、規章之間以及國際條約、協定之間的協調與銜接；負責全國進口反傾銷、反補貼以及保障措施等案件的調查與處理。

二、制訂進出口規劃和出口商品、市場發展戰略及貿工、貿農、貿技結合的發展戰略。

三、指導、協調全國的對外經貿工作，宏觀管理全國進出口商品工作。

四、制訂國別（地區）對外經貿政策和雙邊、多邊對外經貿政策並組織實施；代表中共政府參加國際經濟貿易組織和會議，並負責這方面的事務，同外國政府、有關國際組織進行經濟貿易談判和簽約；組織同聯合國系統和有關國際組織的經濟技術合作交流，指導駐外經商處（室）和駐聯合國及有關國際組織代表機構的工作。

五、研究吸引外商投資的方針政策和發展戰略，指導和管理吸引外資工作；制訂外商投資的法規、政策和管理辦法，監督、檢查外商投資企業執行有關法律、法規、合同情況，協調解決有關問題。

六、制訂利用外國政府貸款的政策、管理辦法和貸款使用計劃，組織實施並監督貸款的償還，管理外國政府提供的

---

<sup>87</sup> [http://www.moftec.gov.cn/html/government/about\\_policies\\_responsibilities/](http://www.moftec.gov.cn/html/government/about_policies_responsibilities/)

有關貼息貸款。

七、制訂對外援助的國別政策，調整對外援助的結構、布局和方式。

新華通訊社，就是一般所悉的「新華社」的全稱，是中共「國家」通訊社，屬於國務院事業單位，負責中共新聞的統一發布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中共設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就是新華社的前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為「新華通訊社」，以迄於今。

新華社的主要職能，根據新華社在一九九三年編輯的《中國政府機構名錄》中顯示<sup>88</sup>：一、根據黨和國家授權，統一發布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公告和重大新聞。二、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採集新聞（含文字和圖片）向國內外播發。三、收集各種信息資料，為國內外用戶服務。四、編輯出版數十種公開和內部報刊、各類圖書。五、根據黨和國家授權，同外國官方新聞宣傳機構和國際組織發展關係，簽訂有關協議。六、進行新聞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七、培養新聞人才。

新華社除了是公開的新聞發布機構外，持續扮演著中共「耳目」的角色，利用其新聞工作的特殊性，擔任著特殊性的任務，所以，它又是一個情報系統。新華社利用遍佈國內各地的記者網路，觀察各地的情況、蒐集情報，透過「內參報導系列」，向中共最高層提供國內外重要的動向<sup>89</sup>。「內參報導系列」可分為國內和國際兩大部分，國內內參系列則包括《內參副頁》、《內參清樣》、《內部參考》及《內參選編》；國際內參系列則包括《參考要聞》、《參考資料》、《國際內參》、《台港澳情況》及《參考消息》等，其中《參考資料》（每日出刊）與《國際內參》（每週出刊）不但反映國際情勢，並提出重要分析，因而成為中共高層理解國際情勢的主要來源<sup>90</sup>。由此可知，新華社在中共外交政策決定過程中，不只是作為中共外交政策之宣傳和解釋的執行機構，同時又是

---

<sup>88</sup> 同註 77，頁 539。

<sup>89</sup> 新華通訊社，《共黨問研究》第 23 卷第 7 期（1997 年 7 月），頁 93。

<sup>90</sup> 許志嘉，同註 63，頁 42。

向中共高層提供及分析國際資訊和情報的一個機構。

#### (4) 外交政策制定中的解放軍角色

周恩來曾說「外交部幹部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sup>91</sup>」但就解放軍涉及外交政策領域的實際情況而言，解放軍可說是穿軍裝的外交官。在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解放軍一直扮演了重要的政策影響角色。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扮演其角色，是來自於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的關係。不過，中共外交政策，基本上，由黨政有關機構制定和執行，解放軍在外交政策領域裡不會扮演核心角色，但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不能忽略軍方的觀點和影響力。<sup>92</sup> 根據中共在一九九七年三月通過的「國防法」中，把「國防」界定為「國家為防備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裝顛覆，保衛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所進行的軍事活動，以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動。<sup>93</sup>」自中共建國至今，其外交政策的目標中，國家安全一直稱為最高原則<sup>94</sup>，且解放軍是負責國防的最核心組織，因此，外交和國防到了解放軍則處於辯證統一。因此，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尤其在外交決策涉及軍事領域或者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議題中，解放軍就發揮不可忽略的影響力。

解放軍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雖然不是外交政策制定機構，但是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中共的國防安全，而且從鄧小平時期看，中央軍委會的主席均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副主席則多在黨內具有重要職務（如表 3-4）。

---

<sup>91</sup> 黃金祺，《什麼是外交？》（北京：外交學院知識出版社，1993年），頁8。

<sup>92</sup> 例如：一九六九年六月中旬，毛澤東委託周恩來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四人報告軍方對當時國際問題的看法。同年七月十一日，他們將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報告送交周恩來。毛澤東基於這編報告，探索打開中美關係。木君，重大的歷史決策，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頁174。

<sup>93</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解放軍報》（北京：1997年3月19日），第一版。

<sup>94</sup> 中共建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平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共同綱領」第五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引見，石志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一九四九．十．一九八九．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9。

表 3 - 4 : 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副主席黨內職務關係表

時 間		中央軍委主席：黨內職務	中央軍委副主席：黨內職務
十一屆一中	1977-1981	華國鋒：中央委員會主席	葉劍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鄧小平：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 徐向前：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一屆六中	1981-1982	鄧小平：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葉劍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 徐向前：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二屆一中	1982-1987	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	葉劍英：中央政治局常委 徐向前：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三屆一中	1987-1989	鄧小平	趙紫陽：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三屆五中	1989-1992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 劉華清：中央顧問委員會委
十四屆一中	1992-1995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劉華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張震：中央委員會委員
十四屆五中	1995-1997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劉華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張震：中央委員會委員 張萬年：中央委員會委員 遲浩田：中央委員會委員
十五屆一中	1997-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張萬年：中央政治局委員 遲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員

資料來源：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民 87.5），頁 33。

中央軍委若不是正式參與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就以非正式的方式參與政治局重要會議，或與政治局常委由不定期的接觸和溝通，表達解放軍對一些重要決策議題的觀點。<sup>95</sup>因此，中央軍委不僅在外交政策的國防安全議題方面，更涉及於國家路線的層次，顯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組織結構來看，國防部下設立的「外事局」，是解放軍參與軍事外交最具代表性的機構，實際上又是黨中央軍委外事局的門面（局長是同一人）<sup>96</sup>，專門處理軍事外交事務。外事局除了陪同解放軍將領出訪或接見外軍來訪外，也負責提供外國派駐中共的武官各項協助和彼此間的聯絡工作，在每年都會舉行「年宴」、「新春聯歡會」等活動，與各國駐中共武官進行交流<sup>97</sup>。

中央軍委會管轄下的總參謀部可以說是解放軍規劃和參與外交工作的最重要部門。其中關係最密切的是軍事情報部門「總參謀部第二部」和「總參謀部第三部」，其工作範圍除軍事產業情報的蒐集外，亦注意政治、國防、經濟、中國駐外人員和留學生的活動<sup>98</sup>。總參二部內設六個分析局：第一局負責台灣；第二局為戰術偵察局；第三局為武官局；第四局主管俄羅斯、東歐；第五局負責美、歐各國；第六局為亞洲分析局<sup>99</sup>。總參三部規模可能高達二萬人上下，內設司令部、後勤系統、人事、外聯等，經由對無線電的監聽、破譯密碼、衛星圖片的分析等，提供情報。<sup>100</sup>另外，總政治聯絡部也是解放軍另一個重要的情報系統，該部下設四個工作局：包括聯絡局、調查研究局、邊防局、對外宣傳局。對外活動均以「中國人民對外國際友好聯絡會」名義展開，主要工作對象包括台灣、美國、日本、俄羅斯、泰國、法國等地，

---

<sup>95</sup> Michael D. Swaine, *op. cit.*, p. 375.

<sup>96</sup> 同註 41，頁 282。

<sup>97</sup> 吳明杰，《1989 年後中共人民解放軍對外交流情況研析》（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11。

<sup>98</sup> 平可夫，《外向型的中國軍隊——中共對外的謀報、用兵能力和軍事交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6 年），頁 5。

<sup>99</sup> 同上註，頁 7~13。

<sup>100</sup> 同上註，頁 17。

蒐集相關國家的政治情報，並提出報告，同時負責解放軍的對外宣傳工作<sup>101</sup>。

解放軍透過其下設的各種組織，掌控世界各地的軍事情報，以及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資訊，而且國防部或總參謀部直接參與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的會議<sup>102</sup>，因此，在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解放軍能夠反映其觀點和立場，尤其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外交政策議題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 第三節 小結

中共的黨、政、軍三者關係並非對立或制衡的，而是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共訂決策下，組織與影響力延伸到各系統、層面，中共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上，雖然具有矛盾，但從辯證邏輯法過程中，亦可滿足權勢的階段性運作，使之暫時而有限地合理化，雖然中共在實際運作中，透過黨組織對國家社會乃至於外交政策進行全面的操縱，然而其理論與存在矛盾將隨時空轉換又復顯現。

中共政權結構鬥爭發展的最終勝利，其關鍵取決於中共領導人對黨軍關係的辯證思維，真確地瞭解領導人的認知，將是中共黨員自身安全與發展的基礎條件。同樣的，我們也可以了解中共黨政關係，從政權初建時的「以黨領政」，到了十三大之後逐漸改為「黨政區分」的構思，並將置於辯證思維的左右兩極；在黨堅持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下，事實上黨全面而有計畫的滲入各級政府機構與職能之中，已經形成了「黨中有政、政中有黨」黨政不分的理論與實際相調和的情形。

在辯證架構中，兩極僅為相對的關係，黨與政、軍與外交之間，則具有多重面向的互動，目前較為明顯的是意識型態與制度建立、領導與從屬、指揮與運作等等的互動關係，因此，即使中共對外一再強調軍隊現代化與黨政區分之原

---

<sup>101</sup> 郭瑞華，同前引書，頁 121~123。

<sup>102</sup> Michael D. Swaine, *op. cit.*, pp. 373~374.

則，但在實質內涵上，將無法避免黨在思想教育、領導上的功能，並利用政軍鞏固黨權與地位的傳統路線，進而衍展出外交政策，這是可以得到確證的。

綜合而論，從黨、政、軍乃至於外交決策的實際內涵與宏觀認知中，我們對中共黨政軍的整體性結構，主要關鍵在於黨超越國家、憲法、政體、外交與軍隊之上，這是可以納入辯證架構中兩極或中間之定位，再運用辯證法推衍黨政軍關係的型態，將清楚地顯示中共結構與運作之特質，以及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限制之省思。

## 第四章 辯證世界觀與對韓半島政策的演變

### 第一節 中共外交演變的分期問題與對韓半島政策

中共外交政策決策者在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時，對於這個世界所處於的時代性質之正確認識和掌握，是最首先要考慮的步驟<sup>1</sup>。其次，是要掌握國際形勢的變化，其關鍵為正確認識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動向，因為它不僅說明各種國家的性質，而且同時透過它將可以看到世界格局。如果正確認識它，就能夠掌握國際關係變遷的機制，在幾種基本國際政治力量的矛盾與互動關係中，它們彼此之間不斷進行新的分化和組合，有時出現明顯的主要矛盾，常常形成敵、友與我方的界線與變化<sup>2</sup>；其次，中共領導人主觀的認知自我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角色，並循而尋求國家角色之定位；最後，確定了該國在國際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後，才決定較具體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因此，如要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的轉變，先要了解中共最高層對於世界格局認知的轉變<sup>3</sup>。

自中共建國至今五十年來，其外交政策的轉變，可以從中共對外關係的演變過程獲得理解，如果以外交方式區分，較具代表性的主張有：中共外長唐家璇在中共外交部的網站

---

<sup>1</sup> 在此所謂的「時代」，是指以經濟為基礎、以政治為表現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的某一個階段，「性質」，是指在一切事物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的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

<sup>2</sup> 謝益顯，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外交學院學報》，1988年第二期，頁12~13。

<sup>3</sup> 一九八五年六月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於國際形勢、中共的角色和對外政策的三者關係提出意見。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在較長的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明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個轉變，是我們的對外政策。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我們實際上也要擔當這個角色。根據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我們改善了同美國的關係，也改善了同蘇聯的關係。總之，一個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是根據這個判斷相應地調整對外政策，這是我們的兩個大轉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26-128。

上發表的「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sup>4</sup>一文中，把中共外交歷程劃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五個十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國外交學院」在北京舉行「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樂辰在其「新中國外交之路——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綜述」一文中指出，會中部分學者認為，中共前後進行了四次對外戰略抉擇，那就是五十年代聯蘇抗美的「一邊倒」，六十年代中蘇分裂和中美對立並存條件下反美蘇的「兩條線」，七十年代聯美抗蘇的「一條線」，八十年代以後不建立軍事同盟為特徵的獨立自主外交戰略<sup>5</sup>；張小明的「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sup>6</sup>一文，也作了同樣四個年代的劃分，這四個年代中共的對外政策，前三個年代都在毛澤東執政時期，八十年代以後，是鄧小平執政時期。

這樣的劃分其實為了研究的方便，實際上外交政策是不能按照年代完全地切割區分的。但是，如果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則可能有較豐富的說服力。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強調在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受其影響的其他矛盾可能會在某個階段上得到解決，因而使部分量變過程中出現部分質變，使事物發展過程顯示出階段性來<sup>7</sup>。事實上，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就是類似此種階段性量變導致質變的過程，即為周恩來所謂「水到渠成」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限制<sup>8</sup>而有著部分量變，量變到了某種階段就出現所謂揚棄而質變。在此，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轉變。但至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而言，領導人的主觀因素的影響勝過於客觀因素的限制。因此，要將中共外交政策的實踐過程劃分為幾個階段，應該以中共領導人對國際環境的分

---

<sup>4</sup> [http://www.fmprc.gov.cn/zt/zt\\_01/wjb\\_zt\\_wz\\_tjh.htm](http://www.fmprc.gov.cn/zt/zt_01/wjb_zt_wz_tjh.htm)

<sup>5</sup> 樂辰，「新中國外交之路——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綜述」，《世界知識》，1996年第23期，頁6。

<sup>6</sup>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8期（1998年8月），頁93~102。

<sup>7</sup> 陽作華、張峰編著，《辯證法史論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03。

<sup>8</sup> 客觀因素所指的是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主觀因素指的是中共領導人對於客觀因素的主觀認識。

析和認識而構思的具體表述，以及相應地調整的對外關係來分析是較合理的作法。因此本文依據中共的各種外交理論和根據理論指導而調整的外交政策來劃分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例如，「兩大陣營論」時期、「中間地帶論」時期、「三個世界論」時期、「東西南北論」時期和「多極世界論」時期等。

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演變，從宏觀層面而言，中共領導人對世界格局的認識和其轉變有著密切的關係，不過中國大陸對整體韓半島的政策基本上沒有變化，只有策略的調整而已。但就微觀層面而論，中國大陸與韓半島關係受到各種因素，例如，地緣政治、歷史傳統、文化意識型態、現實利害以及南北韓雙方關係的發展等因素的限制之下，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有著相當程度的調整和變化。尤其是在韓半島上有兩個不同制度的國家處於衝突對立的矛盾下，並與中共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微妙的三角關係，對中共而言，在南北韓的雙方關係中要扮演怎麼樣的角，站在誰的立場，能否成為南北韓統一調整者，都具有特殊的意義。於此，本章從宏觀與微觀的微妙互動中結合時間與空間的因素，探討中共基於辯證思維而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之演變。

## 第二節 兩大陣營論與援北抗南政策

### 一、兩大陣營論與一邊倒政策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至一九五〇年代末，中共對當時國際環境的認知，基本上將世界分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sup>9</sup>。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

---

<sup>9</sup> 中共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的評估，嚴格說來不一定把美蘇之間的矛盾看成主要矛盾，卻以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為當時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參閱：謝益顯，〈戰後初期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外交學院學報》，1985年第二期，頁12-20。

線一方面的。<sup>10</sup>」韓戰期間，一九五三年六月周恩來認為兩大陣營的對立當然是基本矛盾，「主要表現在戰爭與和平、民主與反民主、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以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四個方面。當前，世界和平運動和戰爭集團之間的對立，由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力量壯大而加強。我們的陣營是和平的大本營，統帥是蘇聯。<sup>11</sup>」也就是說，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和平的一邊，以美資本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是戰爭的一邊。如此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認知的當時世界形勢是二分性的，一端是資本主義陣營，另一端是社會主義陣營。因此，中共將世界形勢認定為兩大陣營對立的格局，然而根據「兩大陣營論」，決定其所要扮演的國家角色和具體的外交政策。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sup>12</sup>」「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sup>13</sup>」這是兩大陣營論的理論所導引的五十年代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設想，以及在國際舞台上所企圖扮演的國家角色。中共所標榜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其選擇社會主義一邊是自然之理。

根據兩大陣營論的世界觀，中共定位其所要扮演的國家角色，然而決定了與蘇聯結成同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

---

<sup>10</sup>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頁1410~1412。

<sup>11</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59。

<sup>12</sup> 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1。

<sup>13</sup> 同上註。

國家一道、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進行鬥爭的對外政策。這個時期，中共外交政策可以簡單概括為「一邊倒」政策。因此，中共在「共同綱領」上規定與外國「建交三條原則」：第一、凡願同中共建交的國家，必須與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第二、對中共採取友好態度，並支持其加入聯合國。第三、通過談判證實其尊重中共主權的誠意。中共依據其建交原則，對於資本主義國家，除了分為主戰派、維持現狀派及和平中立派外，按對新建立中共政權之態度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像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瑞士等國，中共不但與他們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係，且他們也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第二類是像英國，荷蘭，他們雖然沒有同國民黨政府建交，但在聯合國席位問題上是支持台灣，因而中共只與他們建立了半外交關係；第三類是既與台灣建交，又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南韓就是屬於這類的國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共與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和發展關係。就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與北韓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共與北韓兩國、兩黨關係成為盟友。

## 二、韓戰與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形成

一九四五年二月，第二次大戰即將結束時的雅爾達會議決定把韓半島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也就是「一分為二」，美國和蘇聯各托管南北韓的設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後美軍和蘇軍各對南北韓實行軍事管制，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和九月九日，已分裂的韓半島南北雙方分別成立了兩個互不相承認的國家，即「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個是靠美國向資本主義的國家，另一個是靠蘇聯向社會主義的國家。

中共與北韓的關係<sup>14</sup>，雙方經常以「血肉相連」、「唇齒相

---

<sup>14</sup> 中共方面認為，「中朝兩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兩國人民自古以來有著傳統的友好關係，又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不論是在感情上、文化上還是在思想基礎和價值觀念上，兩國人民的利益都緊緊地連在一起。」石志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一九四九．十一—一九八九．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74。北韓方面認為，「朝中兩黨、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階級兄弟之間的戰鬥

依」、「休戚與共」來形容，其原由有相當深厚的歷史背景。當然，一九五〇年韓戰的爆發，中共曾派百萬「人民志願軍」介入，以鮮血換得了北韓的戰鬥友誼，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關鍵。但在更早期的階段，即在韓半島和中國大陸滿州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建北韓的勢力在中國大陸共同抗日而形成的感情、思想、軍事友誼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sup>15</sup>。雖然北韓政權當初是蘇聯一手栽培成立的，不過初期內部派系亦甚複雜，大致可分為滿州派<sup>16</sup>、延安派<sup>17</sup>、國內派及蘇聯派等四大派系。後來在四大派系為掌權鬥爭中，金日成為首的滿州派成為最後的贏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甫將成立之際，雖然中共與北韓在抗日時期，兩個共黨之間形成了「休戚與共」的關係，不過因各自國內政權穩定的緊迫以及受到蘇聯的獨占地位的影響，沒有大的進展。而北韓政權建國時，只是毛澤東與朱德致電報祝賀；且中共和北韓兩國雖在一九四九年十

---

友誼，是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共同鬥爭中用鮮血凝成的崇高的偉大的友誼。朝中友誼的歷史由於悠久的傳統和無數難忘的動人事實而放射著光芒，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生動典範。」社論：朝中友誼萬古長青 《勞動新聞》，1978. 5. 11。

<sup>15</sup>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以「金日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朝鮮人民的鬥爭」為標題，在《人民日報》刊登的一文中，金日成指出：「當朝鮮的愛國志士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而必須尋找安身之所的時候，中國人民為他們妥善周到地準備了安全的避難所。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歲月裡朝鮮的游擊隊在朝鮮和滿洲邊境地區作戰，獲得了中國人民兄弟般的支援，同樣，成千的朝鮮愛國志士後來便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一同戰鬥，積極地幫助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另外，金日成在於滿州抗日鬥爭回憶中說，「我學會了中國話，因而在「朝鮮革命」過程中得到了不少的好處。」金日成，《同世紀一起》第1卷（平壤：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92年），頁59。

<sup>16</sup> 1936~1940年間，金日成所屬於在中國大陸東北地區由楊靖宇為總司令的「東北抗日聯軍」的第一路軍，跟聯軍政委魏拯民學了共產主義理論，除了金日成以外金一、金策、安吉、崔賢等的活動也引人注目。至於1940年間，「東北抗日聯軍」被日本「關東軍」打敗，金日成和他的同志們逃跑到遠東俄羅斯，在海參崴（Vladivostok）跟蘇聯遠東軍受軍事訓練。一九四二年蘇聯遠東軍組成這些流氓於蘇聯境內的抗日遊擊隊為「蘇聯工農獨立第八八步兵旅」，由周保中（中國人）為旅長，李兆麟（中國人）當政委，金日成擔任為第一營營長。其後在滿州各地散佈抗日的朝鮮遊擊隊員陸續進來軍營邂逅，一九四五年七月他們為了建設朝鮮共產黨和解放祖國工作，在八八步兵旅裡由金日成主導組成「朝鮮工作團」，後來屬於這些人被稱為「滿州派」。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韓半島從日本殖民光復，同年九月十九日，金日成和他的同志們受史達林庇護之下回來北韓，經過三年的時間，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學俊，《北韓五十年史》（漢城：東亞出版社，1995年），頁55~130；李鍾爽，《北韓——中國關係 1945~2000》（漢城：圖書出版中心，2000年），頁17~120。

<sup>17</sup> 一九四二年七月，在中共占領的延安，朝鮮共產主義者和左派民族主義者組成「華北朝鮮獨立同盟」，而其武裝力量為「朝鮮義勇軍」。韓半島解放後，他們大部分從四六年到五一年期間回北韓成為北韓軍指揮部的一軸，就稱他們為所謂延安派。同上註。

月六日建交，但中共一直沒派駐北韓大使，到了五年八月十三日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才派初任大使倪志亮赴平壤就任<sup>18</sup>。當時中共的對外戰略是向蘇聯「一邊倒」，北韓更是類似蘇聯的衛星國，可說韓戰之前，中共與北韓之間關係的重大問題是幾乎由蘇聯控制的局面<sup>19</sup>。中共與北韓只在國家與黨的層級上，維持一種適當但疏遠的關係。

韓戰爆發前幾天，《人民日報》的國際短評指出，「朝鮮祖國戰線發起的朝鮮和平統一運動，是世界民主和平運動的一部分。今天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正在狂瘋地準備新的戰爭。在亞洲，美帝國主義在中國遭到可恥的失敗後，正在扶植日本反動勢力，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而南朝鮮則是美國在遠東實施侵略陰謀的一個前衛。<sup>20</sup>」就揭露中共對韓戰爆發之前的東北亞情勢的認識，以及鋪路了為中共參加韓戰的正當名分<sup>21</sup>。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韓半島上發生同族相殘的悲劇，即韓國戰爭爆發。北韓、中共和蘇聯的事前預測為美國不可能介入這場戰爭，但在韓戰爆發的當天，卻美國就召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控告北韓軍隊進攻南韓的決議，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佈美軍直接參加韓戰並派遣美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但韓戰爆發後第四天，北韓軍就占領漢城繼續向南下，到了同年八月十五日，金日成宣稱已攻佔南韓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七月一日駐日本的美軍第二十四師團第二十一旅第一營從釜山登陸參戰，九月十五日，聯合國軍在南韓仁川登陸，戰局才出現逆轉，到了十月一日南韓軍隊越過「三十八度線」進攻北韓。

---

<sup>18</sup> 國土統一院編，《國別南北韓外交年表 1945~1973》（漢城：國土統一院，1974年），頁198。

<sup>19</sup> 殷千基，《北韓對中蘇外交政策》（漢城：南芝，1994年），頁95。

<sup>20</sup> 國際短評：朝鮮和平統一運動，《人民日報》，1950. 6. 19。參考，<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1/10/20001012/269053.html>。

<sup>21</sup> 一九九四年六月，時任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將一部完整的舊蘇聯和北韓關於韓戰的歷史資料做為禮物贈送給來訪的南韓金泳三總統，這份長達二十萬字的俄文原始資料，隨即譯成韓文在南韓各報章紛紛刊登。根據這份資料的韓戰開始前史達林、毛澤東和金日成三人之間的來往電報，韓戰實質上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策劃和批准，由金日成扮演主角的悲劇。參考，6.25 內幕 / 莫斯科的新證言 1~30，《漢城新聞》（1995. 4~8）；馬仲可編，《解密了的舊蘇聯文獻檔案解說》（漢城：自由總聯盟出版社，1994年）。

由於戰爭形勢急劇變化，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召見中共駐北韓大使倪志亮和武官柴軍武，提出希望中共盡快派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十三兵團過江支援北韓軍作戰，同時還派朴憲永和李相朝到北京提出同樣的請求<sup>22</sup>。

十月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史達林的電報。電報說，「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sup>23</sup>」同月八日周恩來、林彪赴蘇聯與史達林商談，以爭取蘇聯供給武器並出動空軍掩護，但史達林不同意提供空中掩護，只同意供應武器。十三日毛澤東致電在蘇聯的周恩來，「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北、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sup>24</sup>十八日毛澤東下決心，確定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出兵入韓。中共便不顧本身內部的困難，以「抗美援朝」為名派遣「人民志願軍」赴韓參戰、同美國對抗，以示範其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道義<sup>25</sup>。

中共參加韓戰長達三年期間，可分為兩個階段：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為第一階段。一方面，經過五次戰役，「中、北聯軍」把「聯合國軍」推回「三八線」，恢復韓半島北半部，就改變了韓國戰爭的形勢。另一方面，在外交戰線上通過各種方式闡明中共抗美援朝行動的正義性<sup>26</sup>；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

<sup>22</sup> 金學俊，同前引書，頁 154。

<sup>23</sup> 轉引自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 25。

<sup>24</sup> 同上註，頁 26~27。

<sup>25</sup> 中共參加韓戰的背後動機，參考朴斗福，中共的韓國戰介入，金徹凡編，《韓國戰爭》（漢城：平民社，1989），頁 281~312。

<sup>26</sup>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事實證明，美國侵略朝鮮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朝鮮本身，而且是為了擴大侵略中國，朝鮮的存在與中國的安危從來就是密切關

為第二階段，可以說是戰場上相持兩年，談判桌上對陣了兩年，邊打邊談，談打相互作用，關於韓國軍事停戰的協定終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門店簽字，韓國戰爭宣告結束。

中共參加韓戰，不僅是改變了戰局，而且是對往後中共和北韓內部政權、中北（韓）關係以及中蘇關係的變化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針對南韓而言，中共的參戰改變整個戰局，將韓戰以「停戰的狀態」為告終，使喪失韓半島統一的好時機。就北韓而言，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金日成密訪北京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並與由彭德懷為總司令而組成了「中朝合作軍事會議」，從此金日成將作戰指揮權轉移交彭德懷的手中，而專心肅清「朝鮮勞動黨」內部各派系的政敵，例如，蘇聯派的金烈和許哥而、延安派的武亭和金漢仲、國內派的朴憲永和許成澤等都被批判而受到處罰。金日成藉戰爭且鞏固了他自己為核心的單一領導體系<sup>27</sup>。雖然中共因參戰而犧牲了十六萬人命<sup>28</sup>及拖延國內經濟建設，但也由於對美作戰而完成保衛國家安全之目標<sup>29</sup>，不但提高了它自身的國際地位，更鞏固了毛澤東的權力。

經過韓戰，中共與北韓關係從抗日同志友誼進展為政治、軍事同盟的血盟關係。並且參加韓戰的軍官幾乎形成往後解放軍的高層，持續保障了這個同盟關係。中共參加韓戰，當然擴大中共對在戰前向蘇聯「一面倒」的北韓政權的影響力，並且提昇了在社會主義陣營裡中共的地位<sup>30</sup>。但在中

---

聯著的，抗美援朝正是為了保家衛國。同時，中國人民這種志願援朝抗美的表示，是完全合理的。」轉引自，石志夫主編，同前引書，頁 63。

<sup>27</sup> 金學俊，同前引書，頁 157~173；李鍾爽，同前引書，頁 195~199。

<sup>28</sup> 中共參加韓戰死亡人數的統計，中共方面發表十六萬。參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研究》創刊號（丹東：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研究編輯部，1993年7月），頁 40；但南韓資料主張，人命損失為大約一百萬以上。參考李相禹，《北韓 40 年》（漢城：乙酉文化社，1990年），頁 451。西方資料顯示，中共失去的兵員大略四十萬人。參考 John Gittings, *The Role of Chinese Arm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76~78。

<sup>29</sup> 彭德懷認為：「韓戰的意義在於，它顯示西方侵略者可以藉著洋槍大砲來佔領東方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且是永遠過去了。新式武器無所不能的理論，被證明是欺人之談，而帝國主義思想被徹底揭露了。」彭德懷的談話，輯於《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新中國書局，1954年），頁 392。

<sup>30</sup> 一九五三年二月，周恩來讚揚了與莫斯科的合作，並宣稱這場武裝的反侵略鬥爭，大大地提

共的參戰及作戰過程中所揭露的，中蘇兩國間的微妙的矛盾和緊張，播種了以後中蘇糾紛的種子<sup>31</sup>。

韓戰後，中共對北韓的支援，一方面就是援助北韓戰後恢復經濟重建，並留下的人民志願軍以保護北韓的安全，另一方面為從韓半島撤退美國勢力，展開外交活動<sup>32</sup>。「停戰協定」簽字後，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金日成首次正式訪問北京<sup>33</sup>，針對中共人民志願軍的支援表示深厚的謝意，並請求中共對北韓往後恢復經濟建設的援助，雙方簽訂了「中朝經濟文化合作協定」。

韓戰停戰以後，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間，中共經由三次撤回了十九個師團，但十五個以上的志願軍師團還繼續留駐於平壤郊外，一邊保護北韓安全，一邊參加重建工作。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和金日成均參加莫斯科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共識為由於韓半島的情勢穩定且志願軍的使命已達成，應可以完全撤防。一九五八年二月周恩來率同外長陳毅訪問平壤與金日成達成協議將人民志願軍完全撤兵。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韓半島的中共撤軍後，十一月金日成再次正式訪問北京向中共表謝意，並同中共發表聯合聲明向美國要求撤離在韓半島上的一切外國軍隊<sup>34</sup>。就這樣才結束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政權為韓半島問題而出兵的歷史的一頁<sup>35</sup>。

---

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並強化了蘇聯所領導的陣營。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的報告，同上註書，頁 278~279。

<sup>31</sup> 周恩來在一九五一年就指出，蘇聯不能代替中共講話，這世界上有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且任何國際問題若缺乏蘇聯「和」中共同時參與，將不可能得到有意義的解決。周恩來的宣揚，同上註書，頁 176~177。

<sup>32</sup> 這時期中共的日內瓦外交活動，一方面扶助保護北韓的安全和地位，另一方面提昇了中共本身的國際地位。「一九五四年關於韓國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為中共與有關西歐國家的官方直接接觸和互相觀察了解提供了機會。」石志夫主編，同前引書，頁 234。

<sup>33</sup>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日金日成正式訪問中共之前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北建交其間，金日成曾經有三次非正式訪問北京：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與毛澤東、周恩來討論發動韓戰的計畫；第二次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會談「中朝聯合司令部」的組成問題；第三次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與毛澤東討論停戰談判的策略方針。參考李鍾爽，同前引書，頁 309。

<sup>34</sup>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聯合聲明，《勞動新聞》，1958. 12. 9。轉引自，李鍾爽，同前引書，頁 204。

<sup>35</sup> 「傳統中國的世界觀，把國際體系就好像人類的親屬關係一樣，當看具有一定的結構與秩序。

總之，在這時期，中共基於辯證思維的世界觀而將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的認知，自己是處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裡，在自我定位的角色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並且在對外戰略上盼望與蘇聯建立親密關係而確定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中共參加韓戰，使美國遭到第一次的軍事失敗，造成了中共做為世界強國的形象，提高了其國際地位，獲得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認同，並且再度確保了中國大陸對韓半島的影響力。

### 第三節 中間地帶論與親北排南政策

#### 一、中間地帶論與兩條線政策

「中間地帶論」最初是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的<sup>36</sup>。毛澤東當時認為，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一塊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它是指處在亞、非、歐三洲包括「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內的中間地域。在一九四九年間，中共以兩大陣營論來看待世界格局，就決定倒向蘇聯，幾乎十年時間沒有再談到中間地帶論。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赴莫斯科在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的發言中，再度使用了「中間地帶」的說法。在這時期和地點，毛澤東重提中間地帶論，其意義非同小可。這代表新的國內外環境使中共領導者對世界格局的重新認識。

五十年代中期，有三件大事對世界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似乎引起毛澤東對於第三種力量的新思考。

第一是一九五五年由亞非獨立國家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表明新生獨立的民族國家擺脫美國的陰影、追求中

---

這個結構有如一座金字塔，塔頂是中國，它是世界的中心亦是秩序的維護者。這個世界體系金字塔分為多層，依其與中國的親疏關係與國力強弱而向下排列。這些國家奉中國為上邦或宗主國，依時向中國進貢、奉正朔，並向中國報告國內重大事件。但是如果這些小國發生內亂或是彼此間發生了衝突，中國就有責任濟弱扶傾，重建秩序。」明居正，中國外交史分析架構之再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六期（台北：台灣大學政系，1995.5），頁270。

<sup>36</sup>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頁1135-1140。

立的傾向，已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流<sup>37</sup>。

第二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發表的批判史達林的演講和「和平共處總路線」。毛澤東對於此表示，「蘇聯過去把史達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中央認為史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sup>38</sup>」赫魯雪夫的貶抑，只不過提供了中蘇發生衝突的導火線而已。更重要的是中共了解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在蘇聯領導之下妥善經營<sup>39</sup>。

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使中共懷疑蘇聯對於社會主義陣營領導者的角色和期望。蘇聯已明顯表態他擁抱了帝國主義，中共的辯證世界觀因而受到了致命的一擊。因此，毛澤東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sup>40</sup>」顯然中共對於蘇聯政權的性質的討論越深入，就發現自己本身的角色越顯得尷尬。不僅社、資兩個陣營對立鬥爭的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中共本身的角色也變得模糊了。

第三是一九五六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毛澤東對此提出了「兩類矛盾」、「三種力量」的觀點：「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

---

<sup>37</sup> 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訪問印度與緬甸，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後，事實上中共初步擺脫建國初年的「一邊倒」政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建立與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家的正常關係，以致於友好關係。這種政策取向的演變，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的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上，達到了高潮。

<sup>38</sup>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頁286。

<sup>39</sup> 趙雲山，中共對外戰略思想之演變，《中共研究》第29卷第6期（1995年6月），頁40；Samuel Kim, "Mao Zedong and China's Changing World View," in J. Hsiung and S. Kim, eds., *Chin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pp. 30-31.

<sup>40</sup> 同註38，頁285-288。

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sup>41</sup>」與此同時，毛澤東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性質與作用問題作了新的分析。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同巴西記者談話時指出，有許多國家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民族主義國家。「這些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sup>42</sup>」這些事件的發展，使得中共領導人面臨壓力，不能以兩大陣營論來解釋，必須對這變動的世界格局，另外以一個新的觀點來加以切入理解。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上，公然表示反對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從而與蘇聯矛盾遂漸表面化。其後中共對蘇聯透過援助控制中共的政策更加不滿，於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略上決定擺脫蘇聯模式。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召開八大第二次會議，決定「三面紅旗」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同時發動「八二三砲戰」攻擊金門、馬祖。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片面撕毀中蘇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簽署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對中共提供原子彈樣品及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同年八月中共與印度發生邊境衝突。一九六〇年七月，蘇聯斷然在一個月內撤回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專家一千三百九十人，並撕毀三百四十三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及廢除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sup>43</sup>。

如此一來，中蘇矛盾公開化、關係不斷惡化，逐步從盟友演變為敵人，在「北方三角關係」內部出現矛盾，處境最尷尬的就是在中蘇間夾縫中的北韓。北韓因與中共、蘇聯在地理上相互接壤，而且同屬共產集團的成員，是故自始即在中、蘇共的扶助下成長壯大。經過韓戰後互相對峙的南北

---

<sup>41</sup>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41。

<sup>42</sup> 轉引自，李向前，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世界知識》1993年第24期，頁10。

<sup>43</sup> 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94。

韓，各自維持著不同的同盟關係，亦即形成南韓、美國、日本間的「南方三角」與北韓、蘇聯、中共間的「北方三角關係」<sup>44</sup>。由於五十年代時期，中共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所以雙方在韓半島採取共同的立場。自一九五六年起，中共與蘇聯關係逐漸惡化，北韓不得不改採兩面敷衍的中立的姿態處理與中蘇兩國間關係。從北韓內部出現的微妙的變化中可觀北韓與中蘇間關係的變化。

## 二、中蘇關係的惡化與拉攏北韓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韓發生所謂「八月宗派事件」的派系鬥爭<sup>45</sup>。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影響，北韓內部也逐漸對金日成搞個人崇拜和掌權滿州派的壟斷出現不滿意的聲音。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七月金日成出訪東歐，趁著這個機會，蘇聯派、延安派和國內派聯合形成反金日成勢力，在八月三十日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員會議」上，企圖批判金日成個人崇拜主義和當權派，但會議場所已被當權派所控制，結果慘敗。該事件連累的所謂「反黨宗派份子」被除黨的除黨、被辭職的辭職，陸陸續續被除去了。十二月五日金日成批判稱，「這些反動派份子被外部侵襲而來的國際修正主義所污染。」<sup>46</sup>所謂國際修正主義指的就是蘇聯。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決定「大躍進」運動，隨即北韓也實施「千里馬」運動，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上也採用類似的模式，表示「難兄難弟之情」。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周恩來和金日成在北京聯合發表的聲明中，強調必須對修正主義繼續進行不妥協的鬥爭<sup>47</sup>，表示在中蘇矛盾中站立中共這一方。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既反美又反蘇，事實上陷入被美蘇同時包圍的困境，「三面紅旗」政策的失敗、加上蘇聯的撤走援助，中共經濟在一九六十年代更加惡化，可

---

<sup>44</sup> 高崇雲，《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的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9），頁20~21。

<sup>45</sup> 參閱，李鍾爽，《朝鮮勞動黨研究》（漢城：歷史批評社，1995），頁275~284。

<sup>46</sup> 《金日成著作選集》第五卷（平壤：朝鮮勞資黨出版社，1968），頁241。

<sup>47</sup> 同註34，頁218。

說處於內外困難的危機<sup>48</sup>。但中共不顧本身的困境，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簽署支援北韓的經濟建設而供應重要物資為內容的「中朝長期貿易協定」，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三日，又簽訂允予北韓貸款四億二千萬人民幣<sup>49</sup>。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中共與北韓雙方在北京締結所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條約中規定其有效期限，如果沒有由雙方同時合約廢棄，就是永久的；締約性質為一方受到任何國家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的屬於攻守軍事同盟。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周恩來率同陳毅密訪北韓，十二日簽訂「中朝邊界條約」<sup>50</sup>。一九六三年六月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崔庸健訪問北京，與劉少奇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強調反對赫魯雪夫的現代修正主義，同年九月劉少奇回訪平壤。從此以後，北韓在中蘇大論戰中，公開揚言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是各國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亦因此一邊倒向中共，並追隨中共的反蘇鬥爭。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是中共與北韓關係最親密的時期，在其間金日成正式及非正式訪問中國大陸總共有八次，而且在六四年短短一年期間非正式訪問了三次，吾人推測他與中共討論有關共同步調對付蘇聯的問題<sup>51</sup>。這可說是中

---

<sup>48</sup>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頁210~211。

<sup>4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243、292。

<sup>50</sup> 同上註，頁337~338。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中，沒有詳細記載其條約的內容和會談過程，但在此異常附帶，周恩來向金日成解釋中共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態度和方針，周恩來說：「我們的方針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進攻我，我擊退你，我不出擊。」在此，筆者懷個疑問：為何周恩來在中朝雙方談判邊界問題時，言及中印邊界衝突和處理問題？是否給金日成施壓，而在中朝邊界劃定時占優勢的一種策略？若是如此，何必在此特別記載？後來發現其目的不在於給金日成威脅簽訂邊界條約，反而是為了給安撫內部對中朝邊界劃定有不滿意的人用的。因為在文革期間，紅衛兵主張在為中朝邊界劃分而測量時，有一些延邊朝鮮族使刁對北韓有利測定而割讓給北韓。由此，當時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以教唆罪名被紅衛兵無辜害死，但隨文革結束後就平反。參考，李鍾爽，《北韓——中國關係 1945~2000》，頁227~236。

<sup>51</sup>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金日成在結束越南訪問回北韓途中，留下來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有關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下台後繼任的布里茲涅夫政權的評估。在對於蘇聯新領導層的評估，中北之間的意見基本上一致，但出現微妙的差距。中共為仍然否定的態度，卻北韓保留否定的評價。結果從此會談結束後至一九六九年間，就沒有雙方領袖的互訪。參

共與北韓的密切關係達到頂點。至於南韓，大陸媒體稱南韓為「南朝鮮偽政權」或「美帝走狗」，因而中共與南韓一直處於敵對狀態。

有趣的是，中共為何不顧本身困難而支援北韓？從反蘇聯統一戰線的角度來講，中共拉攏北韓，主要原因在於中共的安全問題上<sup>52</sup>。中共擔憂如果蘇聯掌握了北韓，利用韓半島的地緣位置，則遼東半島、天津、上海等主要港口極易遭受封鎖。相反地，如中共在北韓占有優越地位，或最低限度與蘇聯同地位，則可使蘇聯對東北地區及黃海沿岸的威脅減少。

從中共重新提出「中間地帶論」的動機來看，中共認為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政策就是背叛變節的表現，因為他擁抱了帝國主義，中共的世界觀因而受到了致命的一擊。不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對立鬥爭的理論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中共本身的角色，也變得模糊了。因此，中共為了要表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這一邊，甚至不顧國內經濟的困難，援助北韓，拉攏北韓。在此中共將同志相處的原則加以強調，因為他可以證明蘇聯並非是個好同志。總而言之，中共之目的可能是在創造一種好感覺和印象，讓大家相信只有中共才會誠心幫助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北韓。

到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共又提出了中間地帶論的新版本，把「中間地帶論」一分為二，一部分是指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落後的國家，此為「第一中間地帶」，另外一部分是指歐洲、北美、太平洋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此即為「第二中間地帶」<sup>53</sup>。在六十年代中共統一戰線戰術的主要目標就是第一中間地帶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大多具有與中共類似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背景。中共希望藉著反帝、反殖使它們認同共同敵人，自行組織起來，彼此互助，以能打擊帝國主義。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在「人民戰爭勝

---

考，吳冷西，《十年論戰 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 883~888。

<sup>52</sup> 高崇雲，同前引書，頁 19。

<sup>53</sup> 《人民日報》，1964年1月20日，第一版。

利」一文中，提出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所謂的世界農村即指亞、非、拉地區<sup>54</sup>。林並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非、拉美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就文革發生前一年，中共外交已浮現「革命輸出論」的極左路線思潮。

從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中共和北韓領導層對蘇聯新政權的評估出現微妙的分歧以後，北韓對於反蘇聯的宣傳即逐漸減少，隨即新的蘇聯領導層對北韓表現出慎重的態度。時任蘇聯總理柯錫金於一九六五年二月訪問平壤與金日成會晤，雙方發表共同聲明，強調在一九六一年締結的「朝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重要性，雙方應有互相提供援助的義務。其後，蘇聯向北韓開始再提供軍事援助，從此以後，北韓與蘇聯關係開始有所改善。布里茲涅夫於同年九月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中發表演說曾將北韓與北越列為蘇聯對外關係中的重要地位<sup>55</sup>。一九六六年三月，北韓不顧中共反對派代表參加蘇聯共產黨二十三屆大會，而且北韓《勞動新聞》特別報導了在此屆會議上的演講，在此演講中布里茲涅夫提出蘇聯將與中共改善關係的願望<sup>56</sup>。同年八月十二日，北韓在《勞動新聞》發表以「要擁護自主性 為標題的社論來，向外宣佈自主路線的「主體思想」，表示將要在中蘇論爭中維持中立的立場<sup>57</sup>。

### 三、造反外交與中北關係的疏遠

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最初三年裡，極左思潮的盛行和政治秩序的混亂，對於中共外交造成嚴重的衝擊，使中共的國際地位和對外關係處於十分困難的局面。一九六八年十月，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問題

---

<sup>54</sup> 轉引自，石志夫主編，同前引書，頁 190~191。

<sup>55</sup> 轉引自，崔昌潤，北韓對中蘇政策，高秉哲外編，《北韓外交論》（漢城：慶南大學極東問題研究所，1977），頁 59。

<sup>56</sup> 《勞動新聞》，1966. 3. 31，轉引自，李鍾爽，《北韓——中國關係 1945~2000》，頁 242。

<sup>57</sup> 《勞動新聞》，1966. 8. 12，轉引自，金學俊，《北韓五十年史》，頁 240~241。

的文章中，林彪強調「世界革命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只要有中國不倒，不變色，世界就有希望」外交工作要做下層，要放在駐在國人民群眾方面。若與修正主義當權派、各國反動派當權派搞在一起，就脫離了人民群眾，就是孤立。<sup>58</sup>這就是所謂的「造反外交」，意味當時中國大陸內部政治的極度混亂狀況對外交政策的干擾。文革開始後不久，中共駐外大使除駐埃及大使黃華以外，全部紛紛奉調回大陸參加文革，致使中共外交工作陷入停頓。在文革開始後的一年時間，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四十多個國家中，近三十個國家都與其發生外交糾紛。

由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共與北韓的外交關係也逐漸疏遠。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共的紅衛兵開始張貼批判金日成的大字報，稱金日成是「朝鮮修正主義」，揚言要逮捕金日成<sup>59</sup>，北韓的「中央通訊社」也開始批評中共。紅衛兵瘋狂要求北韓將長白山天池割讓中國大陸，以補償中共參加韓戰的代價。於一九六五、六六、六八和六九年，中共與北韓部隊在長白山邊界發生局部性衝突，而中共要求對長白山邊界的進行勘察<sup>60</sup>，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調動一個軍團的兵力配置於中北邊界<sup>61</sup>，在鴨綠江及圖們江也發生糾紛相互指責。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共和北韓雙方各召回駐平壤和北京的大使，因而中共與北韓關係就處於建交以來最惡劣的狀態。

一九六七年秋季，中共與北韓關係降落谷底，矛盾已浮上檯面，雙方各召回大使、連溝通管道也封閉，以至於出現宣傳媒體相互誹謗的局面。不過周恩來則暗中尋求解決中北間矛盾的妙計。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訪問北京以後，在繼續訪問北韓的路上，周恩來託付達達赫給金日成三點口信，二十七日達達赫總統由北韓赴東

---

<sup>58</sup> 同上註，頁 191。

<sup>59</sup> 殷千基，《北韓對中蘇外交政策》（漢城：南芝，1994），頁 118。

<sup>60</sup> Robert R. Simmons, "China's Cautio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Indochina", *Asian Survey*, 11, July 1971, pp. 633~634.

<sup>61</sup> 殷千基，同前引書，頁 314。

埔寨途中經過北京，向周恩來轉達了金日成的四點口信。周恩來表示對雙方最近一連串發生事件的遺憾、支持北韓的反帝鬥爭以及和諧的願望，金日成回信表示北韓對中共友好政策的不變、重視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友誼、雙方間現存的異見由對話能解決、相信若北韓處於困境中共會支援。<sup>62</sup>雖然「中、北關係」仍然存在緊張的狀態，但雙方首腦之間維持了基本的共識，因此「中、北矛盾」不會上升到「敵我矛盾」。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發生美國普韋布洛號(Pueblo)間諜船事件，該艦侵入北韓十二海里的領海，被北韓艦艇截獲扣留，美北間的緊張關係接近於衝突邊緣，中共隨即支持北韓，發表聲明反對美國利用間諜事件搞戰爭威脅。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在韓半島公海上空發生美國海軍偵察機EC-121被北韓擊落事件，局勢再度高漲緊張。就這樣，在中共與北韓找到共同對抗的敵人的新形勢下，雙方的關係逐漸脫離文革時期的谷底，情況又稍和緩。一九六九年九月時任北韓人大委員長崔庸健赴北京參加中共二十周年國慶活動，一九七〇年二月和三月，雙方大使也分別到任，七月四月周恩來應金日成的邀請正式訪問平壤，十月八日金日成再度非正式訪問北京，兩國關係才恢復文革之前的友好關係。隨著中共對北韓援助及互助大幅度增加，而簽訂各種重要協定，例如，一九七〇年十月「關於中國向朝鮮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關於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相互供應主要貨物協定」，一九七一年「中朝經濟合作協定」、「關於中國向朝鮮無償提供軍事援助的協定」以及「兩國船舶檢驗合作協定」等。但此時中、北關係的復原，不表示是單純的回歸，而是意味著雙方關係經由這樣動盪過程，中共已對北韓的「主體思想」和對外獨立自主路線的肯定。

綜合而論，毛澤東在面臨對民族主義國家的互動時，由於這些國家既非帝國主義，亦非社會主義，而是中立的立場，這些事實的發展，使得中共領導人面臨外界變遷之壓力，而不能以兩大陣營論來解釋，必須以一個新的觀點來釐清與認知。如此，中共重新解釋當時的主要矛盾和世界格局

---

<sup>6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96。

的特性，再度以「中間地帶論」，確認中共所處的位置和該扮演的角色。與此同時，中共對外政策逐漸從「一邊倒」逐步轉向反帝、反修或「兩條線」戰略，也埋下日後對北韓態度變化的關鍵或原因，這亦為辯證思維的應用與效應。

#### 第四節 三個世界論與近北遠南政策

##### 一、三個世界論與一條線政策

六十年代，中共基於「中間地帶論」的世界觀，推行「反帝、反修」的「兩條線」對外戰略，事實上使自身陷入被美蘇同時包圍的不利安全情境中，造成樹敵過多，導致了在國際舞台上的孤立，而且國內的建設和發展也缺乏應有的國際環境<sup>63</sup>。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蘇間發生珍寶島流血衝突，四月一日時任國防部長林彪在中共「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sup>64</sup>。中共認為蘇聯已經背叛社會主義，並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中共「九大」結束後，毛澤東即指示周恩來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人針對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戰略關係提出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報告，結論認為要遏制蘇聯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只有打美國牌，且認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在這一判斷下，中共決定開始推動和美國的友好關係<sup>65</sup>。為了貫徹聯美抗蘇，毛澤東積極地提出建立一個中國大陸經中東到四歐，越過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國再經過太平洋至日本，並且包括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在內的美國的同盟國，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至於七十年代，中共以「三個世界

---

<sup>63</sup> 中間地帶論的世界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共決定在國際舞台上團結誰、爭取誰和對付誰的戰略策略提供理論依據。「中間地帶論」和「三個世界論」，兩者之間的區別，主要是當時還勉強維持著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參閱，朱詩柱，毛澤東「中間地帶」理論探析《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一期，頁27。

<sup>64</sup> 《匪俄鬥爭原始資料彙編》13（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1），頁27。

<sup>65</sup>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363。

論」來對世界格局的重新認識和設定對外政策。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論」，把世界「一分為三」，「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個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sup>66</sup>」在同年四月舉行的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鄧小平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向世界介紹，指出「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個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sup>67</sup>。」

## 二、一個朝鮮政策與北韓的自主外交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國際情勢急速改變了。一九七一年中共受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取代台灣的席位進入聯合國，成為安理會的五個常務理事國家之一。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森上台後，對美國全球戰略做出調整。這主要是美國對蘇聯和中共政策的改變。由此，過去以意識型態為對抗的東西冷戰，因美蘇關係新發展和美中關係的改善，逐漸解凍。這些七〇年代初國際環境的改變使北韓展開積極地對外政策，同時北韓決定同南韓關係的改善來克服內部的困境。因為在六〇年代北韓選擇軍事冒險主義的政策，導致被孤立和國內經濟發展的遲鈍。

中共經由一九六九年中蘇邊界衝突，決定同美國改善關係的戰略，對北韓產生極大的衝擊，需要安撫北韓不讓倒向蘇聯，因為北韓一直把美國視為主要敵人，是「中朝血盟關係」合作的基礎。這時期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重點是支持北韓的統一方針，拉攏北韓不讓接近蘇聯。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北韓提出八點韓半島統一綱領，中共《人民日報》在十五日發表題為「朝鮮人民統一祖國的鬥爭必勝」的社論說，「中國人民堅持支持朝鮮勞動黨和政

---

<sup>66</sup> 轉引自，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1979）》，頁 443。

<sup>67</sup> 同上註，頁 444。

府關於朝鮮和平統一的行動綱領和嚴正立場，堅持支持全體朝鮮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所扶植的朴正熙集團、爭取祖國統一的正義鬥爭<sup>68</sup>。」表示中共對北韓統一方針的支持及對美帝站在同北韓的立場。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金日成向日本《讀賣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了北韓的統一政策。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再度把金日成的談話以「促進朝鮮和平統一的重大倡議」為題的社論，金日成提出的促進和平統一的重大倡議，「表達了四千萬朝鮮人民的深切願望，對於實現朝鮮的和平統一，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和維護亞洲和平，具有重大意義。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表示完全和堅持的支持<sup>69</sup>。」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共將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的計畫發表之前，派周恩來密訪平壤向金日成說明中共的對美政策和立場<sup>70</sup>。當從周恩來聽取中共將要改善美帝的關係、並且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時，北韓不僅感受到困惑，將要如何對人民解釋改變情勢，而且懷疑對中共是否放棄反帝路線。針對情勢比人勢強的局面，北韓順應大勢不得不採取彈性的態度。七月三十日派副首相金日赴北京向周恩來轉達北韓對中共的理解和信賴。同時，請求中共在與美國會談時，向美國轉達北韓對美國的八點要求<sup>71</sup>。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雙方發表「上海公報」，三月七日周恩來訪問北韓向金日成說明，對於尼克森訪問北京、同中共改善關係以及「上海公報」的內容。對此，《勞動新聞》以社論發表北韓的正面回應說：「這次尼克森出自本意親自訪問中國，決定和中國在一系列方面改善關係，這意味著長期以來美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封鎖孤立政策遭到了總破產——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特別是中國在聯合公報中，再次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九

---

<sup>68</sup> 《人民日報》，1971. 4. 15，第一版。

<sup>69</sup> 《人民日報》，1972. 1. 29，第一版。

<sup>70</sup>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 40。

<sup>71</sup> 同上註。

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我們共和國提出的關於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這是兄弟的中國人民對於我國人民迫使美帝撤出南朝鮮，爭取實現自主和平統一祖國的正義事業的強大支持<sup>72</sup>。」

就在中共與北韓再度合作之後，北韓展開對南韓的和平攻勢。一九七二年五月，金日成首先提出自主、和平統一、民族團結三項原則。同年七月四日，南北韓發表「七四南北共同聲明」，進行「南北紅十字會談」和「南北調節委員會會談」，中共對此增加以讚揚。後來南北韓雙方只利用「南北對話」，企圖鞏固自身的政治權力，一九七二年十月南韓總統朴正熙改憲，達成所謂「維新體制」的專制統治，北韓也同年十二月修憲，金日成進一步掌控黨政軍的權力，由此韓戰以後南北韓雙方第一次接觸「對話」的意味逐漸退色了

<sup>73</sup>  
。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外長姬鵬飛訪問平壤，聲言支持南北韓的「和平統一」，而且主張美帝國主義不應干涉朝鮮人自主自立地解決統一問題，必須撤走在聯合國招牌下霸佔南韓的軍隊，必須解散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一九七三年二月，北韓外長許綏訪問北京，也再度強調這些要點。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共提議「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撤消案，聯合國決定解散該委員會。一九七五年四月金日成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晤時，鄧小平指出中共和北韓的目前共同努力目標為要求美國軍隊全部從南韓撤走，讓朝鮮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sup>74</sup>。一九七五年十月聯合國大會上中共提出要求解散「聯合國軍司令部」，從南韓撤走一切外國軍隊等。

一九七八年五月華國鋒正式訪問平壤，再度表示中共對韓半島問題上一貫支持北韓的立場，華國鋒說：「由於美帝國主義和朴正熙集團的破壞和阻撓，朝鮮至今依然處於分裂

---

<sup>72</sup> 《勞動新聞》，1972. 3. 8。

<sup>73</sup> 權五允，《北韓體制變化論》（漢城：Dada-media，1998），頁 333。

<sup>74</sup> 《中央日報》（台灣），1975. 7. 2，航空版。

狀態。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支持朝鮮人民爭取祖國統一的神經事業。我們一向認為，朝鮮的統一問題，應當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任何外部勢力都不得干預。〔聯合國軍司令部〕應當立即解散，美國必須把它的侵略軍隊和武器裝備全部撤出南朝鮮。我們堅決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關於朝鮮自主和平統一的三項原則和五點方針。任何制造〔兩個朝鮮〕，妄圖使朝鮮的分裂永久化的陰謀，都是違背全體朝鮮人民意志和歷史發展要求的，是注定要失敗的。<sup>75</sup>」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共國防副部長粟裕為首的軍事代表團訪問北韓，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北韓成立三十周年慶祝日，以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共黨政代表團赴平壤祝賀。九月九日《人民日報》以「光輝的戰鬥歷程」為題發表社論，大事吹噓北韓三十年來的歷程。<sup>76</sup>一九七九年五月鄧穎超訪問北韓，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時任總理趙紫陽訪問平壤。這時期中共領導人頻繁訪問北韓，對於韓半島統一問題，一貫支持北韓的立場，而且中共在聯合國的外交活動中代替北韓發言也不知其數，因而得到北韓的正面回應。至此，像鐘擺運動一樣在中蘇夾縫中左右搖擺的北韓又來到中共、傾倒於中共。這就是中共對韓半島實施「一條線」戰略而得到的成果。

就中共與南韓關係方面而言，南韓為了應付七十年代初緊張緩和的國際情勢，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朴正熙總統宣佈，放棄過去「反共政策」而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南韓有意改善與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sup>77</sup>。一九七三年六月，南韓政府發表「和平統一外交政策聲明」，該聲明再度表示南韓對於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同樣採取門戶開放政策<sup>78</sup>。如此，南韓雖然展開對共產圈開放政策，但中共與南韓關係至於一九八十年代初，仍然幾乎沒有被發現有關改善的徵兆。若有所進展，一九七四年開始進行郵政交流，允許中國大陸

---

<sup>75</sup> 華國鋒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在平壤歡迎宴會上的講話，《朝中友誼萬古長青——華國鋒主席訪問朝鮮》（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78），頁8~9。

<sup>76</sup> 《人民日報》，1979.9.9，第一版。

<sup>77</sup> 《朝鮮日報》，1971.1.12，第一版。

<sup>78</sup> 《朝鮮日報》，1973.6.24，第一版。

的朝鮮族與南韓的親戚間書信來往。這時期中共一貫否定南韓而承認北韓為韓半島上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並支持北韓的統一政策。

總之，三個世界論也是應用辯證技巧地在兩極間獲致平衡與定位，可以使中共自己免於與美國發展過於密切的關係，並且強調了中共在第三世界的地位，而且提醒美國若不放棄霸權將來中共與美國不可避免衝突，也使得中共可以與第二世界尋求合作。與此同時，這個世界觀引導具體的外交戰略。在反對美蘇兩霸的旗幟下，由於中共感到蘇聯對其安全的威脅最大而把它作為主要矛盾，將由日本經中東、歐洲、美洲過太平洋來到中國大陸，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亞非拉國家結合起來，設想反對蘇聯霸權的各種力量的統一戰線，決定了所謂七十年代「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sup>79</sup>；最終則促使北韓又傾向於中共，此為中共對韓半島實施「一條線」戰略而得到的辯證效應。

## 第五節 東西南北論與持北引南政策

### 一、東西南北論與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具有深意義的轉折<sup>80</sup>。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決不僅限於中共領導層的替換，更重要的是黨的路線的重新決議，就是把以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修改為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任務的路線。鄧小平指出：「至於什麼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任務，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sup>81</sup>。」

---

<sup>79</sup> 共黨問題研究資料室，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8期（1998年八月），頁96-98。

<sup>80</sup>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487。

<sup>81</sup>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3.30），《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68。

如此一來，「發展生產力」被認為，中國大陸八十年代要解決的主要矛盾而且是要完成的中心任務<sup>82</sup>，其具體的要解決的方法或要達成中心任務的方針，就是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指出，八十年代起的核心工作是現代化建設，並指出這是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條件<sup>83</sup>。同時修正以往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觀念，認為國際局勢已由對抗轉向對話，由緊張轉到緩和。並稱「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sup>84</sup>。」在此，鄧小平對八十年代世界格局明確地規定，則認識為「東西南北論」。「東西南北分別代表世界的四大方面，這四大方面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構成了當今世界上三對國際間的基本矛盾，即：東西矛盾，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西西矛盾，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南北矛盾，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sup>85</sup>。」「這是兩個十字相重的形式：東西與南北十字相交，和平與發展十字相交；東西之間存在的主要是政治問題，南北之間存在的主要是經濟問題<sup>86</sup>。」其強調的內涵是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同時考量。中共判斷八十年代國際形勢，認為雖然國家安全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世界大戰應該可以避免之。所以經濟發展問題更為重要的核心問題。

因此，中共根據時代特徵、戰略任務和國際格局的變化，

---

<sup>82</sup> 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趙紫陽的報告中也指出：「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sup>83</sup>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1.16），《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203-206。

<sup>84</sup> 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04。

<sup>85</sup> 呂新國，世界主要矛盾問題研討會紀要，《現代國際關係》1995年第4期，頁15。

<sup>86</sup> 「由於中共採取對兩個超級大國都不結盟的政策，加上中國大陸以實現四個現代為中心任務，對外執行和平外交政策，因而在東西這個十字，中國大陸的座標靠近核心，在和平與發展這個十字中，中國大陸也是處於座標的核心。」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頁24-25。

而進行對其在此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and 角色的重新確定。與此相應的中共自我定位的角色，一九八五年五月，鄧小平以兩句話概括地說明：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一是中共永遠屬於第三世界。<sup>87</sup>其具體的表現為包括：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不結盟、不稱霸；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立足於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採用新途徑加強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對話等等<sup>88</sup>。

同時，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sup>89</sup>同時，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向十二大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為名提出的報告，<sup>90</sup>其第五節的小標題就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強調中共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出發點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對外政策的基礎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採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對外關係，並表示革命不能輸出。文中同時強調，威脅世界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世界人民最主要的任務。就此確立鄧小平時代中共的對外方針，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共五屆人大會議通過的憲法也明確規定，「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sup>91</sup>。

自從中共建國以來，「獨立自主」是不管在口頭上還是實

---

<sup>87</sup> 維護世界和平，搞好國內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56~57。

<sup>88</sup> 席來旺，21 世紀中國戰略大策劃——外交謀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頁 337。

<sup>89</sup>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

<sup>90</sup>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9~46。

<sup>91</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務部調查局編，《中共現行法律彙編》（台北：法務部調查局，1989），頁 3。

際上，中共一直強調的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這代表著中共外交的延續性。但是，中共在一九八二年確立的「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有其特殊含義，與中共以前的對外政策相比，有著嶄新的內容，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核心內容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簡言之，一九八〇年代中共「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新內容是，在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不結盟的策略之下，由發展中國大陸的生產力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八〇年代中共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務，可謂在於追求「國家經濟利益」。

對於「三個世界論」指導的七〇年代中共外交，鄧小平總結說：「三個世界的戰略，關於中國站在第三世界的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並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決策——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於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於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畫，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sup>92</sup>。」同時，這個時期中共也不再強調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論」，逐步發展出「東西南北論」，開始強調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問題，為中共追求和平的國際環境與內部發展的有機連結，尋求合理化、合法化的理論依據。在文件宣示上已刻意減少凸顯蘇聯等同於霸權主義的說法，而同時把美蘇兩個超級強權統稱為霸權主義，顯示中共在兩超強之間的「獨立自主」立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之時，中共也開始強調要結合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把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概念予以統合運用，以配合必要時的政策宣傳。

一九八六年三月，時任中共總理趙紫陽在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中共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表示為了使「七

---

<sup>92</sup>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3.30），《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146。

五」計畫順利實施，加快現代化建設，中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趙紫陽並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包括以下十個方面<sup>93</sup>：(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與促進共同經濟繁榮，是中共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二)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世界事務由各國協商解決，中共決不稱霸，也反對任何霸權；(三)堅持獨立自主，一切國際問題依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態度和對策；(四)中共決不依附任何一個超級強國，不與任何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五)中共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對外關係，而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相同或異同來決定親疏、好惡；(六)中共屬於第三世界，加強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合作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一個基本立足點，中共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七)中共反對軍備競賽；(八)中共堅持長期實行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擴大與各國的經濟、貿易、技術交流與合作；(九)中共支持聯合國依據憲章精神所進行的各項工作，並積極參加聯合國的活動和各種國際組織；(十)中共重視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並鼓勵民間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自中共建國以來，在中共外交政策實踐中的最關鍵的任務，是正確地認識世界基本格局和戰略格局，注意抓住主要矛盾，明確區分敵我概念，而組織國際統一戰線。這一情況直至八十年代才有變化，雖然中共認定，「闡明時代問題（時代的基本矛盾和決定時代性質的主要力量），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矛盾問題，以及世界戰略格局和具體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問題<sup>94</sup>」，仍然是中共領導人從事外交活動的基本準則。但至於八十年代，中共不再以敵我形式設定自己的戰略目標或其對象外交策略，更不再言及組織什麼統一戰線的策略。八十年代以後，中共明白地轉向國際社會，其最一般性的外交目標，即是趙紫陽在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發表的「反對霸

---

<sup>93</sup> 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人民日報》，1986. 4. 14，第一版，請參考，<http://www.peopledaily.com.cn/zgrdxw/zlk/rd/6jie/newfiles/d1140.html>。

<sup>94</sup> 謝益顯，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外交學院學報》，1988年第二期，頁14~15。

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中共設定這樣的目標本身，意味著中共由以往對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的角色，改成要擔任國際體系維護者的角色。

## 二、對北韓有原則的支持

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進入八十年代，隨著中共領導人的對世界格局重新認識和中共外交政策的調整，才開始有了相當程度的轉變。一九八一年一月，時任中共外長黃華以「八十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為題向中共外交部高級官員所做的演說中指出：「朝鮮半島自二次世界大戰分割成兩部分，而這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在短期內又沒有統一的可能，偏偏一個是曾是敵人卻是朋友的朋友；一個曾是戰友卻是我們敵人的朋友，如何微妙地處理我們與兩者之間的關係，變成近幾年來最使外交部頭疼的事，不是這樣的話，我們不會外交部設立一個專門小組，時時刻刻地研究和調整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政策和關係<sup>95</sup>。」當然不能否定任何國家均如同中共，向外部發表的口頭上的宣傳和內部實際方針之間不一致是平常的、也是需要的。但由黃華的這段話中可窺看，中共對韓半島問題的認識上，已經出現以往不同微妙的變化的端倪。

一九八一年十月金日成提出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統一的十點方案，中共隨即表示支持和聲援，更由李先念藉應邀出席北韓勞動黨大會公開聲稱金日成十點統一方案是解決韓半島統一問題的最佳方案，聲言中共將一如往昔，堅決支持北韓和平統一的鬥爭。中共一貫支持北韓的統一方針，以及在韓半島上北韓為唯一的合法政府的立場，至於八十年代初仍然沒有改變。一九八三年九月以來，北韓曾透過中共就美國和南北韓舉行韓半島問題的「三方會談」建議，

---

<sup>95</sup> 黃華，八十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1980. 1. 25），國家安全局編，1980. 5。轉引自，張少文，八十年代中共的對韓政策，《共黨問題研究》第15卷第9期（1989年9月），頁47。

進行祕密接觸。<sup>96</sup>一九八四年一月，北韓再度呼籲進行美國及南北韓舉行「三方會談」，作為和平統一韓半島的前提。其實早就在一九七九年夏，南韓同美國共同向北韓建議舉行有北韓、南韓和美國參加的三方會議，以謀求韓半島的統一，但當時北韓方面發表聲明，此項建議是美國干涉韓半島內部事務，而悍然拒絕。那時候，中共《人民日報》立即就北韓的聲明，發表評論員文章，揚言堅決支持北韓的主張。該文章說：「朝鮮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國家統一的問題，這是朝鮮人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也不容許外來干涉；另一個是國際方面問題，即美國軍隊留駐南朝鮮的問題，這是造成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和阻撓朝鮮統一的根本因素。這個問題應該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通過協商談判加以解決，也就是美國軍隊應撤出南朝鮮，變停戰協定為和平協定。這兩個方面性質不同，不能混淆。因此，事情很清楚，如果所謂的三方當局會議是談朝鮮統一問題，美國就沒有必要參加，美國在這裡插手，是對朝鮮內政的干涉；如果是談美國撤軍和把停戰變成和平協定的問題，由於南朝鮮本來不是停戰協定簽字的一方，它就沒有資格參加。<sup>97</sup>所以，美國和南朝鮮當權者建議舉行所謂朝鮮、美國和南朝鮮當權者都參加的高級代表會議，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合理的。」從此文章可料想，中共對於韓半島問題的立場，不僅是合乎邏輯，而且同北韓一道的立場。

曾經由南韓同美國提出三方會議時，悍然拒絕的北韓，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卻主動提出三方會談的建議，因而令人大惑不解。根據建議，北韓將同美國協商締結「和平協定」和美軍撤離南韓問題，及同南韓討論簽署「互不侵犯宣言」。北韓企圖透過趙紫陽訪問，向美國轉達此一建議。然而雷根總統在同年一月十日舉行歡迎趙紫陽的晚會上，就北韓所提

---

<sup>96</sup> 轉引自，宜中，從胡耀邦訪問平壤看中共與北韓關係，《中共研究》第18卷第7期（1984年7月），頁54。

<sup>97</sup> 一九五三年簽訂的「韓國停戰協定」，簽署者一方為聯合國軍，另一方為北韓、中共軍，所以北韓一直主張應該由這雙方重新協議，將「停戰協定」轉變成「和平協定」，而南韓則沒有資格參與「和平協定」的締結，因為它不是「停戰協定」的當事者。北韓認為，南北韓之間應首先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然後，北韓與美國之間再簽訂「和平協定」。參閱，韓國國土統一院，《北韓資料選集：和平體制問題》（漢城：國土統一院，1994），頁265。

的「三方會談」建議，要求中共也加入解決韓半島問題，成為「四方會談」。對此，趙紫陽表示，中共支持北韓的「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方案，南北雙方保存各自的制度，這是唯一能實現的。<sup>98</sup>另外時任中共外長吳學謙則表示，中共將不參加韓半島會談，但是將在儘可能範圍內協助實現三方會談，惟不扮演調整者的角色。<sup>99</sup>顯示中共一貫支持北韓的態度，則「朝鮮統一的問題應該在沒有外來的干預的情況下，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立場，且更有意義的，中共對韓半島統一的立場，認為「一國兩制」是較實際的方式。

一九八四年鄧小平也指出：「中國願意促進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用談判方式解決朝鮮問題，我們贊成<sup>100</sup>。」雖然中共支持北韓的立場和統一方針，但中共加以重新強調的是韓半島問題以「和平」和「談判」來解決。鄧小平確定中共八十年代的三件任務：是反霸、維護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一；加緊四個現代建設，其核心為現代化<sup>101</sup>。為了加緊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中共而言，其立足點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是個先決條件。但在中共的眼裡韓半島一直被看為最令人不安的衝突熱點<sup>102</sup>。如果能夠維持韓半島局勢的穩定，及緩和南北韓的緊張關係，不僅有助於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而且有利於達成中共的國家目標，則加緊經濟建設不可缺的一環。因此，中共一方面支持北韓的統一政策，以安撫北韓阻止挑釁行為；另一方面雖然主張駐韓美軍的撤走，但為了韓半島的穩定，支持南北韓與美國的「三方會談」。

一九八三年發生的兩件事件，使中共與北韓的關係造成衝擊。一件是五月發生的，則中國大陸一架民航機被劫持飛往南韓春川，中共派以「民航局長」沈圖為首的代表團前往

---

<sup>98</sup> 同註 96，頁 55。

<sup>99</sup> 同上註。

<sup>100</sup> 《人民日報》，1984. 10. 12，社論。

<sup>101</sup> 目前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 203~204。

<sup>102</sup> 劉妙龍、孔愛莉、張偉，亞太地區新形勢下的中國地緣政治戰略，《湖北大學學報》（武漢：1994. 4），頁 122。

交涉。在處理這事件的過程中，中共與南韓以「官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為簽署協定。中共隨即派遣外長吳學謙專程前往平壤，向北韓簡報與南韓接觸的情況，並表示中共堅決支持北韓。吳學謙對北韓外長許鈞說：「中國人民非常珍視同朝鮮人民的傳統友誼，十分感謝朝鮮人民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爭取國家統一事業給予的寶貴支持，並決心把我們兩國友好關係千秋萬代地發展下去。<sup>103</sup>」這次平壤方面雖不愉快，但仍然表示諒解中共所處理的過程和處境。另外一件是，十月全斗煥總統率團出訪亞太六國，至於緬甸仰光遭致北韓定時炸彈的攻擊，造成十七名高級官員殉難的事件。因而引起國際輿論嚴厲譴責，並導致緬甸宣佈與北韓斷交。此時北韓多次央求中共向緬甸政府關說，但中共未從中說項只以曖昧的態度來拒絕，引起北韓不滿，因而於同年六月召回駐中共大使金明洙，使雙方關係呈現不穩狀態。

一九八四年五月，金日成以一個半月的時間走訪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莫斯科舉行兩次首腦會議，同意擴大兩黨的各級接觸及特別著重加強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並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返回北韓就宣佈恢復與北越大使級關係，均不考慮中共的立場。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金日成正在巡訪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又是韓戰發生三十四周年，時任中共對外聯絡部顧問張香山表示，北韓若發動南侵戰爭，中共將不予支持，但是若南韓侵北，中共則不能坐視。這可以說是，中共對北韓的政策，由「一貫支持」到「有原則支持」的重大轉變。

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與北韓的關係，中共在原則上表示支持北韓的路線，且鼓勵北韓對美、日及南韓採取更具彈性和開放的策略<sup>104</sup>。然而中共也在現實的考慮下，同南韓急速發展各種非政治性領域的關係，引起北韓的不安與不滿。但中共一再宣稱「與北韓的友誼堅定不移」，雙方往來接觸依舊頻繁。儘管中共與北韓間有裂縫、分歧和摩擦，但卻一

---

<sup>103</sup> 《人民日報》，1983.5.22，第一版。

<sup>104</sup> 高崇雲，同前引註，頁105。

直認為韓半島的分裂局面和緊張對峙狀態，是美國進行侵略和干涉政策所造成的。駐韓美軍全部撤走，停止干涉韓半島內部事情，是解決韓半島問題的根本辦法。

### 三、由「關門不上鎖」轉為「開門引進」南韓

中共與南韓關係，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時任外長黃華就指出：「南朝鮮與中國關係的大門現在明擺著是關門不上鎖，隨時都可以開，但現在不能開，甚至貿易往來都不允許。我們知道有些外商正在替南朝鮮向中國外貿部拉關係，據說有幾項關於出售燃料、化工與土產品、藥材的生意已經做成，但數量很少。最好別讓朝鮮知道，能避免最好避免，包括美國政府、日本政府也很理解到中國對朝鮮問題的立場，我們這樣做就是關門不上鎖政策<sup>105</sup>。」從黃華的這段話中，可了解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共對南韓政策的基本立場，雖然是關門但沒有上鎖，來者不拒，非官方的民間交流視而不見，儘量避免北韓方面的抗議。

中共與南韓關係的進展，在確定的必然性上衍生出不確定的偶然性變化，卻又統合在辯證關係中。首先何故為必然性：第一、是個原則上的共識。八十年代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主張「信守並努力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恢復和發展正常關係，和睦相處，友好合作，而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來決定親疏、好惡<sup>106</sup>。」並且南韓早就一九七三年六月朴正熙總統發表「和平統一外交政策聲明」，在互惠平等之原則之下，對包含蘇聯及中共在內的所有國家開放門戶<sup>107</sup>。雙方既然表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異同不影響建立外交關係，因而起碼原則上，中共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門是早就打開著<sup>108</sup>。第二、是個

---

<sup>105</sup> 同註 95，頁 50。

<sup>106</sup> 同註 92。

<sup>107</sup> 《朝鮮日報》，1973. 6. 24，第一版。

<sup>108</sup> 在此涉及的問題是中共會不會承認南韓為一個國家的問題。若承認了，變成「一韓兩國」。這是違背中共一貫主張「一個朝鮮」的原則。中共如何解決看似在原則上矛盾的問題。在本章第六節加以說明。

經濟上的需要。經濟建設既然成為中共的「一個中心」，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之一，為經濟利益對南韓打開門戶而引進南韓的投資和技術，是個自然之理。南韓經濟也面對著出口市場多邊化的需求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向外發展的問題，必須要開發新的市場來應付。就南韓而言，中國大陸是不應讓競爭對手先占有的重要市場。並且如果南韓企業進入了大陸市場投資，必須要保障安全的措施，其最好的方法，則雙方建立正式關係。第三、是安全戰略的變化。中共已在中蘇糾紛中體會到，對如同鐘擺在中蘇間搖擺不定的北韓，無可奈何。中共同美國已成為朋友，又不能看待朋友的朋友南韓為敵人。自八十年代中期後，中蘇關係逐漸改善，北韓在中共與蘇聯的矛盾和糾紛中占有的地緣政治戰略性地位更明顯降落。就中共的軍事安全戰略而言，北韓已失去以往的地位，反而經濟上之各方面利益與支援造成中共的負擔。因此，到了八十年代末葉，北韓逐漸無法成為牽制中共與南韓發展關係的主要阻力，所餘者乃是中共對於北韓道義上的責任問題。南韓認為，能阻止北韓的軍事行動，並且施加影響北韓對南韓政策的，只有中共與蘇聯。因此南韓積極地展開「北方政策」，其終站為北京。如此一來，中共與南韓建交的必然性日益突顯，何時建立外交關係，只是個遲早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偶然性的問題：第一、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卓長仁等六名大陸人士劫機到南韓，中共立即派民航局長沈圖抵漢城進行交涉歸還人機事宜。由此，為解決問題中共與南韓官員首度碰面，協商的結果，雙方簽訂「協議書」。在此中共與南韓在外交文件上首次使用對方的國號，並且雙方官員在處理該事件當中在香港接觸，留下兩國官員接觸的管道<sup>109</sup>。這一偶然發生的事件，成為中共與南韓關係改善的重要轉捩點，之前，大陸媒體稱南韓為「南朝鮮偽政權」或「美帝走狗」，事件發生後，中共對南韓的政策遂由拒絕往來改

---

<sup>109</sup> 「卓長仁劫機到南韓的事件，國務院電香港新華分社直接聯繫南韓駐港總領事館，了解南韓政府的態度。南韓政府通過總領事，很快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商談妥善解決。國務院即派外交部和中國民航總局的有關人員到香港與南韓代表會談，達成協議後，才正式派代表公開去漢城。」參閱，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台北：聯經，1993），頁351~352。

為願意進行非官方的接觸，亦即在不傷及與平壤的正式關係下調整其過去一面倒向北韓的策略。第二、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韓海域發生中共魚雷艇事件，南韓政府表示，此一事件經調查並無政治動機，則艇上個人打鬥開槍造成六死兩傷的事件，該艇船員間發生槍擊案以後，因燃料用盡在海上漂流進入南韓海域，故純為一海難救助事件。對於中共三艘軍艦進入南韓海域搜索該艇一事，南韓政府向中共提出抗議並要求道歉。中共承認中共軍艦侵入南韓海域並向南韓正式道歉後，於二十八日南韓政府將中共的魚雷艇及全部人員交還中共<sup>110</sup>。此際，南韓與中共再度透過南韓駐香港總領事館與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管道接觸進行談判。該事件以後，南韓並派遣大使級總領事駐香港推動與中共的交流。

因此，可謂是八十年代中期偶然發生兩事件，成為往後中共與南韓關係發展的決定性的轉機。由漢城舉辦的一九八六年亞運及一九八八年奧運，中共派遣龐大代表團至漢城參加，當時所採取的對策就是如同周恩來曾經說過的「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來而不往非禮也<sup>111</sup>」，以表示對南韓所做的正面回應。

進入八十年代，中共與南韓關係正常化的主導權仍然是握在中共的手中，中共掌控著全盤時空變化的格局。漢城方面則不斷敲門，希望北京開大門。自一九八四年以來，全斗煥總統由各種渠道無數次地表示有關南韓與中共關係的言論和措施，可歸納為：對中共開放；希望中共對韓半島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擴大與中共交流；表示同北京的關係在非政治領域上正在穩定進行。並且一九八六年全斗煥政府甚至希望在一九八六到一九九一年間完成建交計畫，並分三階段完成：第一階段是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加強雙方文化關係，特別是體育關係；第二階段是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增強雙方經濟關係；第三階段是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利用在北京舉行的亞運加強交流，進而完成建交工作。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盧泰愚當選南韓總統後即公開表示，他接掌政

---

<sup>110</sup> 《東亞日報》，1985.3.27，第一版。

<sup>111</sup> 《周恩來外交文選》，頁51。

權後將優先考慮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一九八八年六月，當時南韓平民黨總裁金大中也公開表示：「中共對韓半島統一的影響力極大，韓國應修改對台灣關係，便與中共加強接觸<sup>112</sup>。」相對地，中共一直不表達同南韓關係發展的時間表，但其實際行為則顯露出了明顯的變化。

一九八八年二月，盧泰愚就職後，大力推展其「北方政策」，即派南韓前商工部長琴振鎬赴中國大陸與中共有關方面洽談雙方貿易問題。同一年度，中共與南韓之間的直接及透過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進行間接貿易額已達三十億美元，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sup>113</sup>。並且鼓勵南韓的大財團到大陸投資，相繼與中共建立起極為暢通的商業管道。同年十一月，中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外國投資局」的重要人士透露，中共與南韓間已有直接貿易往來，他表示中共歡迎南韓商人到大陸投資<sup>114</sup>。一九八八年七月，南韓與中共民間簽訂「觀光契約」，中共表示歡迎南韓觀光客，十月南韓政府宣佈廢除韓人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的限制規定。一九八九年三月，南韓交通部表示，大韓航空公司正與中共達成漢城至上海間不定期班機飛航協議。<sup>115</sup>十二月中共正式批准一條往來天津市與南韓仁川市的汽車渡輪定期直航航線。

至到此時，中共未曾表示放棄「一個朝鮮」政策，而且又沒有在口頭上或外交宣言上直接表達同南韓關係改善的意願，但在實際上已經對南韓打開著大門，引進南韓的各界人士和企業的投資。中共的這種行為常常讓人感覺中共是說話是一套、行動又是另外一套的困惑。但從辯證的角度而言中共的行為是沒有矛盾的。因為辯證法看待一切事物是變化運動的過程，雖然看起來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表揚的「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相同或異同來決定親疏和好惡」與「一個朝鮮」政策出現邏輯上的矛盾，但實踐就是「理論」和「實際」之間矛盾的解決過程。因此，在八十年代末

---

<sup>112</sup> 《東亞日報》，1988. 6. 30，第三版。

<sup>113</sup> Jo Byung-se，《由最新資料看中國經濟和韓國經濟》（漢城：大雄出版社，1994），頁 70。

<sup>114</sup> 《中國時報》，1988. 11. 5，第九版。

<sup>115</sup> 《聯合報》，1989. 3. 24。

期的對韓半島政策，最明顯的特色可用「原則的堅持」和「策略的靈活」的辯證性來形容。最令人注目的是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日，南韓與中共在北京簽署互設「貿易辦事處」的協定。雙方在對方的首都互設貿易辦事處，由過去不明確的關係，轉向實際的關係發展，打下中共與南韓正式建交的基礎。同年十二月，南韓首任駐北京貿易辦事處代表盧載源<sup>116</sup>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貿易辦事處的主要功能，在於經濟的加強於合作。但南韓政府派二十餘人職員，其中十人且具外交官的身份，可窺見其機構的功能。有關何時與中共建交？他指出南韓外長崔浩中曾表示，在一九九一年底以前，這是我們的外交政策，會朝此方向努力，但要看國際情勢的發展而定，特別是南北韓關係的改善<sup>117</sup>。因此，從中共對辯證法的認知與應用而言，中共與南韓的關係已產生質與量的變化、隨時可突變，可謂是進入了細水長流、水到渠成的階段。

## 第六節 小結

基於中共外交政策決策的制訂，首先必須釐清對時代的認知，掌握國際形勢的常與變，作為認識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傾向，藉以作為控制國際關係變遷的機制，以操作各種國際關係類型與層次的變項，形成一種隨時因應外在世界的變遷而又以辯證為主體的思維方式。

在此種辯證思維的領域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末，中共主要將世界分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中共也自然地與蘇聯結成同盟，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在此階段中，中共與北韓建立極為密切的交流關係，也壓縮了美國的戰略空間，使得中共對本身的存在有了更為肯定的認知。

雖然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就提出過「中間地帶論」，但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再度使用了「中間地帶」的說法，這次則

---

<sup>116</sup> 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共同南韓建交，盧載源就成為初任南韓駐中共大使。

<sup>117</sup> 《中央日報》(台灣)，1990. 12. 5，轉引自，姚競之，以冷靜務實因應中共南韓建交變局，《共黨問題研究》第18卷、第10期(1992. 10. 15)，頁2。

意味著對世界格局的重新定位，主要來自對國際修正主義的反動迫使中共階段性的反制蘇聯的修正路線，在反美又反蘇的狀態中，中共不顧本身的困境，仍給予北韓支援，並藉以握緊共產理論的信條。

到了文革時代，中共與北韓的外交關係則日形疏遠，一九六五至六九年，兩國在邊界發生局部性衝突，外交關係降落谷底，矛盾日益明顯與緊張，這些現象都是辯證思維在階段性應用時，基於「中間地帶論」的世界觀，而進行聯合與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應與情境。

一九七〇年代，中共成為聯合國的安理會的五個常務國家之一。逐漸的改善美國關係，於是支持北韓的統一方針，拉攏北韓不讓接近蘇聯，於是在這個階段中，主要是應用辯證技巧在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獲得平衡與利益。

一九七八年則從內部認知的釐清為出發，將「階級鬥爭」的綱領修改為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路線，對世界格局則為「東西南北論」，除了強調國家安全之外，更在意的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於是藉由反霸以作為凝固內部的外界假想敵，同時以堅持第三世界，作為力量擴張的基本成員及架構。本時期中共對北韓的政策，由「一貫支持」到「有原則支持」的穩定為主軸之策略的靈活。

這一路線的延續發展，主要是基於中共在一方面確立經濟為主軸的認知下，同時也兼顧國家安全的企圖，因此中共領導階層對各個時代的認知背景，決定著政策的取向，主要形式就是在不同階段中，區分出不同範疇的兩極框架與核心主軸，再衍生出不同的矛盾類型與鬥爭型式，而且，這種核心主軸是由內部黨政軍認知的一致化，透過政府的運作機制<sup>118</sup>而顯現為外交決策的同步發展，並做為路線鬥爭的依據。

中共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制訂，基本上也是在辯證思維下的產物，隨著對世界事務的不同認知，而律定出主要的運作核心，隨著此一核心的確立，不斷地挑起兩極間的矛盾鬥爭與聯合統一，使中共自身成為操控者與受益者，在這些辯證

---

<sup>118</sup> 如民主集中制或黨政軍的協同方式，並透過黨機器的運作而確保其貫徹始終。

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當中共將辯證格局，擴展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極時，而能夠因應外在的主要權力者，或是居其中而操控兩端時，對其自身的利益往往超過將自我定位於其中單一極端，即使在理論上掌握正統地位，亦難以獲利。因此辯證法的施行，不僅要在思想上掌握機制，此一機制必須有轉化為權勢的效用，或能夠依附既有權勢結構的作用，使其效能得以具體化，才能夠真正發揮辯證的力量。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變遷，就是極為明顯的例證。

## 第五章 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現況與展望

### 第一節 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基調

#### 一、中共的多極化世界論與大國外交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面臨西方國家聯合施壓和制裁的威脅，接著東歐的劇變、蘇聯的解體導致冷戰突然以美國「不戰而勝」，中共領導階層對於這些國內外客觀環境變化的認知，並無太大的分歧，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結果；蘇聯的崩潰可能使美國在戰略上不再需要中共，而美國可以集中力量來對付一個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sup>1</sup>。中共領導人對於美國對中共政策深具戒心並懷有深重的敵對意識，此際，鄧小平提出了對於目前國際情勢的看法：「對國際形勢還要繼續觀察，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總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認為形勢惡化到多麼嚴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實際上情況並不盡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sup>2</sup>」時任中共外長錢其琛則認為「緩和不是沒有鬥爭，也不等於穩定。在緩和的總趨勢下，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變得更加複雜、激烈。．．．以對話替代對抗，只是鬥爭方式的轉變，而絕不是鬥爭本質的轉移。<sup>3</sup>」從中共領導人的這些認知可知，其主要的認識論仍然是基於辯證思維，因為辯證法的基本認識是從變化運動中觀察事物的現象與本質，以及將事物之變化當作過程來看待，靜止只是變化運動的一個特殊形態。辯證法所強調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不斷發生與不斷解決的過程中發展。

---

<sup>1</sup> 曲星，後冷戰時期中國外交的戰略選擇，鄭宇碩，《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1999），頁8。

<sup>2</sup> 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54。

<sup>3</sup> 馭志，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中共外交——中共外交政策及其與美、俄關係，《中共研究》第33卷第5期，1999.5，頁30。

九十年代初所謂後冷戰時期，中共著重在大國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性質的轉變，對於世界格局作重新評估，提出了「多極化」概念。鄧小平對於動盪不安的世界格局提出初步的看法和界定中共所處的地位：「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不管它怎麼削弱，甚至有幾個加盟共和國退出去。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也算一極。<sup>4</sup>」隨後，江澤民在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過程。<sup>5</sup>」中共認為，冷戰結束、蘇聯解體，進入所謂後冷戰時期，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從現在起到二十世紀末乃至二十一世紀初，構成世界戰略格局主要力量，是除了超強美國以外西歐、日本、俄羅斯和中共自己<sup>6</sup>。換言之，雖然新的世界格局未明朗，但總是往「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在這種多極化取向的世界格局中，中共自我期許占有「一極」之地位。

但中共領導人雖認識到世界正朝多極化發展，惟本身實力仍極有限，西方競爭對手在綜合國力上領先，為了能早日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一極」，則應積極尋求發展與早日實現現代化。因此，鄧小平提出具有辯證性的對外總體戰略，「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沈著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二十四字方針，和對美的「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十六字方針來應付局面<sup>7</sup>。同時江澤民也提出外交工作「兩點論」的方針：「既要講經濟，又要講政治；既要講友好，又要講鬥爭；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

---

<sup>4</sup> 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353。

<sup>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4。

<sup>6</sup> 閻鑄，新的世界戰略格局正在形成，《學術交流季刊》1992年3月號，頁2。

<sup>7</sup> 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6~7。

<sup>8</sup>」這時期，中共領導人對於國際情勢變化的認知和其「有所作為」的立足點的確是辯證法。

由此可知，天安門事件的產生和隨後蘇聯的解體，給中共領導人在認知上造成了極其巨大的衝擊。這種衝擊同時也引起了中共內部的思考，想要成為大國必須務實的把自己的經濟搞上去，才能避免像蘇聯一樣的後果<sup>9</sup>。因此，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共外交政策再度有了進一步的調整和加強，其外交政策的取向明確地顯示出：以增加經濟的比重來提升綜合國力，鞏固與發展睦鄰外交來突破西方國家的壓力，以及採取權力均衡的現實主義路線<sup>10</sup>。其辯證的思維已自安全矛盾的突破加入經濟矛盾的突破與綜合國力的提升，並以之制定其外交政策。

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中共與一些重要大國的關係有了重大調整，形成中共外交進入另一階段的明顯的標誌<sup>11</sup>。一九九七年九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世界上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和組合。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歷著重大而又深刻的調整——多極化趨勢的發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sup>12</sup>。」如此看來，中共所倡議的「多極化」世界論，不僅是中共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判斷依據，也是主觀上的期待與努力之方向。中共強烈的以主觀願望來自我定位，並調整在多極化世界中其應所處的地位和該扮演的角色。中共學者認為，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具有三項基本特徵：美國稱霸與大國反霸是世界主要力量間的普遍矛盾；稱霸與反霸是冷戰後世界主要力量間的戰略矛盾；美國稱霸與大國反霸的矛盾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外交政策已經構成重要影響<sup>13</sup>。因此，大國關係的調整成為中共外交政

---

<sup>8</sup> 同註 3。

<sup>9</sup> 趙雲山，中共對戰略思想之演變，《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6 期（1995. 6），頁 45。

<sup>10</sup> 劉德海，九十年代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與兩韓研究，《韓國學報》第 13 期（1995. 6），頁 185~186。

<sup>11</sup> 謝益顯，中國當前外交的特點和方略及其重要性與長期性，鄭宇碩等著，《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1999），頁 37。

<sup>12</sup>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文匯報》（香港），1997. 9. 13，第 A10 版。

<sup>13</sup> 閻學通，歷史的繼續——冷戰後的主要國際政治矛盾，《大公報》，2000. 7. 19。

策的重要方向，而大國外交格局隱然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共全球戰略的主要構想<sup>14</sup>。

「夥伴外交」戰略就是中共推動大國外交，並促成世界多極化的實際策略。中共認為傳統之權力平衡雖然可改變國家間權力的對比，但卻無法改變有關國家外交政策意圖或利益衝突之現實，然而「夥伴關係」將可使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多於衝突利益。基此假定，中共追求各種夥伴關係之建立，與其他國家發展普遍的合作關係，以營造有利其發展之環境，進而達成建構多極化世界格局之戰略目標<sup>15</sup>。按中共說法，夥伴外交是以發展和其他國家普遍的合作關係，來推進本國的對外政策目標。由於夥伴外交尋求發掘中共和其他國家間潛在的共同利益，調合利益矛盾，從而將中共和其他國家的衝突關係轉化為友好的夥伴關係，因而它是一種積極的外交手段。夥伴外交不否認夥伴國之間會經常出現矛盾，不過，這些矛盾將不涉及兩國的核心利益，不至於影響到兩國在主要問題上的合作關係<sup>16</sup>。

中共倡議建構的各種不同名義的「夥伴關係」，其戰略意義可歸納為幾點<sup>17</sup>：一、「多極化」世界論，成為中共對客觀國際形勢的判斷依據，也是主觀上的期待與努力之方向，而戰略夥伴也就是促成多極化格局形成的主要方式。對中共而言，建立一種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的夥伴關係，將可以消除對中共安全之潛在威脅；二、中共有感於現階段自身經濟實力尚難與先進國家匹敵，故謀藉由多極化世界的推動，積極與世界各國接觸，引進外資和新技术，以促進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三、中共評估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有利於實現主要大國間的力量均衡，進而以多極制衡力量，牽制美國「單極」稱霸；四、中共謀藉由多極化格局，發揮其「綜合國力」、核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之影響力，建立其「一極」之大國地位。

---

<sup>14</sup>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1999年夏季），頁23。

<sup>15</sup> 秦邦九，「中共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與『夥伴外交』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9期（1999.8），頁42。

<sup>16</sup>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北京：中共編譯出版社，1998），頁338。

<sup>17</sup> 同上註，頁44。

中共展開「夥伴外交」，在實際行動上與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四月，於葉爾辛訪問北京之際與江澤民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將發展「平等互信、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且與美國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澤民訪美時，雙方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此後，同各國建立不同層次的夥伴關係。至於南韓，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南韓總統金大中訪問北京，與江澤民共同宣佈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其夥伴關係的類型屬於針對周邊鄰近國建立的層次<sup>18</sup>。

中共的夥伴外交策略，同時反映著，在中共領導人的對外認知中，已出現想成為世界大國的對外政策取向。江澤民一九九四年九月在俄羅斯講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中共外交政策的這種取向：「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和堅定力量。中國的發展意味著和平力量的增強。中國有過長期被列強欺侮、瓜分、奴役和掠奪的悲慘歷史，十分珍視自己和尊重別人的獨立主權。<sup>19</sup>」至今中共雖然站住於多極中一極，但中共認為自己是曾經受過列強的侵害，由於，在國際舞台上更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可靠力量。這種心態普遍存在中共決策者的心中，影響其對外的認知架構<sup>20</sup>。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明確表明，「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國際形勢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世界還很不太平．．．充滿希望，也面臨嚴峻挑戰。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發展和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sup>21</sup>」

同時，中共也體認到，唯有參與國際準則的制訂，才能爭取對自己有利的遊戲規則。中共學者認為，冷戰後國際政治矛盾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稱霸的制度性和國際規範

---

<sup>18</sup> 同註 15，頁 42~43。

<sup>19</sup> 江澤民主席在俄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1994.9.3），《僑報》，1994.9.6，第 11 版。

<sup>20</sup> 王友辰，中共對九十年代國際形勢評估之探討，《中共研究》第 33 卷 4 期（1999.4），頁 74~75

<sup>21</sup> 中共外交部，中國外交政策，<http://www.fmprc.gov.cn/wjzc/wjzc.htm>

之爭兩個方面，「正是由於美國要建立的是制度性霸權體系，因此冷戰後稱霸與反霸的核心內容是國際規範之爭，即建立什麼樣的國際規範。制度性霸權的基礎是由實力加上國際規範，因此美國在冷戰後不斷推動新國際規範的建立。然而，由於美國所要建立的國際規範是從有利於美國霸權角度考慮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威脅其他大國的戰略利益，由此大國在建立什麼樣的國際規範上進行著激烈的鬥爭。<sup>22</sup>」也因此，中共逐漸加大利用聯合國及區域論壇的組織，增加發言權，同時同意與美國在武器擴散與核武非擴散等議題上合作，與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對話，化解西方國家在人權上不斷地施壓。中共與各國間的夥伴關係有助於關係的穩定，參與國際事務愈多，也就更融入國際社會，結果是其行為也將更加受到制約，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須符合一個大國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共仍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一方面表現出經濟強大安定的形象，另一方面亞洲各國人民的心目中，留下儼然是亞洲中流砥柱的深刻印象。這就是中共體認到若要成為世界強國，不僅要成為軍事強國，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中共走向大國的步伐不僅如此而已，其體認到在當今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競爭主戰場在形式上已轉移到經濟領域，但實際上經濟的競爭在本質上乃是科技的競爭，綜合國力的較量其本質將歸諸科技實力的較量。因此，江澤民指出：「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要把加速科技進步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實現我國技術發展的跨越。這些都是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思想和重大決策。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我們要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複雜的國際鬥爭中取得主動，要維護我們的國家主權和安全，必須大力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大力增強我國的科技實力，從而不斷增加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sup>23</sup>」

基於以上的認識基礎，雖然中共不再強調共產主義的意

---

<sup>22</sup> 同註 13。

<sup>23</sup> 全國技術創新大會在京開幕，《人民日報》，1999.8.24，第1版。

識形態，但凸顯出其回歸中華文化中的辯證思維。因為，中國傳統辯證思維認為一切事物是不斷變化運動。中共欲突破層層包圍，唯有利用各種矛盾，分別加以分化或整合，如此一來，東亞的韓半島成為必爭之所。從前列強以韓半島為進出中國的門戶，如今也成為中共突圍的缺口之所在，與半島上的國家建立良好關係不僅可解除壓力與阻力，甚至可將之轉化成助力，因此，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在中共的所有外交政策中理所當然地佔重要之席位。

## 二、韓半島的地緣特徵與在中共安全中的意義

對中國大陸來說，韓半島不能僅當成一個外國，甚至不能只看成像印度那樣的一個鄰國而已，歷史上中國一直把韓半島視為一個自己邊陲的緩衝國和納貢國<sup>24</sup>。至今，韓半島就中國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而言，不管時代的特徵如何變化，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簡而言之，韓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與中國大陸的安全密不可分<sup>25</sup>。中國近代史似乎已經告訴中國人，韓半島對於中國安全戰略的重要性。在甲午戰爭，日軍先攻擊仁川，再跨過鴨綠江並奪取中國的旅順港；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間的日俄戰爭中，日軍也曾攻擊旅順，在仁川登陸，向鴨綠江推進，並在瀋陽擊敗俄軍；一九三一年日軍侵入東北時也是由韓半島出發的。一九五〇年發生韓戰時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也登陸仁川，擊敗北韓軍隊並將其推到鴨綠江邊，威脅中共的安全。韓半島似乎成了進犯中國東北的天然走道。

韓半島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背靠大陸，三面環水。其陸域西與中國、北和俄羅斯為鄰，隔海南臨日本、東對美國，它介於中共、俄羅斯、日本和美國之間，地處東北亞核心。由於韓半島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周圍的美日俄中四強各自在韓半島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利害關係和策略。而韓半島局勢的任何變化都會激發四強在韓半島的

---

<sup>24</sup>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台北：五南，1995），頁 273。

<sup>25</sup> 李明，《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亞安全》（台北：五南，1998），頁 193。

利益結構和力量結構的演變，從而使半島安全形勢乃至東北亞安全環境產生變化，顯然，中共是受這種變化影響最顯著的國家<sup>26</sup>。因此，中共必然將韓半島形勢的發展，視為與其國家安全深切相關的地區，也必然在國防建設和外交政策上，將韓半島當作重要且優先的考量<sup>27</sup>。

中共甫建國之際，就爆發「韓戰」，北京派遣「人民志願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其結果是中共與美國形成了二十多年的死敵。這些狀況使中共決定了東北亞政策<sup>28</sup>。韓戰的結束，東北亞大國關係才真正在實際中確定下來，在冷戰之下兩大陣營圍繞韓半島，形成南韓、美國、日本的「南方三角」關係與北韓、蘇聯、中共的「北方三角」關係的對立格局。中共、前蘇聯、日本及美國成為韓半島上的政治主角，隨著這些大國而來的是利益的衝突、互相競爭的聯合和聯盟，以及深重的世仇，其間關係可謂變動不居，難以預測；然而韓半島上的南、北韓雙方在這場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這種關係，雖然其間相互關係不斷變化和重新整合，但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仍然維持了基本的格局。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東西冷戰格局結束，在一九九〇年九月南韓與蘇聯建交，至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同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東北亞的「北方三角」與「南方三角」的對立格局才算結束。但冷戰時期的格局，朋友與敵人是固定，盟國的對外政策有著共同的目標，與現在東北亞地區的格局相比，縱然危險性更大，但形勢可謂是一目瞭然。在多元化的條件下，安全問題變得更加尖銳。由於意圖的不明確，常常發生變化，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作出的反應可能對別的雙邊關係產生無法預料與破壞穩定的後果。但韓半島仍然是充滿衝突的可能性和非預料性，可能造成中共安全的威脅。因此，中共對韓半島的一舉一動都與其安全利益和戰略佈局有著非常密切關係。

總之，中國大陸和韓半島的地理、空間所造成的不可分

---

<sup>26</sup> 陸俊元，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特徵，《外國問題研究》1996.2期（長春），頁6。

<sup>27</sup> 同註21，頁194；玄偉東，韓國北方外交政及其對東北亞政治形勢的影響，《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1994.4，頁39~44。

<sup>28</sup> 王飛凌，冷戰以後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簡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5，春季卷），總第10期，頁11。

割之因素，以及長期以來歷史上的互動關係，是中共決定對韓半島政策的最基本的客觀因素。

### 三、中韓建交後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取向

#### (一) 政策形成的背景動機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中共對外政策基於「和平與發展」及「多極化」的世界觀，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闡明「對一切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將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並且將其政策的基本目標設定為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強調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sup>29</sup>」因此，中共對韓半島的基本立場，除了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情結之外，也可說是基於「獨立自主」、「睦鄰友好」、「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經貿合作」等原則的導引之下所產生的。當然在這中間，中共領導人主觀意識的轉變和韓半島周邊客觀情勢的發展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連<sup>30</sup>。因為，中共的韓半島政策是其總體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可說是中共對東北亞政策的出發點，又是中共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變化有可能造成中共與其他三強之間關係的變化；同理，中共與該三強的關係變化也容易影響到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變化。

至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同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承認在韓半島上「兩個韓國」。中共對韓半島的外交政策，就此突破意識形態的框架，轉而採取比較實用主義的路線。在此，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作出重大的調整，除了受到後冷戰時期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外，主要還是基於經濟、政治，軍事與戰略等諸多實際因素的考慮<sup>31</sup>。在此，有

---

<sup>29</sup> 中共外交部，中國外交政策，<http://www.fmprc.gov.cn/wjzc/wjzc.htm>。

<sup>30</sup> 劉德海，九〇年代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與兩韓研究，《韓國學報》第13期(1995.6)，頁187。

<sup>31</sup> 朱松柏，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的現況與展望，《中國大陸研究》第40第3期(1997.3)，頁31。

一位南韓中共問題專家認為，中共基於「三非三不願」的方針來施行對韓半島的政策<sup>32</sup>。「三非」指稱的是韓半島的非核化、南北間的非戰爭、北韓體制的非崩潰，就是維持韓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所謂「三不願」，是不願美國與韓半島的密切關係、不願中共與韓半島的對立關係、不願由民族主義旗幟下的南北韓統一，仍是中共對於韓半島影響力的增加。但中共基於「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仍將以發展經濟為其國家政策的優先目標，而且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是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同時也是維持其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手段，發展經濟在中共國家政策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因此，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決定因素中，追求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是無法或缺的重要背景動機。

## （二）運用辯證法維持韓半島的和平與穩定

中共雖然與南韓建交但同北韓仍維持以往的關係，因此，形成了「一中兩韓」的「三角」架構。從此以後，中共對韓半島政策是站立於南北韓間對立矛盾之中，發揮其特有的辯證思維和行動，以維持兩邊均衡，追求滿足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各種要求。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江澤民訪問南韓時，在南韓國會發表演說中指出：「中國一向尊重別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從不謀求取任何私利。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是中國處理半島問題的基本準則。緩和朝鮮緊張局勢，妥善解決半島問題，符合半島雙方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為近鄰，中國真誠希望半島南北雙方通過接觸和對話，逐步增加信任，改善關係，最終實現民族和解和國家的自主和平統一。<sup>33</sup>」因此，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基本取向，可謂是維持韓半島的長期和平與穩定局面，但這不等於是維持現狀的消極政策，卻是有所作為的積極政策。

韓半島局勢的緩和與穩定，對於中共而言，乃是實現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國家目標的先決條件之一。因為實現經濟

---

<sup>32</sup> 金成柱，周邊國家對韓半島的政策和南北韓關係，《外交》（南韓），第38號（1996.6），頁30~31。

<sup>33</sup> 《文匯報》，1995.11.16，第A5版。

發展，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共支持南北韓使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彼此紛爭，韓半島情勢的緩和是符合中共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的利益<sup>34</sup>。因此中共不能無視於北韓的製造麻煩和在半島上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北韓研製核武器的努力會使得南韓擔心造成南北韓軍備的不平衡，以及是破壞東北亞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因而漢城一直期望北京勸告北韓停止研製核武器。中共在對南北韓政策上的辯證行為也反映在北韓核武發展問題上。中共在對韓半島無核化的原則上，站在南韓的立場，同美國、俄羅斯、日本達成韓半島無核化的一致意見；另外，就國際社會對北韓研核的阻止手段問題上，中共仍然站在庇護北韓的立場，中共一向反對國際社會或聯合國對北韓所作的任何經濟制裁決議，甚至公開表明其決心，如果聯合國進行對北韓經濟制裁的決議，中共將行使其安理會否決權來反對其決議<sup>35</sup>。這些看起來前後矛盾的行為，常常令人感到困惑。但細看中共所闡揚的原則和實際行為之間，可知並不互相矛盾且是具有非常條理的一致性，可謂是原則的堅定，策略的靈活。

後來，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日本《朝日新聞》書面採訪錢其琛，提問中共對於北韓核問題上的立場，錢其琛指出：「中國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始終堅持兩個基本目標，即支援朝鮮半島實現無核化和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建立朝鮮半島無核區的事，本質上是半島南北雙方的事。雙方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達成了「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我們希望雙方能進一步作出努力，以利早日實現這一宣言規定的目標。在朝鮮半島建立無核區後，所有核武器國家應承擔相應的義務，包括無條件不對該無核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sup>36</sup>」從錢其琛的這段談話中可看出，中共是以兩手同時堅持「和平與穩定」和「尊重別國內政」的原則來推行韓半島的政策。

但中共在對於北韓的挑釁行為上，又時有不同的表現，

---

<sup>34</sup> 《人民日報》，1992. 8. 25，第1版。

<sup>35</sup> 參閱，金用浩，《現代北韓外交論》（漢城：Oreum，1996），頁327~328。

<sup>36</sup> 日本《朝日新聞》書面採訪錢其琛（1999. 12. 22），[http://www.fmprc.gov.cn/xwfb/xwfb\\_wjbhd\\_21.htm](http://www.fmprc.gov.cn/xwfb/xwfb_wjbhd_21.htm)。

或視而不見或表示不同意或反對的立場<sup>37</sup>。例如，一九九一年北韓突然放棄其原來的態度而申請加入聯合國之事。中共向平壤表明，對於南韓的申請加入聯合國一事，中共將不會答應北韓的要求而加以否決<sup>38</sup>；但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中共又不得不退出板門店停戰委員會；因為北韓一直主張南韓並非是一九五三年「韓國停戰協議」上之簽約國，所以在由「停戰協議」改成永久「和平條約」的協商中，南韓沒有參加的資格，但中共明明是簽約三方之一，卻應北韓之要求也退出停戰委員會，以便北韓與美國簽訂新和平條約。中共既然知道北韓的要求乃是無理，而且其對韓半島的影響力也可能因而減少，但還是宣佈退出，表現出其堅持「尊重別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立場；一九九六年五月美國總統柯林頓和金泳三共同倡議「四方會談」，中共表示歡迎，此刻中共的行為卻是恰與北韓的立場相反，因為北韓的立場是一向主張廢棄「韓國停戰協議」，而由永久性的「和平條約」來代替；但南韓的主張卻是在廢棄「韓國停戰協議」之前應先建立「和平機制」以鞏固韓半島的永久和平。中共不僅歡迎舉行「四方會談」，而且補充說明南北韓之間和平機制建立之前，應要保留「韓國停戰協議」，顯而易見的是中共已表明支持南韓的政治立場；一九九六年九月北韓的潛艇事件，南韓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北韓威脅行動的牽制，在中共的支持下，安理會發表批評北韓的聲明。從這些例子來看，中共的一切行為與其外交原則之間不會出現矛盾，卻是有非常一致性。

### （三）經濟利益的追求

中共之前已優先考慮到從政治鬥爭轉向經濟現代化。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別，不在搞不搞計畫經濟，也不在搞不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而在於貧富差距大不大，在於能否集中力量在較短時間裡幹成大事，解決這兩

---

<sup>37</sup> 黃炳茂、Mel Gurtov，《中國安全論——人民解放軍的角色分析》（漢城：國際問題研究所，1999），頁115。

<sup>38</sup> 同註30，頁298。

個問題，必須靠共產黨的領導。<sup>39</sup>」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仍將以發展經濟為其國家政策的優先目標，而且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是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同時也是維持其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手段，發展經濟在中共國家政策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

中共的現代化需要廣泛的外部支持和在同工業化國家的交流之下方能實現，這些國家提供給中共先進的技術、資本、市場和管理技術。從經濟發展的考慮衍生出來的對外戰略思想便是以友好的態度向一切國家學習，並獲取自己發展的資金和技術。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譴責聲明，並採取經濟貿易制裁措施，造成中共與西方國家貿易大幅衰退。中共則期望南韓資金與技術的援助，南韓在科技方面的水準比起美，日等西方先進國家更符合中共的需要，中共與南韓建交將可加強雙方在經濟貿易與科技方面的合作關係。南韓顯然是這些資源的距離中最近的提供者，與漢城建交將可自南韓獲得大量的技術與資金援助。

李鵬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底訪問南韓，對南韓工商界闡述中共經濟政策，「雖然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也存在差異，但這並沒有也不應該成為兩國發展關係的包括經貿關係的障礙。<sup>40</sup>」李鵬在講話中還指出發展兩國經貿合作的「平等互利、優勢互補、真誠合作、共同發展」的四項原則，共同努力把兩國的經貿合作關係推向新的發展階段<sup>41</sup>。朱鎔基總理在二〇〇〇年十月訪問漢城，對於南韓企業界的講話也充分反映著中共對南韓政策中的經濟領域的重要性。朱鎔基認為由於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為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中韓兩國應努力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和途徑，開闢更多的合作渠道，並加強雙方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協調，促進優勢互補，實現共同繁榮<sup>42</sup>。由此可知，經濟發展是中共實現與南韓關係發展的主要動力。

---

<sup>39</sup> 孫宜良，鄧小平對中國前途的思考，《鏡報月刊》(1991.4)，頁30。

<sup>40</sup> 《人民日報》，1994.11.2，第6版。

<sup>41</sup> 同上註。

<sup>42</sup> 《東亞日報》，2000.10.19，第1版

## 第二節 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現況

### 一、 中共與南韓的建交及雙方關係的發展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南韓總統盧泰愚在電視上向南韓國民發表談話：「大韓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今天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結束長期的不正常關係。大韓民國政府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且尊重中國方面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國政府一致認為，兩國外交的關係建立對於韓半島的穩定和緊張關係的緩和，以及整個亞洲的和平與安定，將有重大幫助。由於我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結果而致對台灣關係斷絕，令人非常遺憾。政府將儘早與台灣方面就促進非官方關係一事展開談判。我們誠心希望北韓當局也能順應我們這個時代的此一歷史潮流，以與我們和平、和解與和諧共同同步上國家統一之路。<sup>43</sup>」同時，中共《人民日報》也對中共與南韓建交之事作評論：「中韓建交，不僅使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能向廣度和深度發展，而且對韓半島局勢的緩和與穩定，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sup>44</sup>」

中共與南韓建交的時期，一般預料多以為將在一九九二年底南韓舉行總統大選之前，以便執政黨利用此項建交成果，增強其在競選中的優勢<sup>45</sup>。在採取此項行動之前，它們可能藉九月曼谷亞太會議及聯大會議機會，對於建交的計畫作最後的磋商。卻想不到中共與南韓關係正常化竟然提前於八月二十四日即予實現。對於這項突如其來的變化，南韓外長李相玉於二十一日的記者會中提出公開說明，強調韓中之間能突破外交瓶頸而於八月間建交，主要是出於北京對於整個局勢的新思考：一、中共想急於擴大雙方之間的經貿交流；二、中共認為有必要節制日本的擴張軍事力量；三、牽制台灣在非洲的外交攻勢；四、南北韓同時進入聯合國，已

---

<sup>43</sup> 《東亞日報》，1992. 8. 25，第3版。

<sup>44</sup> 《人民日報》，1992. 8. 25，第1版。

<sup>45</sup> 《聯合報》，1992. 8. 26，社論。

解決了北韓的外交需要，中共不再有北韓問題的後顧之憂。換言之，這次南韓與中共所以提前建交，其主動乃來自於中共，但由於南韓一直希望雙方關係能儘速建交，所以中共一作新的表示，南韓也便抓住機會，遂於短期內獲致完全協議。

李相玉所提四項提前建交的理由，確有其現實上的相當根據。在《北京周報》一篇文章中把一九九一年發生的一些事件被描述為「亞洲國家之間關係重新組合」的一部分，並且被視為有助於南韓擺脫「冷戰的覆蓋」。這些事件是：南韓同蘇聯之間建立外交關係；南北韓總理的三次會談；中共和南韓決定在對方首都設立貿易辦事處<sup>46</sup>。不僅如此，這三個事件對於促進中共與南韓建交所造成的意義也不可忽視。一般認為中共與南韓關係正常化最大的障礙，是雙方如何處理與北韓、台灣的关系，並且中共將如何對待與北韓的外交關係等重大議題。因此最關鍵的不是南韓或北韓，也不是台灣，而是中共的態度。

過去在冷戰時期，中共對韓半島的基本立場簡單而明顯「一個朝鮮」政策，就是只承認北韓為韓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把南韓視一為傀儡政權而與之對峙。若他在外交政策上承認了南韓，即表示中共接受南北韓分裂國家的現實，屆時中共勢必找出合理的解釋。換言之，一但中共要與南韓建交，中共不得不承認在韓半島上「兩個韓國」存在的事實。在此關鍵問題上，不僅中共對韓半島政策出現前後矛盾，而且在實際層面也和「一個中國」的原則產生矛盾。就中共的立場而言，需要解決在與南韓建交之時會出現的矛盾，即需要自己行為的合理化的名分。對此，中共一直採取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方針而有所作為，等待時機成熟的到來。直至一九九一年九月，中共所等待蓄積名分的機會終於到來，就是蘇聯與南韓的建交，蘇聯不顧北韓的反應就與南韓建立關係正常化，承認「兩個韓國」。依循蘇聯的建交行徑，即使中共與南韓建交，也將不會喪失其對韓半島一貫政策的合理化解釋。

其次，一九九一年九月，有關南北韓分別加入聯合國的

---

<sup>46</sup> Hu Xueze and Bing Jinhui, 'World Situation Unstable Despite Détente', *Beijing Review*, 34, 2 (14-20 January 1991), pp. 27-31.

事件。北韓基於金日成所提出的「統一祖國五大綱領」，一貫表示南北韓「不應該分別加入聯合國，至少也應該在實現聯邦制以後作為單一的國家加入聯合國。<sup>47</sup>」北韓反對分別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擔心若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會使「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分裂永久化。相對於南韓，基於在一九七三年朴正熙總統的「六、二三和平宣言」的政策，不反對南北韓一起分別加入聯合國。中共強調北韓為在韓半島上唯一合法政府，因而一向支持北韓對於聯合國問題的立場。南韓擔心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最大的障礙，就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蘇聯和中國行使否決權。但南韓已與蘇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且在一九九一年四月戈巴契夫訪問南韓濟州島時已明確表示，蘇聯不行使否決權反對南韓單獨加入聯合國<sup>48</sup>。對此，北韓猛烈攻擊蘇聯，認為這是企圖「分裂韓半島的反動勢力，以三十億美金賣掉信義的背信者。<sup>49</sup>」於是，關鍵就在中共的態度。此際，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表明，中共反對南韓單獨加入的方式。但一九九一年五月李鵬訪問平壤回北京，在五月二十七日，北韓突然宣佈同意南北韓同時、分別地加入聯合國。像正如等待北韓消息似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於五月二十八日表示：「這一決定具有正面意義，將有助於促進北南朝鮮的對話和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sup>50</sup>」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中共的支持下，南北韓雙方同時進入聯合國，向國際社會宣佈韓半島上存在「兩個國家」。由此一來，中共不但解脫了「一個朝鮮」的束縛，而且避免了可能會造成的自我矛盾。但其間中共扮演怎麼樣的角色，不問可知。

中共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家目標，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共認為一個和平而穩定的韓半島不僅有助於東北亞地區局勢的安定，也關係到亞太地區的安全。朝鮮半島情勢的緩和是更符合中共的安全利益，並且也是中共與南韓建立正常關係的先決條件。因此，中共一向強調支

---

<sup>47</sup> 轉引自，中國邊疆民族出版社，《朝鮮知認手冊》，第 260，曹麗琴，北、南朝鮮加入聯合國與朝鮮半島統一問題，《韓國學報》第十三期（台北，1995.6），頁 157。

<sup>48</sup> 《東亞日報》，1991.4.21，第 1 版。

<sup>49</sup> 同註 30，頁 298。

<sup>50</sup> 《人民日報》，1991.5.29，第 1 版。

持南、北韓使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彼此紛爭。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在第六次南北總理會談中，南北韓總理相互交換關於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協議書和關於韓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的正式本文，並宣佈從即日起生效。中共對此特別強調「這意味著，北方和南方開始結束近半個世紀以來互不信任、互相對抗的歷史，創造和解合作的新未來是當代朝鮮民族史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是結束舊的歷史，邁向新的歷史的第一步。<sup>51</sup>」

如此一來，對於中共與南韓建立正式關係可能造成阻礙的兩大因素均予解決，建交的行程一路順暢。一方面，中共和南韓在對方的首都互設貿易辦事處，是個雙方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重要步驟。另一方面，一九九一年一月在聯合國大會期間，中共外長錢其琛與南韓外長李相玉首次會晤，被視為雙方可能建交的開始。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錢其琛赴漢城出席亞太經合會，既會見南韓總統，又與李相玉舉行兩次會談，決定提高雙方派代表的層級別。一九九二年四月，南韓外長李相玉赴北京參加「亞太經社理事會會議」，中韓外長進行第三次會議。在此中韓外長會談達成了三項共識：一、兩國建交將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二、兩國建交將不會影響到中共與北韓之間的關係；南韓將盡力協助中共加入「國際關稅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同時，李相玉要求錢其琛及中共高層人士，能夠對核武相互檢查的問題說服北韓，並希望在中共的努力下，化解這一障礙<sup>52</sup>。李相玉訪問北京與中共領導階層商談建交日期及細節的同時，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平壤，表面上是恭賀金日成八十大壽，裡子上是為了減輕北韓的疑慮，也是為了要順利進行與南韓的建交。在此，楊尚昆向金日成作保證，中共與南韓建交後，中共仍不與南韓軍事合作，並且將不會給北韓與中共的經貿交流帶來不利影響。隨即中共官方媒體已透露出微妙的變化，以「韓國」稱南韓，北韓則叫朝鮮<sup>53</sup>。從此以後，根據第三次中韓外長會談的決定內容，進行了中共與南韓建交的實務協商。中共方面由有在平壤工作

---

<sup>51</sup> 《人民日報》，1992. 2. 22，第4版。

<sup>52</sup> 《中國時報》，1992. 4. 14，第三版。

<sup>53</sup> 《聯合報》(台灣)，1992. 4. 17，第十版。

經驗的張瑞杰本部大使為負責，南韓由權丙鉉本部大使組成協商代表團，經由五月中旬、六月初、六月底總共三次的實務協商；到了六月初第二次協商時，雙方對於台灣問題、北韓問題及過去歷史恩怨問題交換意見，此刻已較順利地達成共識；在六月底第三次協商時，雙方協商團已經在整理「聯合公報」文字方面的修改，伺機發佈。終於八月二十四日雙方在北京簽訂聯合公報而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共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不僅使中共對韓半島的影響力由北延伸到南包括了整個韓半島，而且也使其成為韓半島周邊四強中公認對南北韓最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行為者<sup>54</sup>。

隨著正式外交關係的建立，一九九二年九月南韓總統盧泰愚率團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開始，除了盧泰愚、金泳三和金大中三位總統以外、總理、國會議長、外交部長和其他部長級官員也先後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而中共方面，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李鵬、喬石、朱鎔基、李瑞環、錢其琛、胡錦濤、遲浩田等人也先後訪問了漢城，如此頻繁的高層互訪，在中共近年來的對外關係中是相當少見的情形。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金大中總統訪問北京期間，兩國宣佈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

在中共與南韓經貿關係上，南韓已成為中共重要的貿易夥伴，目前中共是南韓第三大貿易夥伴（香港）貿易夥伴。至於一九九九年中共與南韓貿易額共達二百五十億美金。建交以來，雙方政府陸續簽訂了「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以及「關於成立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聯委會的協定」、「海運協定」、「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協定」、「和平利用核能協定」等一系列的政府間協定，雙邊經貿合作的順利在中共與南韓的關係上，追求經濟利益的重要性未來將會更加增強。隨著中共與南韓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雙方交往中難免出現利益的衝突和矛盾。關鍵是要如何處理和解決摩擦和紛爭。

就軍事交流方面而言，一九九八年八月，人民解放軍外事工作的核心，熊光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訪問南韓，已經表明中共與南韓的關係已提升到軍事領域的合

---

<sup>54</sup> 同註4，頁187。

作。一九九九年八月南韓國防部長趙成台訪問北京，與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舉行中共與南韓首次國防部長會議。二

年一月，遲浩田國防部長回訪南韓，同趙成台部長舉行第二次兩國國防部長會議，在此次會談中，雙方部長交談的主要內容非常廣範，包括有關韓半島和東北亞情勢以及軍事交流和合作，中韓夥伴關係的進一步加強和發展方向等。

如此一來，雙方不僅在社會、文化、經貿、科技、投資等領域的合作關係迅速發展，而且政治、軍事交流也頻繁，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和南韓的關係可說是已來達「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的境界。

## 二、中共與北韓關係的演變

中共同南韓建交，北京、平壤、漢城三角關係導致質的變化，其最明顯的變化是中共與北韓的關係，過去雙方異口同聲：「朝中兩國是山水相連的最親密的鄰邦。兩國人民是從很早以來就緊密團結，共同對敵，同生死共患難的最親密的戰友和階級兄弟。朝中友誼將同歷史一起萬古長青。<sup>55</sup>」「中國黨和政府十分珍視中朝兩國人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結下的偉大友誼，今後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們都將為鞏固和發展中朝友誼作出貢獻。<sup>56</sup>」但隨著中共與南韓之建交，雙方之間的關係出現貌合神離日漸疏遠的跡象。而且再加上，於一九九四年金日成的去世以及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日漸凋零，基於金日成與中共老一代領導人的私人情誼及革命情感已不復見，結果是雙方關係日淡。最明顯的例子是雙方高層領導人幾乎中斷了互訪與接觸。中共與南韓一九九二年以來兩國高層領導人的互訪頻繁。相對於南韓，從一九九二年來中共與北韓之間的關係則十分有限，除了少數中低層官員的互訪外，幾乎沒有重要的高層接觸。（見表 5-1）

---

<sup>55</sup> 朝中友誼牢不可破，《今日朝鮮》總第 405 期（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2. 10），頁 86~87。

<sup>56</sup> 《人民日報》，1991. 5. 5，第 1 版。

表 5-1：中、韓，中、朝領導人重要會同一覽表（1989～2000）

年度	中、韓會談			中、朝會談	
	中共→南韓	南韓→中共	第三國會同	中共→北韓	北韓→中共
1989				趙紫陽總書記	金日成總書記
1990				江澤民總書記	延享默總理
1991	錢其琛外長			李鵬總理	金日成主席
1992		李相玉外長 盧泰愚總統		楊尚昆主席	
1993	錢其琛外長	韓昇洲外長	江澤民與金泳三		
1994	李鵬總理	李萬燮議長 金泳三總統 韓昇洲外長	江澤民與金泳三		
1995	喬石委員長 江澤民主席	李洪九總理 黃珞周議長			
1996		孔魯明外長	李鵬與金泳三， 江澤民與金泳三		
1997		金守漢議長 柳宗夏外長			
1998	胡錦濤國家副主席	朴定洙外長 金大中總統	朱鎔基與金大中		
1999	李瑞環政協主席， 唐家璇外長	趙成台國防部長	朱鎔基與金大中	唐家璇外長	金永南常務委員長
2000	遲浩田國防部長， 朱鎔基總理	李廷彬外長	江澤民與金大中， 朱鎔基與金大中	遲浩田國防部長	金正日國防委員長

資料來源：《中共外交部網站》，中國與朝鮮的關係，  
<http://www.fmprc.gov.cn/chn/2990.html>；中國與韓國的關係，  
<http://www.fmprc.gov.cn/chn/3017.html>；《駐韓國中共大使館》，  
<http://china.kofa.org>；《駐中國韓國大使館》，<http://www.koreaemb.org.cn>。

另外，一九九五年四月間北韓同意台北與平壤間專機直航，事前未與中共進行協商引發中共當局的不滿，指稱北韓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另外有關高雄與釜山爭辦二二年亞運，北韓採取支持高雄主辦的立場，引起中共的不快，又因平壤與台北簽訂處理核廢料協議，中共外交部聲稱，台北是在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破壞中共及其友邦國家的關係。另外，北韓「勞動黨」書記黃長燁的叛逃事件<sup>57</sup>，更令中共與北韓的雙邊關係陷入谷底，短期內恐無解凍之跡象。

不過，在東北亞地區大國中，中共最有可能是對北韓施加影響力的國家。中共曾經同美國合作，說服北韓放棄了核武裝備計畫。一九九四年中共鼓勵平壤同華盛頓達成關於核控制的協議；隨後，又鼓勵北韓履行其義務。儘管中美合作，共同阻止北韓的核子計畫，但北京卻不願對北韓領導集團施加過多的壓力，因為擔心北韓可能作出咄咄逼人的事，甚至有暴力的反應。不過中共仍然具有對北韓行使影響力的條件：首先以經濟援助為後盾，對北韓的經濟援助的事實，證明中共對北韓的積極的態度；其二為保護安全方面，若北韓在中國東北邊界能夠繼續扮演緩衝地帶的角色，中共確切地保障北韓的安全。因此，在柏林北美會談時，北韓就受到中共方面的施壓，與美國約定停止發射飛彈，在國際社會已成為公然的秘密。<sup>58</sup>

中共與北韓之間陷入低潮的雙邊關係，這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復因北韓仍然固守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排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而為中共與北韓的經濟貿易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變數。較具代表性的外交行徑的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中共與北韓，在平壤締結新的貿易協定，雙方議定從過去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轉變為現金交易，中共要求平壤以強勢貨幣來支付購買糧食、石油和其他物品，減少政府的干預

---

<sup>57</sup> 韓國中央日報記者：中國將如何解決黃長燁事件？錢其琛答：黃長燁事件從本質上來講，是朝鮮半島北南雙方之間的事件，由於此事件發生在中國北京，所以中國有管轄權。我們正在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並且將根據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同時考慮到有利於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各方面都採取冷靜態度，使這個問題早日得到解決。 錢其琛答中外記者問，《人民日報》，1997. 3. 8，第1版。

<sup>58</sup> 《中央日報》(漢城)，1999. 9. 30，第7版。

與限制<sup>59</sup>，使企業商品自由地交流。於此，使極度孤立的北韓經濟更是推向破產的邊緣。但自一九九四年開始，中共再度提供北韓部分的援助，中共連續六年（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九年）共向北韓無償援助十萬噸糧食和價值數千萬元人民幣的救災物資。一九九八年無償提供十萬噸糧食、二萬噸化學肥料和八萬噸原油援助後，一九九九年又無償提供一五萬噸糧食和四十萬噸煉焦煤援助。至於九五年回復了從九二年以前的雙方貿易條件。而且中共讓北韓高層參觀他們的商、工業區，強調指出改革的好處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孤立和落後所帶來的後果，有意引導北韓採取中國式經濟發展路線。

從中共與北韓之間高層互訪的次數來，可預料中共與北韓的關係親疏程度。至於一九九九年六月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訪問北京之前，除了一九九四年九月北韓國家副主席李鐘玉前往北京參加中共四十五週年國慶活動外，雙方之間幾無高層互訪。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中共和北韓建交五十週年紀念日，中共才派遣外長唐家璇參加北韓的慶祝活動，雖然訪問期間，沒有同金日成見面，但從此也有顯露出雙邊關係逐漸恢復的氣象。

### 第三節 中共對韓半島政策的展望

中共對目前世界的認知，主要仍是基於辯證的角度，認為世界是在矛盾與變動中，因而國際上各種力量繼續的分化、組合，於是產生競爭與合作、矛盾與協調、鬥爭與妥協相互交錯。於此衍生出來的「多極化」世界論，不僅是中共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判斷依據，也是主觀上的期待與努力之方向<sup>60</sup>。並且中國在十九世紀痛苦的歷史經驗，大多數的中國人對恢復過去中國的驕傲有心理上的需求，這種心態明顯影響著中共領導人的認知架構。中共以強烈的主觀願望來自我定位，在多極化世界中其應所處的地位和該扮演的角色。就

---

<sup>59</sup>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 1. 29，第2版。

<sup>60</sup> 同註7，頁23。

形成想成為「大強國」的心理而言，中共當然是個世界主要的國家，它的人口占全人類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經濟在持續增長，二十年以後將再進一步增長，地域也十分遼闊。中國必將而且正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因此，對美關係仍然是中共外交關係的重點，「爭取合作，避免衝突」可能是主調，雙方既合作又競爭的這種「非敵非友」的矛盾關係則將繼續下去。韓半島的未來，特別是南北雙方衝突和統一的問題，同中共和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對中共而言，韓半島，不僅是其東北亞政策的重要一環，更可謂是全球戰略的立足點，因為東北亞是世界四強的利害關係交叉的地區，韓半島位於其中心。因此中共對韓半島的政策是在中共總體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共已有其對韓半島想要扮演的角色。中共外交部在其網站上表明：「中國積極發展同朝鮮北南雙方的友好關係，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參加旨在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的中、美、朝、韓四方會談，為維護半島及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建設性貢獻。<sup>61</sup>」如果中共的「建設性貢獻」的態度過於積極的話，無可避免地將與美國產生衝突，因為美國在南韓駐有三萬七千名美軍，南韓是整個美國軍事部署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九九四年三月，金泳三訪問北京期間，時任南韓駐中大使黃秉泰的發言，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說，有關對北韓核問題的協議過程，已脫離過去先由美國協議後，向中共通知的方式，就直接與中共協議而共同行動，並指出，南韓的外交應脫離「對美一邊倒」、「對日一邊倒」，且「要重視中共的角色」。此際，南韓政府立即向美國說明，黃大使的言論，不僅是代表他個人的想法，而且是一偶發性的事件。<sup>62</sup>但這事件已明白表態，南韓內部對中共的一種看法。二年六月二十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曾親自聽取南韓情報機關首腦簡報：如果朝鮮瓦解可能引發的後果。南韓改善對中共的態度，顯示八十年代南韓一切只聽命美國的態度已開始改變。<sup>63</sup>不僅如此，南韓政府在

---

<sup>61</sup> 唐家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交工作，中共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zt/zt\\_01/wjb\\_zt\\_wz\\_tjh\\_a01.htm](http://www.fmprc.gov.cn/zt/zt_01/wjb_zt_wz_tjh_a01.htm)。

<sup>62</sup> 《韓國日報》，1994. 4. 1。

<sup>63</sup> 《聯合早報》（新加坡），2000. 6. 20，

南北韓關係和解過程中，一向爭取中共的積極支持和扮演「調和者」的角色。正如金大中所強調的，「在東北亞地區，中國為了維持韓半島的和平，積極參與了旨在建立韓半島和平機制的『四方會談』，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韓、中雙邊友好關係對於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中國對韓國來說是非常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鄰國。希望兩國今後緊密合作，為韓半島和東北亞的穩定，乃至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繁榮作出貢獻。<sup>64</sup>」這些例子足以反映中共在韓半島雙方交流或者進行統一過程中所處的地位。

二 年六月，在具有歷史性的南北韓高峰會議上，除了南北韓雙方以外，中共是另外一個贏家，中共對南北韓雙方保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超然立場不僅贏得了它們的信任，而且還突顯了作該地區國半島的統一和復興對中共不利，但未來的事實極有可能恰恰相反。中共支援韓半島走向緩和，實際上反映了中共的自信和對局勢演變結果的信心。因此，可以預料的是，美國撤出朝鮮半島只是時間上的遲早而已。

一般說法認為中共不願見南北韓統一，這倒未必，中國大陸和韓半島在重要的地區安全問題上、特別是在同日本有關的問題上，也有著共同的觀點。一九九六年，北京對漢城表示同情，在南韓圍繞獨島與日本發生的領土爭端中支持南韓。並且雙方的言論媒體在批評日本時不約而同報導其詳細內容。兩國人民對日本的占領記憶猶新，對日本的意圖仍然保持警惕。韓半島如同中國大陸，激烈抨擊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對其帝國主義歷史的粉飾。韓半島統一後一個足夠力量而又仇日不親美的韓國，正好是作為抵制日本的中韓新歷史同盟的夥伴。

---

<http://www.zaobao.com/special/korea/pages/korea200600.html>。

<sup>64</sup> 《東亞日報》，1998. 11. 13，第 1 版。

## 第六章 結 論

綜合以上各章所述，可藉由透過對於中共辯證法的認識，而瞭解中共如何運用其特有的辯證法觀點來說明其外交政策的理論、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同時，吾人也可以瞭解中共外交行為的內在類型或規律，以並說明中共在發展與南、北韓三方關係的過程中，曾出現的問題，包括各種衝突和矛盾；並說明中共是如何解決並達成協議。據此，吾人可評估現階段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問題並展望其未來趨向。茲分述如下：

### 一、辯證法與中共的運用

無論是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或馬克思主論的唯物辯證法，其核心內容是，一切事物與現象都是處於矛盾、動態過程中，因而產生對立、鬥爭、轉化、統一的不斷擴充為新體系或新現象，並由此導致質與量的變化，就是所謂「對立統一規律」（矛盾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基本規律。就其形式而言，乃是「正」、「反」和「合」三支。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具有辯證思維模式是「兩端論」，即在承認對立雙方相互矛盾的前提下，著重探索如何使之相輔相成，彼此促進，達到「中和」的境界，而不是對待任何矛盾都只講不可調和的鬥爭。

中共從領導中國大陸政權至今，主要經歷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的領導，從辯證思維而言，此三者所強調的重點與方法上仍有差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對辯證法的應用到政策層面，各因其認知與時空環境因素，而具有不同的重點與特質。在共同特點方面，三者皆強調整體性與動態性的觀察和整合。在思維型態方面，毛澤東較強調辯證的、哲學式的類比附會之思考方式；鄧小平則在實踐過程中，突顯出演繹的價值；江澤民則在承續了辯證法的傳統力量之餘，更隱含循科學方法為判準的本質與型態。在所衍生的政策方

面，毛澤東較強調武力與鬥爭的應用；鄧小平則較能透過外交與談判，突顯出辯證的作用；江澤民進而在國際組織的體制互動下，企圖運用辯證法而掌握主控地位。從辯證實踐角度來看，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的外交政策制定與毛澤東時期比較起來，相對地，後者注重的是「矛盾的對立面」，而前者較重視的「矛盾的統一面」。

## 二、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與實際

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乃是通過世界觀認識實際（國內外環境）而建立理論，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理論與實際的辯證統一過程。其具體步驟是：首先，對於時代性質、世界格局的把握，敵、友與我方的界線；其次，確定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決定具體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所以對外交決策者而言，不斷地分析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掌握主要矛盾，以建立國際關係理論，是不可或缺的任務。但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會出現理論脫離實際，就無法正確地制定及執行外交政策的階段。因而將部分或全部地改變理論、角色、目標、策略，以使其與國內外環境的規律性相符合，才能夠將主觀的理論變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中共外交決策的結構而言，一定要考慮中共黨政軍的整體性結構：中共的黨、政、軍三者關係並非對立或制衡的，而是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共訂決策下，組織與影響力延伸到各系統、層面。至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實際運作進行，透過黨組織全面的操縱。

## 三、辯證世界觀與對韓半島政策

中共對韓半島外交政策的制定，基本上也是在辯證思維下的產物，隨著對世界格局的不同認知，而律定出主要的角色，隨著此一角色的確立，不斷地挑起兩方之間的矛盾鬥爭與聯合統一，使中共自身成為操控者與受益者。一九五 年

代，中共根據「兩大陣營論」推行「一邊倒」政策，經過韓戰，與北韓形成同盟而援北抗南政策；一九六〇年代，根據「中間地帶論」推行「兩條線」策略，在中蘇關係的惡化之期拉攏北韓，執行親北排南政策；一九七〇年代，根據「三個世界論」推行「一條線」策略，以「一個朝鮮」政策來近北遠南；一九八〇年代，根據「東西南北論」推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對北韓由「一貫的支持」轉為有「原則的支持」，對南韓由「關門不上鎖」轉為「開門引進」，可謂推行了持北引南政策。

#### 四、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的現況

一九九〇年代，中共對外政策基於「和平與發展」及「多極化」世界觀，強烈的以主觀願望來自我定位「一極」的地位和該扮演的角色。此後，大國關係的調整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此時，大國外交格局隱然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共全球戰略的主要構想。「夥伴外交」戰略就是中共推動大國外交，並促成世界多極化的實際作為方式。

一九九二年中共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中共對韓半島的影響力就正式由北延伸到南而包括了整個韓半島，使之成為對南北韓最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行為者。如此一來，形成「一中兩韓」的「三角」架構。中共對韓半島政策是處於南北韓間對立矛盾之中，發揮其特有的辯證思維和行動，以維持兩邊均衡，追求符合與滿足國內和國外的各種要求。

中韓建交以後兩國關係迅速發展，高層頻繁互訪，經貿關係大增，目前中共是南韓第三大（含香港）貿易夥伴；而且在一九九八年兩國更進一步宣佈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相對於此，中共與北韓之關係則呈現疏遠的狀態；但自從一九九九年，雙方高層互訪後，才逐漸好轉，及至二〇〇〇年五月金正日訪問北京以後方可謂恢復正常關係。

## 五、中共與韓半島關係的展望

對於想成為「大強國」的中共而言，韓半島是在中共總體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東北亞是世界四強的利害關係交叉的地區，韓半島位於其中心。從韓半島的觀點而言，其未來，特別在於南北雙方衝突和統一問題，同中共和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二〇一八年六月，南北韓高峰會議上，中共因扮演「調和者」的角國的地位。

一般認為中共不願樂見南北韓統一，吾人認為這倒未必，中國大陸和韓半島在重要的地區安全問題上，特別是在同日本有關的問題上，也有著共同的觀點；況且，若南北韓統一，則甚至於美軍再也沒有駐軍韓半島之理由。

中共欲成為世界強國，則不能單身立足，考慮地理、歷史、文化、安全等各種因素，其最好的夥伴可能就是韓半島。因此不僅須拉攏北韓，甚至需要納入整個韓半島成為其勢力範圍。中共要擴大對韓半島的影響力，在南北韓統一的進程中，勢必要扮演具有建設性的角色，以為未來鋪路。因為統一後的韓國，仍然不足成為威脅中國大陸的勢力，且其仇日又不親美的態度，正好是作為抵制日本的中韓新歷史同盟的夥伴。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書籍

1. 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的報告，輯於《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新中國書局，1954。
2. 周恩來的宣揚，輯於《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新中國書局，1954。
3. 彭德懷的談話，輯於《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新中國書局，1954。
4.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正體字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版權  
台北：錦繡出版社發行，1993。
5. 《今日朝鮮》總第 405 期，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2。
6.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7.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0. 《老子》。
11. 《易經》繫辭上傳。
12. 《匪俄鬥爭原始資料彙編》13，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971。
13. 《朝中友誼萬古長青——華國鋒主席訪問朝鮮》，平壤：外國文出版社，  
1978。
14. 《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5.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 「明報」中國問題研究組，《中國權力機構與領導人》，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3。
17. 中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地方組」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機構  
改革指導》，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 年。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

- 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22.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84。
  23. 尹慶耀，《辯證法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0。
  24.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25. 王覺源，《辯證法及其應用》，台北：帕米爾書店，1973。
  26. 平可夫，《外向型的中國軍隊——中共對外的謀報、用兵能力和軍事交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6。
  27.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95。
  28.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
  29.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台北：五南，1995。
  30. 石志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一九四九．十——一九八九．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31. 共黨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共十四大綜合研究》，台北：法務部調查局，1993。
  32. 江春琦，《中共文武關係的辯證建構》，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no. 5 (1998.5)。
  33. 江澤民，在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上的講話（1993年11月2日），楊少俊等編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34. 江澤民，學習學習再學習（199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35. 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6. 何萍、李維武，《中國傳統科學方法論的嬗變》，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
  37.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38. 吳冷西，《十年論戰 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39. 吳明杰，《1989 年後中共人民解放軍對外交流情況研析》，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6。
  40.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台北：淑馨出版，1992。
  41. 李明，《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亞安全》，台北：五南，1998。
  42. 林文程，《中共談判的理論與事務——兼論台海兩岸談判》，高雄：麗文文化，2000。

43. 林長盛，中共黨軍關係的模式與變遷，林長盛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1993。
44. 法務部調查局編，《中共現行法律彙編》，台北：法務部調查局，1989。
45. 金開誠，中國人的智慧——談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思維模式，武春河主編，《龍吟——中華文化之光》，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
46.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北京：中共編譯出版社，1998。
47. 姜新立，《分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理論典範的反思》，台北：五南圖書，1997。
48. 姜新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台北：黎明，1990。
49. 柯雄、賈宗誼、張勝平譯，《長城與空城計》，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
50.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
51.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52. 唐君毅，辯證法的類型，《唐君毅全集》，台北：學生書局，1990。
53. 孫維本、邵奇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大辭典》，長春：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54. 席來旺，21世紀中國戰略大策劃——外交謀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
55. 浦興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書店，1996。
56. 秦孝儀主編，《蔣總統集》第二冊，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4。
57. 袁貴仁，《當代中國的唯物辯證法——鄧小平著作中的哲學思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58. 郝雨凡，《美國對華政策內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
59. 高家富，《中共政治體制改革之研究——以黨組織權力結構、黨政關係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60. 高崇雲，《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的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89。
61. 郝潤昌，毛澤東外交戰略思想探析，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62. 張小明，後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63. 張保民編，《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文件》，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
64. 張廣信主編，《毛澤東思想體系概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65.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台北：聯經，1993。
66. 郭瑞華，《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1996。
67.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68. 陽作華、張峰編著，《辯證法史論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

69. 黃金祺,《什麼是外交?》,北京:外交學院知識出版社,1993。
70. 黃華,《八十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1980.1.25),台北:國家安全局編,1980.5。
71. 新華通訊社編輯,《中國政府機構名錄》中央卷,香港:成文圖書公司,1993。
72. 楊勝春,《中國最高領導班子的左右手——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檔案(1949~1998)》,台北:永業,2000。
73. 葛振家,《論明代中國人的朝鮮觀》,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74.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75. 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76.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1999。
77. 趙建民,《台灣民主化經驗適用於中國大陸之可行性研究——自黨政關係制度化層面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6。
78.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9. 劉國新主編,《中國政治制度辭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0。
80. 滕藤,《學習與弘揚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81. 蔡璋,《中共的涉台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台北:風雲論壇,2000。
82. 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吉虹資訊,2000。
83. 遲愛萍,《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繼承與發展》,龍平平、張寧主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哲學思想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84. 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85. 錢剛鐔,《中共外交政策與策略》,台北:黎明,1983。
86. 閻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李少民,《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桂冠圖書,1992。
87. 謝益顯,《中國當前外交的特點和方略及其重要性與長期性》,鄭宇碩等,《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1999。
88. 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89. 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鄭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1996。

90.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91.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1995。

## 期刊

1. 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中國大陸研究》第38卷第9期，1995.9。
2. 丁樹範，中共對北韓、越南的關係，《亞洲與世界月刊》，1990.12，頁46~48。
3. 于有慧，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6期，2000.3，頁1~19。
4. 于美華，朝鮮半島形勢及中國政策分析，《現代國際關係》1996年第10期，頁34~38。
5. 中共研究編輯，當前中共黨建設面臨的難題，《中共研究》第28卷第7期，1994.7。
6. 王友辰，中共對九十年代國際形勢評估之探討，《中共研究》第33卷4期，1999.4。
7. 王飛凌，冷戰以後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簡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總第10期 春季卷，香港，1995。
8. 王喬保，四方會談與朝鮮半島局勢，《外國問題研究》(長春)，1996.3，頁28~31。
9. 史敏，朝鮮半島的統一與東北亞的新秩序，《亞太研究》，1993.6，頁15~19。
10. 玄偉東，韓國北方外交政及其對東北亞政治形勢的影響，《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長春)，1994.4，頁39~44。
11. 申相振，中共與韓國關係發展的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之分析，《東亞季刊》第18卷第3期，1987年夏季，頁56~69。
12. 共黨問題研究資料室，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8期，1998.8。
13. 曲星，試論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後的中國對外政策，《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94年第4期，頁16~22。
14. 朱松柏，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的現況與展望，《中國大陸研究》第40第3期 1997.3。
15. 朱松柏，北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2，頁1~11。

16. 朱詩柱，毛澤東「中間地帶」理論探析《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1期。
17. 呂新國，世界主要矛盾問題研討會紀要，《現代國際關係》1995年第4期。
18. 李向前，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世界知識》1993年第24期。
19. 李義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李淑錚，《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11期，1996.11。
20. 沈建中，論中共對台工作組織——以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為個案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1期，1998。
21. 周尊南，我國對外政策調整的理論基礎——學習鄧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外交學院學報》，1988年第一期。
22. 周臻，從中共與南北韓關係來看當前東北亞情勢，《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12期，1999.12，頁52~58。
23. 宜中，從胡耀邦訪問平壤看中共與北韓關係，《中共研究》第18卷第7期，1984。
24. 明居正，中國外交史分析架構之再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六期，台北：台灣大學政系，1995.5。
25.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1999年夏季。
26. 長青，兩韓峰會對區域情勢的影響，《中共研究》，第34卷第7期，2000.7，頁23~25。
27. 俞劍鴻，中共中央繼承問題的辯證性初探：自一九六九起，《中共研究》第31卷第7期，1997.7。
28. 俞劍鴻，中共黨軍之辯證模型，《中共研究》第30卷第7期，1996.7。
29. 俞劍鴻，台北及第三者與北京談判須知，《亞洲評論》1999年秋冬號（總第10期），1999.12。
30. 唐勃，論辯證法，《共黨問題研究》第8卷第3期，1982.3。
31. 孫宜良，鄧小平對中國前途的思考，《鏡報月刊》，1991.5。
32. 徐瑜，黑格爾辯證法研究，《政治評論》第24卷第1期（台北），1970。
33. 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3期，1999.3，頁82~93。
34. 秦邦九，「中共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與『夥伴外交』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9期，1999.8。
35. 馬仲可，朝鮮半島「和平體制」的政治分析，《問題與研究》第34卷第9期，1995.9，頁41~50。
36.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8期，1998.8。

37. 張少文，八十年代中共的對韓政策，《共黨問題研究》第15卷第9期，1989.9。
38. 張忠義，朝鮮半島走上和解之路，《世界知識》1992.2，頁9~10。
39. 張登及，毛澤東涉外「言論」與中共「外交」，《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9期，1998。
40. 張寶仁，中朝邊貿易及朝鮮對圖們江開發對策，《亞洲研究》第19期，1996.9，頁100~118。
41. 曹麗琴，北、南朝鮮加入聯合國與朝鮮半島統一問題，《韓國學報》第十三期，台北，1995。
42. 許志嘉，從「矛盾」世界觀論中共的對美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6期，1996.6。
43. 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1卷第5期，1998.5。
44. 許志嘉，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決策模式，《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8期，1998.8。
45. 陳培雄，中共軍事制度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第20卷第6期，1994.6。
46. 陳德昇，中共對台工作組織與人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5期，1994.5。
47. 陸俊元，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特徵，《外國問題研究》第8號，長春，1996.8。
48. 馭志，四十年來中共外交的演變與發展，《中共研究》第23卷第12期，1989.12~第24卷第2期，1990.2。
49. 馭志，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中共外交——中共外交政策及其與美、俄關係，《中共研究》第33卷第5期，1999.5。
50. 黃金祺，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中國外交的一大特色，《外交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
51. 楊志恆，中共外交的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10期，1999.10。
52. 楊勝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流變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3卷第9期，1997.9。
53. 趙春山，後冷戰時期的中共對外政策，《理論與政策》第6卷第4期，1992.7。
54. 趙春山，從中共的「矛盾論」看：華府與北京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理論與政策》第12卷第1期，1998.1。
55. 趙雲山，中共對外戰略思想之演變，《中共研究》第29卷第6期，1995.6。
56. 劉妙龍、孔愛莉、張偉，亞太地區新形勢下的中國地緣政治戰略，《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994.4，頁122~126。

57. 劉德海，九十年代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與兩韓研究，《韓國學報》第13期，1995.6。
58. 劉德海，兩韓高峰會對東北亞的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6卷第7期，2000.7，頁1~3。
59. 樂辰，新中國外交之路——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綜述，《世界知識》，1996年第23期。
60. 蕭全政，兩種社會科學典範，《政治科學論叢》，台灣大學政治系出版，第五期，1994。
61. 謝益顯，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理論，《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88年第2期。
62. 謝益顯，戰後初期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85年第二期。

## 中文報紙

- 《中國時報》(台灣)
- 《聯合報》(台灣)
- 《中央日報》(台灣)
- 《人民日報》(北京)
- 《解放軍報》(北京)
- 《文匯報》(香港)
- 《大公報》(香港)
- 《明報》(香港)
- 《聯合早報》(新加坡)

## 韓文部分：

### 書籍

1. 《金日成著作選集》第5卷，平壤：朝鮮勞資黨出版社，1968。
2. Hong, Deok-hwoa, 《兩個中國與實利外交》，漢城：\_\_\_\_\_，1998。
3. Kim, Sei-ung, 《中國的對外政策與韓國》，漢城：Koreaone，1999。
4. Lee, Tae-hwan, 《首腦外交與韓半島：周邊四強 1998~1999》世宗政策叢書 2000-7，城南：世宗研究所，2000。
5. \_\_\_\_\_編輯部譯，中埜肇著，《辯證法發達史》，漢城：\_\_\_\_\_，1983。
6. 世宗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韓國的國家戰略》，城南：世宗研究所，2000。
7. 申相振，《中、北關係展望》研究報告書 97-04，漢城：民族統一研究院，1997. 11。
8. 申相振，《中國對於建構韓半島和平體制的立場及戰略》研究報告書 98-10，漢城：民族統一研究院，1998. 12。
9. 安仁海，《後冷戰期中、北韓關係變化研究》研究報告書 95-21，漢城：民族統一研究院，1995. 12。
10. 安秉俊，《中共政治外交論》，漢城：博英社，1986。
11. 李相禹，《北韓40年》，漢城：乙酉文化社，1990。
12. 李鍾奭，《北韓 中國關係 1945~2000》，漢城：圖書出版中心，2000
13. 李鍾奭，《朝鮮勞動黨研究》，漢城：歷史批評社，1995。
14. 金日成，《同世紀一起》第1卷，平壤：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92。
15. 金永文，《中國外交論》，漢城：大旺社，1993。
16. 金用浩，《現代北韓外交論》，漢城：\_\_\_\_\_，1996。
17. 金徹凡編，《韓國戰爭》，漢城：平民社，1989。
18. 金學俊，《北韓五十年史》，漢城：東亞出版社，1995。
19. 徐鎮英，《現代中國政治論》，漢城：羅南出版，1997。
20. 殷千基，《北韓對中蘇外交政策》，漢城：南芝，1994。
21. 馬仲可編，《解密了的舊蘇聯文獻檔案解說》，漢城：自由總聯盟出版社，1994
22. 高秉哲編，《北韓外交論》，漢城：慶南大學極東問題研究所，1977。

23. 國土統一院編,《國別南北韓外交年表》1945~1973,漢城:國土統一院,1974。
24. 崔春欽,《中國對北韓政策:現況及展望》,漢城:民族統一研究院,1994. 2。
25. 黃炳茂、Mel Gurtov,《中國安全論——人民解放軍的角色分析》,漢城:國際問題研究所,1999。
26. \_\_\_\_\_,《由最新資料看中國經濟和韓國經濟》,漢城:大雄出版社,1994。
27. 鄭千九,《中國人的世界觀與對外政策》漢城:新永出版社,1996。
28. 韓國國土統一院,《北韓資料選集:和平體制問題》,漢城:國土統一院,1994。
29. 權五允,《北韓體制變化論》,漢城: \_\_\_\_\_, 1998。

## 期刊

1. Kim, Tae-ho, 後冷戰期中國對北韓影響力的動向及展望 《國防論集》第 42 號 1998 年夏季。
2. Lee, Tae-hwan, 韓、中首腦會談與二十一世紀韓、中關係,《情勢與政策》98-11, 1998. 11。
3. Mun, Su-weon, 韓半島統一的國際政治與東北亞多方安保協力,《國際政治論叢》第 37 輯第 3 號, 1998。
4. 朴斗福, 南、中關係:課題及發展方向,《國際問題》第 30 卷第 47 號, 1999. 7。
5. 朴斗福, 最近中國對韓半島政策的調整與韓國對中國政策的方向,《外交》第 47 號, 1998. 10。
6. 朱建榮, 北韓、中國關係之特性,《極東問題》1997 年 4 月號, 1997. 4。
7. 金永文, 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政策與實事求是的角色,《中蘇研究》58 號, 漢城:漢陽大學, 1993。
8. 金成柱, 周邊國家對韓半島的政策和南北韓關係,《外交》(南韓),第 38 號, 1996。
9. 金東成, 新東北亞秩序與韓中政治協力,《中國研究》第 1 卷第 1 號, 1993 年春季。
10. 權炳鉉, 至於建國五十周年的中國情勢與韓、中關係,《情勢與政策》99-11, 1999. 11。

## 韓文報紙

《東亞日報》

《中央日報》

《朝鮮日報》

《漢城新聞》

《韓國日報》

《勞動新聞》

## 英文部分：

### Books

1. Armstrong, J. D.,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 Barnett, A. Doak.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5.
3. Bobrow, Davis B., *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the Chinese Ca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4. Chou, David S., *Peking'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9.
5. Dreyer, June Teufel, ed., *Chinese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89.
6. Gittings, John. *The Role of Chinese Arm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7. Goodman, David S. G. and Gerald Segal, ed., *China in the Nineties: Crisis Management and Beyo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Hamrin, Carol Lee and Suisheng Zhao, ed.,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5.
9. Harding, Harry.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10. Harries, Lilliam Craig.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Praeger, 1985.
11. Holsti, K.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88.
12. Hsiung, James Chieh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13. Hsiung, James Chieh.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14. Hunt, Michael H.,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1976.
16. Johnston, Alastair I.,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Kim, Samuel S.,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18. Kim, Samuel S.,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19.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sup>nd</sup>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20. Lieberthal, Kenneth G. and David M. Lampton, ed.,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2.
  21.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Macridis, Roy C.,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2.
  23. Robinson, Thomas W. and David L.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 Shambaugh, David L., ed.,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 Shambaugh, David L., ed., *Is China Unstable?: Assessing the Factor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0.
  26. Shambaugh, David L., e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Shao, Kuo-kang. *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1996.
  28. Shaw, Yu-ming.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Chinese Commun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29. Shih, Chih-yu.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30. Shih, Chih-Yu. *The Sp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ian, 1990.
  31. Solinger, Dorothy,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32. Starr, John Bryan. *Ideology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alect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33. Sutter, Robert 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velopments After Mao*. New York: Praeger, 1986.
  34. Swaine, Michael D.,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7.
  35. Yu, Peter Kien-hong. *Bicoastal China: A Dialectical, Paradigmatic Analysi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36. Zhao, Quansheng.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eriodicals

1. Calder, Kent E., "The New Face of Northeast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1).
2. Chen, Qimao, "New Approache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n Survey*, vol.33, no.3 (March 1993).
3.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4. Deng, Yong.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4 (June 1998).
5. Hu, Xueze and Jinhua Bing, "World Situation Unstable Despite Détente," *Beijing Review*, 34, 2 (14-20 January 1991).
6. Huang, Byong-Moo, "Linkage Politic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2, no.1 (Spring /Summer, 1982).
7. Huang, Yasheng,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99 (Summer 1995).
8.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7).
9. Huo, Hwei-Ling,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Gulf Crisis and Beyond," *Asian Survey*, vol.32, no.3 (March 1992).
10. Kim, Samuel S., "China's Korea Policy in a Changing Regional and Global Order," *China Information*, vol. 8, nos. 1/2, (1993).
11. Kim, Woosang, "The Diplomatic Triangle of South Korea, China, and Taiwan," *Issues & Studies*, vol.32, no. 5 (May 1996).
12. Lam, Willy Wo-Lap, "Jiang's Power Continues to Gr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March 1995).
13. Ng-Quinn, Michael,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27 (1983).

14. Pollack, Jonathan,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in Transi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5 (July 1984).
15. Pye, Lucian W., "Mao Tse-tung's Leadership Sty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 2 (Summer 1976).
16. Ross, Robert 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17. Shambaugh, David. "Facing Reality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1).
18. Simmons, Robert R., "China's Cautio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Indochina", *Asian Survey*, no. 11 (July 1971).
19. Swaine, Michael D., "The PLA and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Leadership, Structures, Process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20. Whiting, Allen 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e 1995).
21. Yahuda, Michael B.,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40: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November 1989).
22. Yahuda, Michae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Long March, Future Uncerta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eptember 1999).
23. Yu, B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4).
24. Yu, Peter Kien-ho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LA," *Defense Analysis*, (U.K.), vol. 16, no. 2 (Summer 2000).
25. Zhu, Yucha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 Studies*, vol. 31, no. 12 (December 1995).

## 相關網站：

《中共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http://www.moftec.gov.cn/>

《駐韓國中共大使館》 <http://china.kofa.org>

《駐中國韓國大使館》 <http://www.koreaemb.org.cn/>

《人民日報》 <http://www.peopledaily.com.cn>

《新華社》 <http://www.xinhua.org>

《中央日報》(台灣) <http://www.cdn.com.tw/>

《中國時報》(台灣) <http://news.chinatimes.com/>

《聯合報》(台灣) <http://udnnews.com.tw/>

《大公報》(香港) <http://www.takungpao.com.hk/>

《文匯報》(香港) <http://www.wenweipo.com/>

《明報》(香港) <http://www.mingpaonews.com/>

《南華早報》(香港) <http://www.scmp.com/>

《聯合早報》(新加坡) <http://www.zaobao.com。>

《中央日報》(南韓) <http://www.joins.com>

《東亞日報》(南韓) <http://www.donga.com/>

《朝鮮日報》(南韓) <http://www.chosun.com/>